



Tibetan Buddhist Resource Center

Text Scan Input Form - Title Page

Work:	W1PD89022	ImageGroup:	I1PD89029
LCCN:	n/a	ISBN:	n/a

Title:	gan zi zhou wen shi zi liao xuan ji (3)
Author:	n/a
Descriptor:	written in chinese
Original Publication:	[dkar mdzes khul rig gnas lo rgyus kyi dpyad yig] [gan zi zhou wen shi zi liao] ;di 3 ji
Place:	dar mdo
Publisher:	[srid gros dkar mdzes bod rigs rang skyong khul u yon lhan khang]
Date:	1985
Volume:	1
Total Volumes:	1
TBRC Pages:	2
Introductory Pages:	n/a
Text Pages:	n/a
Scanning Information:	Scanned at Tibetan Buddhist Resource Center, 150 West 17th St, New York City, NY 10011, US. Comments: 2009

甘孜藏族自治州
文史资料选辑

第 三 辑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
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委员会编

TBRC
Catalog no. WIPD 89022
Scanned at
Outlined by

甘孜州文史资料选辑

第 三 辑

政协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委员会编

目 录

新龙贡布郎结兴亡史·····	普绕俄热 (1)
炉霍勒宗四部落的宗教和婚丧习俗·····	郎加 沙古 (45)
四川藏洋始末·····	王承志 (68)
我对康裕公司的回忆·····	李万均 (88)
边茶史话·····	高济昌 (103)
康定锅庄传闻录·····	高济昌 来作中 (130)
我所知道的康定中央银行及法币贬值情况·····	郑士杰 (145)
“小天都”摩崖石刻·····	杨嘉铭 (150)
解放前后理塘县卫生状况概述·····	李德普 (155)

新龙贡布郎结兴亡史

普绕俄热

对于贡布朗结其人，在民族史学界历来有着较大的争论：有的赞誉他是农民起义的英雄，有的贬斥他为制造战乱的魔怪。对他与清政府及附近土司发生的抗争，有的称之为“民变”，有的呼之曰“扩张”，众说纷纭，莫衷一是。为了探索其究竟，我们在新龙地区进行了深入的调查了解，查阅了有关的藏汉文资料，对贡布朗结的出生、家世、以及他的生平事迹，进行了较为系统的查证搜集。现综述如下，供作参考。

一、贡布朗结的家世和幼年时期

贡布朗结 (མཉུན་པོ་རྒྱལ་བློན་ 1799—1865)，藏族，于清嘉庆四年出生于新龙切依地方的瓦达寨子。贡布朗结因一次在械斗中被打伤左眼，人们便根据其一只眼睛的特征而呼之为“布鲁曼” (བུ་ལུ་མཉུན་)，意为瞎子娃娃。其先人，据查到的资料，为喜绕降泽 (ཤེ་རུ་མཉུན་ལྷོ་)。据传，喜绕降泽原出生于新龙雄龙西，自幼出家，为白玉县呷拖寺红教喇嘛—西茂 (པེ་ཤེ་འབྲུག་) 的弟子，因修道有成，于公元一二五三年随西藏喇嘛教萨迦派第五代祖师八思巴、洛追降付去京城讲经，在觐见元世祖忽必烈时，喜绕当廷显示法力，将一根铁索挽成了一个铁疙瘩，受到皇帝的封赠。喜绕回到新龙后，继续入寺修行，将皇帝赐予的官印、文书，交由姐姐掌管。由于他家是由挽铁疙瘩而得到官职，因而当地人们称其家族

为占堆本冲(མཉམ་ཐུང་བྱུང་པའི་ཁྱེད་པོ་)，意为因挽救疮痍而得到官位的官家。

占堆家族接受皇帝的封赠以后，先住在新龙的冬格地方，后迁至热鲁(即现在的新龙县城所在地)，并于一二七〇年在热鲁修建了一座官寨。由于当地的地形像一条正在喝水的“龙”形，官寨又正好修在“龙”的头部，因而人们称当地为“主磨卡”(འགྲུག་རྒྱུད་)，意为母龙寨。喜绕降泽还在官寨附近，霍曲河边的山上，修了一座寺庙，取名占堆寺，作为占堆家族的寺庙，由占堆家族，世代管理。

喜绕降泽之后，传了三百多年，约在清康熙、乾隆年间，占堆家族分成了上占堆和下占堆两家，上占堆家住在大盖，下占堆家仍住热鲁，两家都被清廷封为千户长，享有土司的名号。分家之初，两家还能和睦相处，后来双方都不断扩大势力范围，所属头人之间更是互相倾轧，矛盾日益突出。

这时下占热鲁家与当地有钱有势的阿呷家族联成姻亲。阿呷家在当地有较大权势，一贯恃强凌弱，并经常四处抢劫，被群众呼为“惹不起的恶魔”。下占热鲁家在阿呷家的支持下，实力日趋强大。阿呷家的女儿在热鲁家生下两个儿子，长子大班格，次子小班格。兄弟二人成年后，因争夺土司继承权发生矛盾。小班格失败后，举家迁到上下占堆之间的卡娘地方。大班格恐兄弟羽毛丰满后再来争夺土司权位，即暗中派人将小班格杀害，又将其妻女迁去甲日(现日阿格北去约十五公里)地方的卡家波绒居住。小班格的妻子明知丈夫为兄长暗害，但孤儿寡母无力对抗，只好含恨忍耐。儿子贡布登(མཉམ་ཐུང་བྱུང་པའི་ཁྱེད་པོ་)在成年以后，逐渐摆脱了伯父热鲁土司的管辖，自霸一方，所属农牧民称之为甲日本穷(意为甲日小官)，又称为占堆聂格家(མཉམ་ཐུང་བྱུང་པའི་ཁྱེད་པོ་)。于是在上占堆大盖(མཉམ་ཐུང་བྱུང་པའི་ཁྱེད་པོ་)和下占堆热鲁家(མཉམ་ཐུང་བྱུང་པའི་ཁྱེད་པོ་)之间，又产生了中占堆，占堆家族就此有了三家。

贡布登的成长及其权势的不断发展，引起伯父大班格的嫉

视，于是又拉拢、勾结贡布登的亲戚娃娅家，先在布日地方设下埋伏，然后由娃娅出面假请贡布登到他家协助调解纠纷，及行至布日地方，埋伏的人即把贡布登枪杀了。

贡布登的儿子贡布扎西(མཉམ་ཐུང་བྱུང་པའི་ཁྱེད་པོ་)成年以后，娶了上占大盖土司下属小头人若落本的女儿沙格玛为妻。沙格玛聪明伶俐，为替贡布家两代人报仇，曾先到炉霍清政府衙门告状，后又求援于朱倭、章谷二家土司，都无结果。为了逃避热鲁土司的监视和得到亲戚的支持，将家移居到卡娘对岸的切依地方。因为这样可以得到泡娘家和贡布扎西舅舅家的庇护和支持。

在贡布扎西的儿子罗布七力(རྩ་བ་ལྷ་མོ་)成年以后，沙格玛给他娶了阿呷家的女儿夏家措为妻，得到了阿呷家的支持。夏家措生有一男四女，长子夺吉热登早死，次女松翁娜姆嫁与小头人松翁甲绒大吉，三女阿娜嫁与小头人领达邓珠莫，四女司郎措嫁与小头人额德贡布汪加，五女多吉知玛嫁与小头人墨居翁加。这些头人都隶属于大盖土司。罗布七力在这些小头人的支持下，逐渐拥有了一定的实力，并在瓦达修建了一座官寨，即瓦达波绒。是时，热鲁土司下属有一家小头人绒他，在同大盖小头人松洛阿家的内部纠纷中被杀，遗下妻子罗布知玛守寡。罗布七力又与之同居，生有三男二女，长子罗布，次子俄温布拉马，三子即贡布朗结，四女措姆嫁与热鲁土司的下属小头人甲日家，五女扎西娜姆嫁与大盖土司下属小头人希达家的呷绒大吉。

罗布七力倚仗六个有头人地位和有一定实力的女婿，和三个勇猛强悍的儿子，在地方上享有一定的权势。他的长子罗布就经常对人说：“男子汉做人就要报仇，女儿家做人须会管家。”并经常伙同一些年轻人摔跤、打靶、赛马，四处抢劫，参与械斗。一次到炉霍抢劫，住在结拜弟兄吉沙大吉家里，被大吉出卖，遭到逮捕，被镣铐关押在地牢里。炉霍土司彭措登达去公堂，对他说：最坏的头人压迫人最凶，最懒的流氓才酷爱钱财。听说你是占堆本，狼心狗肺，如果真有本事，今天倒要试一试，否则，你应该

哀求我给你留条活命。”说完，哈哈大笑。罗布说：“即使我死九次，也绝不向你这没良心，吃咀咒的人投降，我立誓要把你和吉沙大吉的全家消灭。”说着说着，就拖着脚镣向彭措登达冲了过来，吓得彭措登达退了几步，从看守者的手里夺过刀来，将罗布刺死。从此，炉霍土司同古堆聂格家结下了不解的冤仇。

贡布朗结出生后，据说当地有一位比较有名的喇嘛摄日呼松登真就说是“魔鬼”的降生，而另外两个喇嘛白马邓登和冲兹拖则又说是“护法神”的化身。贡布朗结长大后，身躯中等，皮肤油黑，眼睛发红，身强有力，从小就喜欢伤生害命，见到麻雀、老鼠、虫虫、蚂蚁都要将其整死。青年时期更好打架斗殴，常常挑拨他人互斗，他在旁煽惑嬉戏，寻求乐趣。对于同他伙同游荡的人，顺从者毫不吝惜地给予一切东西，反对的则要遭到他的毒打；其兄罗布外出抢劫，一般要带他去，否则便吵闹不休；他还常把家里的食品，散发给邻近的穷孩子们吃。与他年龄相差不大的人，对他也甚拥护。

贡布朗结机警狡诈。有个叫赤加充翁大吉的人，力大无比，为人正直，对贡布朗结的抢劫行为，常有所指责。贡布朗结虽有所闻，但自知斗之不过，只好佯装不知。一天，贡布朗结同甲日拉马泽仁等带了几个小伙子在一条小路上遇见赤加充翁大吉，充翁大吉指着贡布朗结斥责说：“你脸黑，心黑，干尽坏事，比寡妇的心肠还要狠毒。今天相遇，不是你死，就是我活！”说罢，从腰里抽出刀来，准备厮杀。贡布朗结转身就跑，并连叫：“兄弟，不要这样！”充翁大吉又向与贡布朗结同行的小伙子们说：“跟好人，学好人，跟端公，扛邪神，你们常跟他走，谨防带坏了你们！”等充翁大吉走后，甲日拉马泽仁向躲在岔路坎下的贡布朗结说：“他只有一个，我们是几个，还怕打不过他，看你吓得跑都跑不赢，害羞不！”贡布朗结听后，反而哈哈大笑。他说：“对付敌人，该斗智时，要斗智，该斗力时，要斗力。我们不能和绵羊打架一样，光用角来顶，那样会吃亏。要知道聪明的人和

人斗，要知己知彼，若要偷窃人家，就得先摸清对方看家狗的脾气。莽撞行事会得不偿失。我自知体力敌不过充翁大吉，如果与他硬斗，两个都死是我的失败，我一个死了那岂不更惨。况且我还有许多仇要报，你们不能把事情看得太简单了。”以后，充翁大吉便处处遭到贡布朗结的暗算，被弄得坐卧不宁，直至无法在新龙安身，远奔他乡。

坝格家和阿珠家在当地都较有势力。贡布朗结挑拨两家进行械斗。他躲在坝格家，帮助打阿珠家；又躲在阿珠家打坝格家。一次，在阿珠家的主要人物伟朗泽登被打死时，他躲在坝格家开窗窥看，被阿珠家的人举枪射击，一弹击落窗棂，弹伤了他的左眼，从此成了“独眼龙”。对此，他十分恼怒，一般人在他面前，都忌讳说“瞎”字。他竭力反对施用挖眼、断肢等残伤人体的刑罚。他说：“一个人最宝贵的是眼睛，有了眼才能看清一切，对一个人施用挖眼、抽足筋、断四肢等酷刑，就不如干脆把他杀死。”所以在他统治下的地方，一度废除了挖眼、断肢之类残伤人体的刑罚。

贡布朗结成年后，先娶下大盖土司下属的大头人日日本的女儿知玛为妻，继又强娶上占锡巴巴登家的女儿牙西为妻。知玛生有三男四女，长子其米贡布，次子邓登贡布，三子东登贡布，四女泽旺知玛后嫁与理塘的拉翁仁真，五女阿娜嫁与上占大盖土司下属头人沙德本，六女侍朗知玛嫁与道孚有钱有势的冻拉家，七女班初嫁与德格林惹土司家，牙西生有一男三女，长子松达贡布，二女呷绒知玛嫁与下属的头人门居本，三女丹珍知玛嫁与朱俊土司家，四女夏都知玛嫁与喇嘛绒它阿波。

通过家族发展和上述的联姻关系，罗布七力和贡布朗结逐渐扩大了家族的势力，同时在敌人内部安下了亲信，为贡布朗结势力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二、贡布朗结实力的扩张

贡布朗结在祖母和父兄的耳濡目染之下，从小就蓄意报雪家仇，成年之后，曾先后袭扰炉霍和上、下占地界，并进而侵占甘孜、德格、理塘和明正土司的领地。还绑架德格第十九代土司切孜、麦打比多吉和部份有一定声望的话佛、喇嘛到本土官寨，和清军进行了数次抗争。于一八六五年，在藏军和清军的夹击下，自焚身死（？）。

1、袭扰炉霍土司与第一次抗击清军

清嘉庆末年，贡布朗结大约二十岁左右时，为报世仇，常结伙到炉霍土司的辖区内进行抢劫。在抢劫穷哥部落时，他以少数武装打死了不少穷哥牧民，并抢走了他们大量的牲畜和财物，迫使幸存者流离失所，整个部落趋于解体。炉霍土司为此向四处告急。与炉霍土司有姻亲关系的康定明正土司，在得到告急文书后，即转向清政府控告贡布朗结及其父亲罗布七力劫掠邻部、杀人越货的罪恶行径。清政府派兵进剿，由甘孜南下上占堆，从大盖过桥后，猛扑切依，包围瓦达波绒，是时，贡布朗结尚带领部属攻打炉霍未归，其父罗布七力也没有在家，只有贡布朗结的二哥俄温布拉马在官寨固守。布拉马见情势不妙，假意提出投降，派代表同清军谈判。在取得清兵同意后，布拉马将茶叶、酥油等堆放在官寨外面坝子上，铺上毡毯，迎请清官。清军派武官郭某前往受降，不知何许，仅带了少数随从武装，不料在到达受降地点时，刚一就座，即被布拉马枪杀。清军大怒，又包围了切依寨子，并向其发起攻击，于当晚放火烧寨，布拉马被烧死寨内。

清军烧毁瓦达波绒后，以为事已平息，遂将中占领地划归上下占土司统属，命令上下占土司加强戒备，以防再乱。

清兵走后，上下占两土司侦知贡布朗结隐匿在卡娘地方，遂相约出动武装，意图捕杀。但两土司对贡布朗结都有所畏惧，行动上也不够一致。其间，热鲁土司直扑卡娘，抓住了贡布朗结之母及其部份随从；大盖土司则先取切依，枪夺了贡布朗结的家产，然后才去卡娘。在大盖土司到达卡娘后，热鲁土司即将贡布朗结之母转交与大盖土司，以为这样可以加深贡布朗结对大盖土司的仇恨，从而放松自己。大盖土司则认为：掌握了贡布朗结的母亲，可以避免贡布朗结对本土的进攻，并且派出一个头人前往管理切依地方的百姓。

贡布朗结在掌握上述情况后，突于一个夜晚袭击了切依，将大盖土司所派头人全部俘虏；还写信给大盖土司说：“我已经重新掌管了属于我自己的土地和百姓。我这里现在有几条牛（俘虏），准备宰杀后送还给你。你如果愿意和我友好，就应该把我的母亲和随从放还给我，否则，我发誓要把你们一家消灭干净。”信中还把大盖土司邓珠汪加的“汪加”二字故意改写成“知玛”，讽刺大盖土司是女人而不是汉子。

邓珠汪加见信后，慑于贡布朗结的威力，只好派人把贡布朗结的母亲和随从送还给贡布朗结，找回自己派到切依的头人；将占据的切依地方，归还给贡布朗结。双方同时约定以后互不侵犯。

这件事使贡布朗结的声威有了很大提高。他又趁势带人马到了卡娘，宣布卡娘地方本来就属于他的管辖范围。又将他在卡娘躲藏期间向热鲁土司报告他行踪的阿里阿充处死。对于那些在他被追捕期间向热鲁土司讨好和接近的人，分别处以罚款或鞭笞。还胁迫那些既不受大盖土司也不受热鲁土司管辖的大小部落，归附于他或交出地方由他管辖。他曾威吓汤热地方的头人司朗泽仁说：“如不交出土地就要消灭你的全家。”司朗泽仁无力抵抗，只好逃走。贡布朗结便占据汤热，拆了司朗泽仁的房屋，征调汤热和卡娘两地的民夫，无偿为他修造了一座大寨子，取名“汤热打木

卡”(意为滂热虎寨),将全家迁去居住。

2、占领大盖土司领地

清道光二十五年(公元一八四五年)前后,大盖土司为邓珠汪加。该土司头脑迟钝,庸懦无能。土司诸事均取决于其妻班珍。班珍系热鲁家的女儿,性情暴戾,待人刻薄,妒嫉贪婪,奸淫放荡。邓珠汪加同班珍婚后,生有两男一女,女儿扎西知玛嫁与贡布朗结之子其来贡布为妻,为此受到热鲁土司的斥责,认为不应与贡布朗结结联姻。班珍迁怒于丈夫,夫妻在争吵中,班珍竟动手打了邓珠汪加,致使邓珠汪加羞愤自杀。邓珠汪加死后,下属头人畏惧,恐贡布朗结借机进犯,于是共同商定将土司的两个儿子分别送到大盖仲登寺丹珍活佛和热鲁土司两处暂避,由头人们轮流掌管土司的职权和家事。

大盖仲登寺的丹珍活佛是邓珠汪加的弟弟,在宗教上有一定威望。班珍不甘心于土司的大权旁落,想拉拢丹珍,从头人们手里夺回土司职权,遭到了丹珍的拒绝。班珍于是同其婢夫热阿格登巴企图谋杀丹珍,以篡除头人们对他的支持,然后再夺取职权。丹珍得知是项阴谋后,为避免互相残杀,即同侄儿潜往昌台躲避。

贡布朗结得悉大盖上述情况后,派人到大盖劝班珍带回他在热鲁家的儿子到中占居住,说是以后可以两家合为一家,共同巩固土司的职位和统治,实际上是企图用软的办法,从孤儿寡妇手中夺取大盖土司的权力和地盘。大盖掌权的头人们知道贡布朗结的意图后,一致反对,同时对热阿格登巴以土司自居的狐假虎威的行为表示不能容忍。热阿格登巴自知在大盖势弱,于是往投贡布朗结,说大盖头人中热则亚马顺企图杀害他和土司的儿子,篡夺权位,请求贡布朗结给予保护。贡布朗结觉得时机已到,便通知热则亚马顺必须遵办下列三条:①将班珍和她的儿子送到中占;②不许头人住大盖土司的官寨;③不许头人代行大盖土司的职权,

管理百姓。头人们不愿,为防止贡布朗结的进犯,加强了戒备。

贡布朗结出动了历依和卡炭地方的武装,包围了大盖的村寨和寺庙。经过十天的战斗,贡布朗结断绝了对方的水源,使被围处所感到威胁,大盖众人只好宣布投降。贡布朗结为了收买和拉拢人心,对众人一律不加拘捕,只责备他们不应该妄图取代土司职权的错误,责令他们今后要老老实实地服从管辖;对于在战争中有人烧了仲登寺丹珍活佛的财产一事也不追究;委派热阿格登巴为驻大盖头人;同时将班珍送回大盖。

为压服班珍,贡布朗结一次指着她说:“你这个寡妇,与人勾通,逼死大叔,撵走二叔;你家还伙同章谷土司打我,勾结热鲁土司害我。象你这样一个没有内外的女人,本不应留在人间,但因你是个女人,我也不加害于你,但今后一定要听话才对。”班珍不受压服,反唇相讥说:“你这个瞎娃娃,不但六亲不认,连喇嘛也要杀;口头上你讲经说法,行动上你作孽造罪;当面你喊叔叔,暗地却要灭掉大盖,你把我这个老婆子杀了算了”。边说边扯贡布朗结的衣服,并向他吐口水。贡布朗结一怒,下令把班珍送到里他村看管,不许她自由活动。

以后,班珍的女儿,贡布朗结的儿媳扎西知玛责怪贡布朗结不分亲疏,整垮了大盖土司家,请求班珍接回由她负责供养。贡布朗结说:“你们女人家知道什么,你妈是个魔鬼,接她来菩萨会降灾烧房子的。今后你可以给她送些饮食去,劝她多念嘛哩,但不许和她见面。”扎西知玛以后常常背着贡布朗结去看望班珍。半年以后,班珍得了疯病,在里他村的人管不住她的时候,贡布朗结下令将她丢河处死。

大盖土司下属的十五家头人,本来就耽心贡布朗结总有一天会迫害他们,眼看贡布朗结把班珍丢到河,便相率带着全家逃去青海,并一同到北京向清政府控诉。清政府当时正忙于对付太平天国,无力受理此事。于是他们又到西藏地方政府那里控告,后在藏军东来攻打贡布朗结时,他们也随军回到康区。在贡布朗结

被消灭以后，他们才从青海接回家属，在甘孜的罗锅梁子落户定居，成为甘孜的热血部落。

贡布朗结占据大盖以后，为巩固统治，防止反叛，把那些素来亲近大盖土司和在逃十五家头人的亲属，分别迁到色威、卡娘和切依地方，而把对自己忠实的人迁到大盖。

3、灭除热鲁土司

贡布朗结占据大盖土司的领地以后，把进攻矛头直接指向了与己有世代冤仇的热鲁土司。当时，热鲁土司，大班格的曾孙呷绒贡布死后不久，遗下妻子阿扎娜姆，独生子普巴贡布和母亲乌金娜姆三人共同执掌土司权力。普巴贡布年纪尚幼，一家人本来就怕贡布朗结前来报仇寻衅，见到大盖土司被消灭以后，更是食不甘味，坐卧不宁。为防止意外，当时住在热鲁家的绰斯甲呷绒得登喇嘛希望把普巴贡布带走，由他加以保护，阿扎娜姆没有同意。只是请了石渠的里拉活佛前来念经打卦，做了灌顶等佛事活动。为防御贡布朗结的进攻，乌金娜姆召集了下属头人商议，决定分别将所属武装力量集中起来保卫土司官寨。

贡布朗结得知上述情况后，也立即召集所属头人商议攻打热鲁土司的具体步骤。头人安却勒乌玛主张先发制人，提出要在热鲁家的武装尚未组织好之前，即行进攻。贡布朗结采纳了这一意见，他说：“灭火就是要灭在火小的时候，等到火燃大了再灭，就不那么容易了。我们就是要在普巴贡布还未成年的时候加以消灭，要知道等普巴贡布长大成人以后，就必然不是那样好对付的。对热鲁家我们是决不能轻视的。”于是决定调集队伍，配备武器，除将明火枪、刀矛、斧头、钢剑以及进攻碉楼的云梯、挡板全部组织备用外，还组织了一百人的先锋队，分兵占据了新龙境内的雅洛江两岸地区，包围了热鲁家的官寨。连续十五天没把热鲁家官寨攻下，仍采用安却勒乌玛的主张，将热鲁土司下属头人的家属，全部搜捕押解到官寨前来，并向寨内喊话说：“看你们

是保自己的家属，还是要保土司寨子？如果要保自己的家属，就要赶快投降，我们可以保证你们的生命安全。”与此同时，还断绝了通往官寨的水源。寨内头人恐慌不安，动家慈日交、阿尼泽仁等头人，率先相约从寨内逃出向贡布朗结投降。逃亡在这里的大盖土司的儿子，也带了几个随从离开寨子，逃往理塘。热鲁家见人心涣散，只好委托甲冲和甲通两个喇嘛，出面和贡布朗结谈判投降，条件只提了一个，就是希望能够保证热鲁家人的生命安全。贡布朗结接受了投降，当面发誓决不杀害热鲁家的所有人。

这时寨内已经断水五天，在寨门开后，久渴难忍的人们，潮涌般地扑向河边，其中也有里拉活佛。贡布朗结见此情景，即讽刺地说：“快跑吧，快喝吧，雅洛江的水，你们是永远喝不完。”

贡布朗结占据热鲁以后，占堆寺的呷马和直热寺的个别喇嘛恐遭迫害，先后逃往理塘。不久，贡布朗结果然自食誓言，将普巴贡布丢河处死，将乌金娜姆和阿扎娜姆分别送到甲日和雄龙西两地隔离居住，同时没收了热鲁土司的全部财产，将热鲁土司嫡系前辈的尸尸（藏族习俗，人死后不葬，用盐腌后放在家中房屋的最下层），也清除丢弃河内。家庙内的泥塑佛像，全部捣毁，经书、画像、法器和金属铸造的神佛像等，则转移放置其它寺庙保存。还把历代皇帝颁发赏赐给热鲁土司的印信、号纸、官服、顶戴等，扔进雅洛江里。佛说：“我既不效汉官，也不做藏官，而是要靠自己的力量发展起来，才是我要做的官。”

为庆祝胜利，贡布朗结把热鲁土司的全部财产，分散给了所属的官兵，把热鲁百姓送来的牛、羊肉，青稞酒等全部犒赏部属，还从收缴热鲁土司家庙的法器中，选出几具珍贵的钵钵，赠与甲日和甲通两个喇嘛，以酬谢他们两人出面调解。最后命令他的三儿子东登贡布为热鲁本，委派朋它寸呷玛担任辅佐。原属热鲁土司私有的草场、房屋、土地，全部划归东登贡布，又调集民

工将原有热鲁土司的官寨加以培修，自己也移居到热鲁土司的官寨驻扎。

为了彻底肃清热鲁家的势力，贡布朗结命令下属头人率领一支约四、五百人的队伍进驻下占，迫使热鲁土司下属的朱俊等村庄全部投降；接着曲依地方的龙拉西、子拖西、普巴绒（现属雅江）等几个部落和更龙、博孜、雄龙西等部落也相继投降。到此，贡布朗结又完全占领了热鲁土司的辖区。

4、统一新龙全境

贡布朗结占领了大盖、热鲁两土司的辖区以后，虽然扩大了势力，报了家仇，但在新龙境内一些原来归属于两土司的部落，并不接受他的统治。其中，住在上占大盖与沙堆两地之间的日巴头人“阔昆”即为一例。

当贡布朗结占领大盖土司领地以后，阔昆自恃有点力量，不肯向贡布朗结投诚，贡布朗结由于统治力量还不很巩固，人心也还没有完全归顺，暂时未予置理。到占领热鲁土司领地后，便把矛头指向尚未归顺的分散部落。他调集队伍到了大盖，并挑选了五十名身强力壮的青年组成先锋队，扬言要攻打炉霍土司，却趁夜将日巴本的寨子和他所管辖的村子一齐包围起来。在突然袭击之下，大部村寨被贡布朗结占领，只有日巴本的寨子进行了顽强的抵抗。当时阔昆的弟弟泽汪贡布和家属都住在牛场，寨子里只有阔昆和十几个人，由于寨墙坚固，抵抗顽强，贡布朗结尽管使用了云梯和挖地道等手段，都没有获得进展，于是下令放火烧寨。先锋队队长甲日拉玛泽仁组织了三次放火都没有成功。

在寨子被围时，阔昆有几个亲信跑到牛场给泽汪贡布报信，要他组织力量前往救援，其母亲和他的妻子力阻，方同逃去了炉霍安身。阔昆在久困无援的情况下，渐渐不支。贡布朗结又再次放火，终于将寨子烧了起来。阔昆从火中冲出，冲过了两道战壕。甲日拉玛泽仁紧追不舍，并在后面高喊：“抓住阔昆，不要

放他逃跑了！”阔昆回马再战，甲日拉玛泽仁趁势用“套枪”（长矛两端各有一环，环系皮绳约两丈，对敌时举枪围时撒绳，将对方套而刺之）一枪刺死。贡布朗结在占领日巴本的寨子后，即组织人马去追击泽汪贡布，未能追上。

下占的下坝（现属理塘），各巴，君坝（现属理塘）三地，原来是热鲁土司的附属部落。其中，下坝有下他木、麻他木、阿苏本三家头人。阿苏头人丹松贡布，善于集聚财势，对地方有较大影响。他们在热鲁土司被消灭之后，没有归顺贡布朗结，而是就近投靠了理塘土司得雍。贡布朗结认为，如不加以制服，不仅失去了一片气候温和、土地肥沃的好地方，而且还会留下后患。因而指令其子东登贡布立即向下、各、君三地采取行动。

东登贡布组织了以色威呷马棒和动家恶日交为首的先锋队，向下坝发起进攻。在战争中，阿苏家的丹松贡布无力抵抗，携妻逃走，被东登贡布追杀了全家。下他家的贡布松批和麻他家的郎吉泽仁，在抵抗中也先后被杀。贡布朗结下令没收了阿苏等三家的全部家产，把其中牛场部份，分别布施给下坝各寺庙，作为超度阵亡人员之用，又把他们家中经常所藏的经典、佛像、法器 etc 等宗教物品，交与新龙各寺庙使用。下坝各头人被消灭以后，各巴、君坝的头人，慑于贡布朗结的威力，相继来降。贡布朗结委派色威呷马棒为下坝头人，阿尼泽仁邓珠担任头人助手。

贡布朗结在地域上统一了新龙全境，思想上也要求所属各部对他绝对忠顺。先后处理了如下几件事例：

林达小头人邓珠莫是贡布朗结的二姐阿娜的丈夫。邓珠莫平时对贡布朗结的所作所为不大赞同，甚至提出过反对意见。贡布朗结对之十分不满，曾说：“坏人放在地方上，地方不安；寨子放在森林里，森林不安；内衣烂了最不好，内部出奸最危险。”于是指令部份随从设法把邓珠莫除掉。邓珠莫闻讯后，很快携带妻小逃去了昌都。

希达小头人呼俄大青是贡布朗结的妹妹扎西德姆的丈夫，好饮酒。常酒后失言，泄露贡布朗结的机密，给贡布朗结带来过损失。贡布朗结认为他是个不知利害的人，留着有害，密派仲巴次仁大吉将其揪下悬岩致死。

额德头人贡布汪加是贡布朗结的姐姐司郎措的丈夫，因见贡布朗结残害内亲，害怕整到自己头上，遂遣妻前往探视消息。司郎措见到贡布朗结后，假意哭诉贡布汪加对她母子虐待。贡布朗结劝慰姐姐说：“这个骝子对我是不满的。我在新龙是最大的头人，任何人都归我管。官了官，私了私，不能因他是我的亲戚就不服管。姐姐，你不必难受，也不要吭声，我帮你整他很容易的。”显露了对贡布汪加的恶意。司郎措回家即与贡布汪加集结所属，商得炉霍土司的同意，掩护他们经罗科马、果洛、青海等地到现在的阿坝州红原县麦洼地方定居下来。只有下属部落中的甲措和白宗两家小头目，随带了十五户人家，向贡布朗结投降。

5、与清军进行第二次对抗

道光二十八年（公元一八四八年）前后，大盖土司家逃依理塘土司的后人和管家，在理塘遇到清政府驻西藏大臣琦善返京述职，于是央请理塘土司代向琦善控告贡布朗结。琦善认为大盖和热鲁两土司均为皇帝封册，贡布朗结攻占两土司辖地，无异对抗皇上，应该进行镇压。琦善到了康定，又收到霍尔五土司同样内容的控告。对此，琦善除将情况上报外，又命令霍尔五土司和明正、德格两土司，巴塘、理塘两土司，以及吉塘（中甸）土司共十个土司，聚集兵力，准备征剿贡布朗结。

贡布朗结闻讯立即采取了应战措施：①消除异己，把那些有声望、有势力而又与自己意见不合的头人迁移到其它地方，加以控制。②补充兵源，征集十八岁以上六十岁以下的男子组成武装，听征入伍。③精选三百名骁勇善战青年编为先锋队，进行攻守

训练。其余应征人员分编为三队，即有马，有枪，有刀的，编为骑兵队；无马，有枪，有刀，有斧头的，编为步兵队；无马，无枪，只有刀、斧的编为守兵，其任务为防守村寨、要道、山头、路口。三个队的人员，令各部签订核算。④在险要路口堆集滚木擂石，设置障碍。⑤把能偷盗的人，派到新龙以外的各土司辖区，去进行抢劫偷盗，所得一律归己；遇有敌情，立即返回报告。⑥在山上设立岗哨，以嘉烟烟和倒树为信号，报告敌情。⑦百姓财物，一律密藏，只留老弱人员看家守户。⑧明确宣布：凡在战争中，毙敌头领一人者，奖马一匹；生俘青，奖马一匹，枪一支；毙敌士兵一人者，奖犏牛一头。均以所缴之头颅或手、足、耳朵为证。

战争开始了，除吉塘、巴塘两土司因认为距新龙较远，不会受到威胁，没有出兵外，其余八土司组成的武装部队，分三路由甘孜、道孚、理塘向新龙包围前进。从道孚向新龙进攻的是朱倭、炉霍、明正三土司所辖的部队，他们在新龙中占的麦科牛场与贡布朗结的部队接触，展开激战。在贡布朗结的坚决抗御下，进攻者被击退了。明正土司的作战参谋，颇似活佛又出面指挥第二次进攻。战斗中贡布朗结使用的明火枪发生爆炸，吓了他骑用的战马，一时指挥失灵，引起混乱，部队受到挫折。这时，部份百姓认为贡布朗结注定要失败，监狱里被关的犯人，也纷纷越狱逃跑。但贡布朗结通过顽强抵抗，仍然坚守了阵地；又组织部人突围成功，向进攻部队实行围击，截断其运输线；还不时组织夜袭，抢劫对方的辎重财物，给予骚扰，逐渐使对方陷于被动。加之，各土司的军队在新龙奸污妇女，抢劫钱财，激起民愤，更加强了贡布朗结所部的抗御能力。争战六个月后，进入冬季，气候严寒，各土司所部的士气更渐低落，眼看无法取胜，只好分批撤军。贡布朗结利用敌军撤退之机，组织掩杀，大获全胜。又令将所斩敌人头领的首级悬挂于交通要口，使敌军丧胆，消失斗志，整个战役，八土司所部伤亡惨重，仓惶败逃，遗尸遍

野。

在这次战争中，新龙人民除老弱妇孺外，大部参加了作战。贡布朗结明令宣布，所有缴获，一律归参与作战者所得。这样，在战斗结束后，许多人都兴高彩烈地议论自己的斩获，对贡布朗结更加信任。贡布朗结的威信也随之得到提高。八土司这次对贡布朗结的进攻，只招致了对方的仇恨，并以失败而告终。

各土司并不甘心于自己的失败，他们又到康定向驻军统领诉苦，统领告之以“贡布朗结必须消灭，否则康区不得安宁，已报请川督，准备出兵！”并要各土司作好配合作战和支应乌拉的准备，不得贻误军机。

第二年，四川总督琦善又亲自率川陕之兵，带着明正土司和倾则活佛，由康定出发，到炉霍扎营。途经乾宁、道孚时，专门接见了霍尔五土司。德格土司和竹庆活佛，也分别在炉霍受到接见。雅州府专派武官马某，亲率清兵五千，前来炉霍听命。这次清兵入康和各土司的部队集结，各地人民支应乌拉，供应军需，被闹得乌烟瘴气，民不聊生。以致炉霍寿灵寺的喇嘛编了一则顺口溜以讽刺清军进攻的必然失败。顺口溜说：“统领亲自到藏区，土司受宠应领情；贡布朗结命不绝，坐等你们来孝敬。”

贡布朗结得知清兵临境，当即下达战斗命令，并提出如下口号来表达战斗决心：“出击必胜，威信必树；”“坚守阵地，不失寸土，”“保护生命财产，坚决为占堆争光；”“即使男人死亡，剩下女人也要战斗到底，决不投降。”等等。

琦善深知对贡布朗结不能速战速决，因而采用分段设防，步步进逼，长期作战的战略和策略，动员民兵，修筑道路，以保证补给和运输；同时命令驻屯上占达拉松布地方的先遣部队，在那里筑工事，挖战壕，修营房，种蔬菜。然后将所部五千清兵，分由甘孜、炉霍、道孚三路向新龙进攻。由炉霍进攻的一路，由炉霍土司的武装配合，先进入新龙境内，同贡布朗结展开激战。战斗开始，炮声震动新龙山沟，但在贡布朗结的坚决抗击下，

清兵毫无进展。贡布朗结又利用清兵不熟悉地形的特点，组织进行敌后扰乱、截断运输线、突袭、夜袭等游击战术，使清军疲于奔命，首尾不能相顾；加之，清兵大部初到高原，水土不服，军心厌战，时值咸丰皇帝的太后薨逝，粮草又不能保证供给，以致相持二月，清军即陷入被动。为了结束战局又能给自己留下一点面子，琦善提出进行谈判。在取得贡布朗结的同意后，清军派倾则活佛为代表，贡布朗结派色威甲马棒为代表，举行谈判。谈判中，清军只要求贡布朗结退还给被夺走的两门大炮，即承认新龙，炉霍，理塘边界不变，宣布贡布朗结为新龙大头人，统辖原大盖、热鲁二土司的全部领地，并颁赐给官服、顶戴，承认这次出兵是错打了好人。这样的条件，无异是向贡布朗结投降。贡布朗结当然乐于接受，当即退还给两门大炮，限令清军撤军。

清军撤走后，贡布朗结得意地说：“以前张统领想整我，象兔子一样，咀皮分成了两半。这次清军和其它土司又都变成了狐狸的尾巴！”从此以后，贡布朗结又自诩为“天生的一条好汉”，受到了下属部众的颂扬。

清军撤退后，假报皇帝说贡布朗结已经归顺，申请颁发给官服、顶戴。当色威甲马棒将清政府颁发的委状、官服、顶戴送给贡布朗结时，贡布朗结鄙弃地说：“清政府想用这些杂拌来收买我，他不感到羞耻吗？我是下了决心既不作汉官，也不作藏官的，也不需要戴这样的蒙古帽子，俗话说：‘甘丹寺的喇嘛是在台阶上一步一步坐上法台去的，’有本事的人就要能一步一步地走上最高的坐台。”又对色威甲马棒说：“这些东西你要是喜欢，你就拿去，你不要就把它丢到河里去。”虽经色威甲马棒一再劝说，贡布朗结都坚持不接受，最后只好将这些衣物全部丢进了雅鲁江。

战后，贡布朗结对所属部落进行了整肃。下占的拉马牛场部落曾接待过清兵，贡布朗结收缴了该部落的全部财物。其它，凡与清兵接近和有过来往的人户，也都分别轻重进行了罚款、鞭笞

等惩治。

贡布朗结在这次取得胜利后，曾编写了一首山歌，借以讽刺各土司和表达自己得意的心情。歌曰：“四个女土司（他把德格、理塘、明正和霍尔五土司都说成是女人，以示轻蔑），嫁给清统领，汉人扫兴回内地，女土司枉费心机，自取薄命！”

6、攻占炉霍

对清军作战的胜利，使贡布朗结的扩张野心进一步发展和膨胀起来，同时也增强了他对新龙周围各土司的仇恨。特别是对炉霍土司，他认为：不仅杀害了他的哥哥罗布，连续三次邀集各土司，伙同清军攻打新龙，同时，新龙与炉霍毗连，每次进攻新龙，炉霍都是敌军的前沿阵地和物资支撑点。因而不消灭炉霍土司，新龙就不得安宁。他下定决心，坚决并吞炉霍土司。在清军撤走后的不长时间里，贡布朗结先后同炉霍土司进行过七、八次激战，没有达到目的。于是，他变换策略，采用了分化瓦解的手段，对炉霍土司下属进行了收买拉拢，各个击破。他先后派出瓦里甲绒扎西和色玉登僧二人带了十几个人到炉霍把头人吉沙大吉的寨子包围起来，把吉沙大吉杀死，将脑袋和他的儿子带到贡布朗结常住的滂热地方。贡布朗结又亲自把吉沙大吉的儿子凌迟处死，并剖腹挖心，悬首级于路口示众，以报仇恨。继又突袭占领了炉霍区牛角场（今团结公社），胁迫区角小头人翁扎，要其子暗杀炉霍土司下属头人吉绒（现斯木）拉柯，后因走漏消息，吉绒拉柯出逃，仅其家属被杀。炉霍土司为此诱捕了凶手，在准备处死时，因监狱看守受贿被逃走了。

贡布朗结又派部队去攻打炉霍土司的管家杜柏的村寨。杜柏虽偕其子出逃，但贡布朗结在占领杜柏村寨后，将其家产全部收缴。同时，在杜柏家里抓住了一个与炉霍土司之妻有暧昧关系的寿灵寺发神喇嘛。贡布朗结亲自审讯，得知实情后，一方面将发神喇嘛加以释放，同时又公布其与炉霍土司之妻通奸的丑事。丑

闻传遍炉霍，引起群众和下属同炉霍土司的分崩离析，为贡布朗结攻打炉霍打下了心战的基础。

与此同时，炉霍土司的另一管家楚洛占登，由于管理寿灵寺过严，被寺内喇嘛扎巴撵出寺庙，又被土司撵出村寨。楚洛（在甘孜县城附近，当时属炉霍土司管辖）头人趁机没收了占登的全部家产。在得不到炉霍土司信任，保护的情况下楚洛占登投靠了贡布朗结。贡布朗结即派了十几个武装人员同楚洛占登返回炉霍报仇。在楚洛，他们将人枪埋伏在村里，然后由一人化装乞丐到头人家门口讨饭，几个武装人员紧随其后，伺机一同进入大门，里应外合，杀死了正在经堂叩头拜佛的楚洛头人和家属多人。

以上事实大张了贡布朗结的威风，打击了炉霍土司的士气。贡布朗结认为时机已经成熟，于是集结队伍，沿鲜水河两岸向炉霍攻击前进。炉霍土司在罗科马组织抵御。贡布朗结围攻土司官寨，连续数日未能攻克，即暂时撤退。不久贡布朗结又集中了更多的兵力，组织了一百多人的先锋队，向炉霍挺进。炉霍土司携眷逃离，交管家代理土司职权，指挥抵抗。贡布朗结再次包围了官寨，激战十六天，官寨仍未攻下。寨内喇嘛还不时向外冲杀，双方互有伤亡。但炉霍方面，因土司逃离，寨外各地的大小头人无心恋战，纷纷向贡布朗结投降，以致影响到官寨的防守。在情况十分严重的情况下，老头人亚马贡布和寿灵寺的喇嘛、活佛，派代表叫守寨的管家出来投降。贡布朗结除将有名望、有势力的头人和喇嘛以及在战斗中表现勇猛的扎巴等押解去新龙外，其余全部释放回家。

贡布朗结占领炉霍后，即在那里修建了一座官寨，命令洛古泽仁为炉霍大头人，负责驻守。

7、奔袭甘孜

贡布朗结占领炉霍后，又随时觊觎着甘孜、德格各土司的

界。他对甘孜、德格两土司，采用了远交近攻，亲疏不定，挑拨分化等手法，如在一段时间内，他同德格、白利两土司来往甚为亲密，引起甘孜孔萨、麻书两土司的疑虑。过一时期，贡布朗结又与孔萨、麻书土司虚与周旋。他曾对孔萨土司说：“德格、白利土司有侵犯你们的野心，为了孔萨和麻书两家的安全，我愿意和你们联合起来，攻打他们。”孔萨土司提出：我们和德格、白利土司之间，仅只在草场的划界和使用上有一点纠纷，其它没有什么大的矛盾。贡布朗结又将孔萨谈到的与德格、白利之间的矛盾，加以扩大，进行挑拨煽动。不久，就举兵攻打甘孜。

在进攻甘孜时，贡布朗结要部队边打边退，借以麻痹敌人。孔萨、麻书两家不知是计，认为贡布朗结不像人们传说的那样勇武，初步产生了麻痹思想。贡布朗结又打又撤，甚至还伪装失败，更加增强了孔萨、麻书两土司的轻敌情绪。但时隔一个多月，一天夜里，贡布朗结率部突然袭击了两土司所辖的各个村子，把头人全部抓起来，占领了雅鲁江两岸的全部村寨。百姓在失去了头人们的统领以后，很快归顺了贡布朗结。麻书措麦和孔萨恩珠彭措两土司，孤军困守官寨，自知失败难免，举家逃去了金沙江以西。孔萨家族的香根活佛和随从小头人，纷纷出寨投降。

孔萨、麻书两土司的结局，直接影响到甘孜的其它土司，他们更加害怕贡布朗结的威力，不敢稍有抵制。不久，白利、东谷两土司，也分别派人向贡布朗结投降。朱倭土司洛色，则因娶了贡布朗结的女儿丹珍知玛，自愿接受岳丈大人的控制。

至此，贡布朗结完全占有了霍尔五土司的辖区，占领了甘孜全境。他委派部属侍郎翁扎、哈热巴西邓珠为驻守甘孜的大头人，委派阿尼侍郎泽仁为驻守绒坝岔的头人，洛色仍为朱倭头人，并分别在甘孜县城和朱倭各修了一座官寨，加强统治。

8、覆灭德格

炉霍、甘孜既经得手，贡布朗结又把攻击矛头指向了德格土

司。贡布朗结对德格土司素有怀恨，原因是：德格土司曾和清军以及各土司共同征剿过新龙，使贡布朗结一度受挫；德格和新龙还常常发生草场纠纷，德格土司总是以势压人，强使新龙让步；新龙历代土司每年都要向德格土司赠送厚礼，表示臣属；贡布朗结发迹前，对德格土司总是要毕恭毕敬地以舅舅（藏族对族外长辈的尊称）相称，以示尊崇。最使贡布朗结饮恨的是：德格土司曾写信给毛垭土司，邀约共同攻打贡布朗结。信中说：“新龙出现了魔鬼的化身，瞎子威胁着周围的土司，希望你们能团结一致，在敌人还较弱小的时候就把他加以消灭。否则小火蔓成大火，小祸酿成大祸，到头来我们都会追悔莫及。”这封信被贡布朗结的部属截获，贡布朗结对此一直隐忍未露。甚至连毛垭土司对这封信也一无所知。但在贡布朗结的内心上，却对德格土司切齿愤恨。

德格土司是康区四大土司之一，势力较大，不容轻视。因而贡布朗结攻打德格土司时，采用了声东击西的战略，他扬言要南下攻打理塘，暗中却制订了进击德格土司的周密部署。一八五二年（清咸丰二年）贡布朗结部署了步兵三队，骑兵两队，分头向德格进攻。其中：中路步兵秘密由甘孜绒坝岔经赠科，麦宿前进，上路步兵由德格玉隆、竹庆向土司官寨进逼，下路步兵由白玉昌根急进。骑兵分南北两路：南路骑兵由尼木北上，北路骑兵由柯鹿洞南下。步骑兵都是夜行，形成对德格土司驻地的钳形攻击态势。当南路骑兵到达离德格土司官寨很近的欧普隆时，贡布朗结才派人送信给德格土司，告诉他贡布朗结已亲率大军包围了他的驻地，同时将其给毛垭土司的信件附上，表示出师有名。

德格土司切麦打比多吉当时只有十一岁，由其母亲和管家主事，对贡布朗结的突然袭击，感到手足无措。眼看已兵临城下，自己又无力抵抗，只好举家出逃。行至金沙江对岸的汪布堆地方时，被迫兵俘获，后被送至新龙关押。德格土司的部分下属头人和更庆寺的一些喇嘛也纷纷逃匿。贡布朗结未经激烈战斗，就占

领了德格全境，委派勒乌玛为驻德格的大头人，甲日拉马泽仁，皆乌大吉为驻德格属地的头人，同时在德格修建一座官寨，进行统治。

德格既平，贡布朗结将俘获来的德格土司及其部属分别进行了如下的安置和处理：

将德格土司关押在新龙的甲日村，将土司的母亲，明正土司的女儿甲那莎（本各曲英绒姆）关押在滂热官寨。将八邦寺的温云活佛和到德格讲经的后藏萨迦派喇嘛果玛活佛送至昔瓦寺，将呷拖寺的知麦结空活佛送至竹德寺，格泽活佛送至略空寺，将竹庆寺的奔洛活佛送至暖枉寺。

由于德格土司的随员仁批扎西和管家更甲约勒伙同部分头人逃跑到西藏去了，贡布朗结对已向他投降的原德格土司下属头人很不放心，因而把甲考司郎，索莫嘎巴，普玛布结，达本扎西格勒和汪堆泽仁多吉等分别关押在新龙的绒洛、大盖、葛扎、切依、滂热等地。

对贡布朗结兵到德格时就向他投降的头人曲登泽巴和喇嘛泽仁，因为他们曾当着贡布朗结的面咒骂德格土司统治无道，后德格土司在汪布堆被俘，被送去新龙时，又在途中私下当着土司的面诅咒贡布朗结是魔鬼。贡布朗结认为这种两面派的人不能留用，遂将二人抛入雅鲁江处死。

原德格土司下属头人中，只有夏克白马勒珠一人，由于迎逢勒乌玛和贡布朗结的女婿林慈土司（班初的丈夫），得到幸免，没有被关押。

贡布朗结占领德格后，昌都、玉树、果洛和色达等地的部分头人，也都慑于其势力的强大，先后自动向贡布朗结投诚，被放回原辖区继续担任头人，受贡布朗结辖制。

随着地盘的扩大，为了加强和巩固统治，贡布朗结把不够放心的石渠头人土登贡布，昌台略西本，理塘毛垅土司，炉霍勒科、宗麦、玉科（属属道孚）三地的头人，连同他们的家属和牲

畜，全部迁移到新龙的麦科居住；又将上述土司、头人所辖地区寺庙的喇嘛约五百多人，强迫迁到新龙，分别安置在降空、略空、西瓦三寺，以便于控制。

9、两次进攻理塘

清咸丰五年（公元一八五五年），贡布朗结发起了对理塘土司的进攻。理塘土司也即在自己的官寨内掘井、筑墙、修碉、挖壕，准备应战。双方相持了七个多月，未决胜负。理塘土司俄布冲之妻阿尼仲巴提出：可用传染天花的办法退敌。理塘土司遂集痘结若干袋，研之成末，杂于糌粑和鼻烟中，差人送至贡布朗结营中，谎称：现食尽援绝，土司决定率众出降，先送来口粮鼻烟劳军，请予允准。贡布朗结将口粮、鼻烟下发部属，天花很快流行开来，部队丧失了战斗能力，连贡布朗结的一个孙子也因而丧生，只好暂时撤退。

次年，贡布朗结挑选部分患过天花有免疫能力的人，再次组成精锐的先锋队，向理塘发起进攻。他号召部属“要为死者报仇，要在理塘人身上寻找失去的东西。”还说：“理塘是个大坝子，我们就要让他变成一个无水无草的空坝子。”他纵容士兵在理塘大肆烧杀掳掠，使贫富都大受其害。理塘土司战败，携眷逃去西藏，寺庙的喇嘛和百姓也纷纷出逃。贡布朗结乘势占领了理塘。

贡布朗结占领理塘后，率领民兵拆毁了理塘土司的官寨和大路上的桥梁，还烧毁台站，折阅文报，捆绑通司，断绝了去西藏的通路，使理塘成了一个名副其实的空坝子。为了挽回已失去的人心，贡布朗结又改变策略，宣布：“凡是投降、归顺的一律不杀、不抢，对寺庙的陈设、法器、经书、物品，一律加以保护。”当下属把寺庙大殿菩萨前的七个银质大净水碗盛了酥油、糌粑、人参果、奶渣等七样食品，象敬神一样，为他战胜理塘土司的功勋祝福时，他严词拒绝说：“这是菩萨的东西，我不能用！”这一无声的宣传，受到广大僧众的拥护。寺庙中的老喇嘛

自动组织起来向他敬献哈达，并接受他的指示，去动员那些逃跑了的喇嘛扎巴回来。老百姓得知寺庙已经投降，并且得到了保护，也纷纷转回家来。

拉汪仁增在理塘是一户富有的人家，这次没有帮助理塘土司和贡布朗结对抗，贡布朗结即把女儿汪知玛嫁与他为妻，然后通过拉汪仁增的疏通，使毛垭土司不战而降。这样，理塘土司的原有辖区，完全为贡布朗结所占有，并在此修建了官寨，委派了头人管理。

理塘被占领后，正当贡布朗结又准备攻打巴塘时，传来了炉霍、甘孜、新龙等地一部分不满贡布朗结的人，纷纷逃去西藏，或经色达逃去了青海的消息。这样，贡布朗结又改变主意，决定再次北上，截断通往西藏的道路，巩固已占领的区域，减少后顾之忧。

10、进击明正

贡布朗结同明正土司是早有宿怨的。原因是霍尔五土司和理塘土司等去康定会见清政府官吏，控告贡布朗结时，不可避免地都要通过明正土司；明正土司与章谷、德格土司又都有姻亲关系；明正土司又每次都参与了同清军一起向贡布朗结的进攻，因而对之十分仇恨。还早在贡布朗结占领炉霍之后，其先头部队在道孚一带，就曾和明正土司的部属有过接触，但没有大打。几年来各处作战的胜利，加上不可抑制的扩张野心，遂下决心攻打明正土司。明正土司对贡布朗结的进攻，也早有戒备。很早就在乾宁和道孚交界的笕灯坝子设防，防止贡布朗结的进攻。

战争开始，贡布朗结先派出布呷马和热格阿婆带领数百名骑兵夜袭笕灯坝子。双方展开激战，明正驻军方面，伤亡很重，遗尸遍野；加之，物资供应又被截断，防守已很困难，只好向后撤退。撤退中又遭到贡布朗结的追击，一直被追到丹巴革什咱地方。由于追击部队不熟悉路线，途中又常遭伏击，也有较大伤亡。因此追兵首领向贡布朗结报告说：“现在敌人已退到‘树子

抓人’，‘石头吃饭’的地方了，请示进军办法。”

所谓“树人抓人”是指部队已进入原始森林地带，由于当地树木茂密，藤蔓牵绊，荆棘丛生，使部队行进十分不便。还加上对方的潜伏和袭击，使部队不断遭到损失。至于“石头吃饭”是指丹巴西区的人，撑支三块石头熬茶做饭。茶烧好了，饭做好了，按习俗要先在支锅的三块石头尖上各撒一点茶和食物，以示敬神，然后开始进食。贡布朗结的部属用这样两句话向他报告，意思是部队到了一个非常不适应的地方，遭遇到了较大的困难。贡布朗结也因丹巴距新龙较远，又十分偏僻，决定主动放弃所占地界，将部队撤守道孚。

三、贡布朗结的败亡

对于贡布朗结的骚扰侵犯，各土司和地方政府都不断向清廷告急。但清廷当时正忙于向太平天国用兵，无暇顾及。事情却引起了西藏地方政府的严重关切，并采取了有效的镇压行动。事实上，贡布朗结在取得一系列行动后，也曾产生过侵犯西藏乃至整个中国的野心。他曾讥讽西藏穿黄色军服的带兵官为“金布色则吉马”（ཐི་འག་ཐེང་ཐི་ལྷ་པོ་དཔལ་），意为“牛粪上的黄包虫”，说，只要触动它，它是会缩足。暗示藏军软弱，没有什么战斗力。又说：“印度王子是人，清朝皇帝是人，新龙的我也是人！”表示他完全可以称帝、称王。他还说：“我们新龙很多人到西藏去朝佛，山遥路远，饱受风霜雨雪，忍饥挨寒，吃尽苦头。我们为什么不能把释迦牟尼佛接到新龙来。使新龙各寺庙的喇嘛，在新龙就可以修道、成佛！”对于贡布朗结要进攻西藏的设想，其主要头人勒乌玛是早就表示赞同的。

是时，原德格土司下属的一个头人夏克白马伦珠正在勒乌玛部下当差，他自投靠贡布朗结后，一直对勒乌玛巴结讨好，取得勒乌玛的信任。在他窥知贡布朗结有意攻打西藏时，即认为恢复德格土司权力的机会到了。他一方面在勒乌玛面前竭力吹捧贡布

朗结和勒乌玛的部队如何能征服，英勇无比；同时又极力贬低西藏地方政府和它的军队是如何腐败虚弱，不堪一击。而在暗中，他又假借西藏地方政府的名义写信给贡布朗结，要贡布朗结向西藏地方政府投降；假借贡布朗结的名义写信给西藏地方政府，要西藏地方政府向贡布朗结投降。

夏克白马伦珠假借西藏地方政府的名义，写给贡布朗结的信说：“德格、霍尔、理塘土司是西藏各寺庙的施主，其所属地区是西藏三大寺扎巴、喇嘛的主要来源地之一，绝不容许你任意征服。现在勒令你立即撤兵，恢复各土司的统治。”这封信被勒乌玛拆看后，曾暴跳如雷地大骂西藏地方政府无视贡布朗结的威严，并即刻要夏克白马伦珠代为复信。白马伦珠正中下怀，提笔写道：“西藏寺庙里供的两尊释迦牟尼像是藏族人民共有的菩萨，不应专属于西藏地方政府。我一定要把释迦牟尼佛从西藏接到康区。我的兵多如菜籽，武器锋利如针尖，我们有力对付你们的任何挑战，西藏地方政府及其所属百姓，只有向我们投降，才是唯一的出路，否则我就要出动大军开赴西藏。那时候我们会强行迎走佛像，并将三大寺的大殿作为马厩，把庙前的石碑作为马桩。我还要使印度的王子害怕，清朝的皇帝发抖，你们那些“金布色”更要丧魂落魄。这决不是一句空话。如果我做不到，我勒乌玛可以充当你们的家狗。”在这封信里，还装了菜籽、针、和狗屎三样实物。菜籽表示兵多，针表示武器精良，狗屎则表示如果说话不算数，贡布朗结和勒乌玛就如同狗屎。

西藏地方政府见到这封十分狂妄和充满侮辱性的信，十分愤怒。那些被贡布朗结侵犯、威胁而逃到西藏的土司和头人们，更从中煽动，请求西藏地方政府出兵，清政府也提出愿同西藏地方政府共同出兵。于是西藏地方政府经过商讨和问神打卦，决定：一方面由三大寺僧众对贡布朗结进行念经诅咒，一方面从后藏增调部队，集结大军；再从康区逃亡的头人中选出向导，择吉出兵。

一八六四年（清同治三年，藏历木鼠年），西藏地方政府的军队到达金沙江边。贡布朗结闻讯，也赶紧集结兵力，构筑工事，加强防御；同时，对原德格、甘孜、炉霍土司辖区内较为富裕和有影响的人，以及对贡布朗结有过不满言行的人，分别集中关押，移地监管，防止他们策应藏军，造成混乱。不料藏军一发动进攻，新龙武装即在江达、白玉一线的战斗中遭到失败。其主要原因，除了藏军有熟悉地形和当地情况的人带路，群众由于信仰关系，认为西藏来的军队是“伪谷”派来的神兵而外，最重要的一点，是新龙驻军平时欺压百姓，引起群众对贡布朗结的不满。因此，藏军一到，有的暗中接应，有的公开支援。

贡布朗结派驻德格的头人勒乌玛在节节败退中，只好向贡布朗结告急。贡布朗结派普雄占堆带领骑兵三百前往增援。普雄占堆跟随贡布朗结多年，有作战经验，他奉命后，先侦知藏军首领赤满驻在汪布堆，即将所部向石渠开拔，说是要去保护他家的亲戚林惹土司，实际是采取迂迴包围战术，意图从北南下，与勒乌玛配合，把藏军包围在金沙江边。不料部队在翻越石渠拿玛大山时，迷失方向，延误了行军日期，以致为藏军识破，提前渡过了金沙江。普雄占堆在汪布堆扑空，又退回石渠。他把呷巴（现属青海玉树一带）头人集中到石渠，责备他们抵抗不力，加以扣押，解送去甘孜一带看管；他还纵容部队在玉树、石渠地界，大肆抢劫，连色须寺、莎西寺等寺庙，也未能幸免。然后他将所抢劫的财物送至玉隆、马尼干戈保存，这才率部翻越雀儿山与勒乌玛的部队会合。这时藏军已占领斯更（阴山），形成了包围更庆的态势。普雄占堆的部队从阳山发起进攻，与藏军发生激战。普雄占堆不支，被击退下来，意图进驻更庆，勒乌玛不许，只好在野外露营。第二天，普雄占堆又利用有利地形再次向藏军发起进攻，终于击退了藏军，解除了更庆被包围的威胁。

勒乌玛驻守更庆，不许普雄占堆的部属进寨，造成双方互不相助的分裂局面，同时也给勒乌玛自己带来很多困难。首先是普

雄占堆击退了藏军，把勒乌玛的部队同时截成了两段，造成其所部之间首尾不能相顾；其次是那些支援藏军作战的原德格本地武装，不时向其部属发起袭击，不断受到损失；第三，由于勒乌玛所属军纪败坏和虐待俘虏（他曾将俘虏的手戳孔，贯以毛绳，使彼此牵连，进行关押，甚至断其四肢，然后投河处死），引起群众愤恨，得不到支援。在此情况下，藏军增兵再次包围了更庆，截断了粮源。勒乌玛在人无粮、马无草的情势下，多次突围，没有成功。

藏军没有包围普雄占堆，但他在营中突患重感冒，竟至卧床不起。找喇嘛打卦，喇嘛说：“你打了神兵，所以得此恶报。西藏三大寺念的咒经，在你身上得到了应验。你要免除灾难，只有快向神兵认罪。”普雄占堆信以为真，即通过夏克白马伦珠向藏军请罪，病情有所好转，身体也渐渐复原。从此，普雄占堆认定藏军确是打不得的神兵，立誓再不和藏军对抗，并且还同意与藏军保持联系，受到了藏军的赞扬，答应给他报请西藏地方政府委以官职。

贡布朗结的儿子松达贡布曾一再劝告勒乌玛要严守军纪，不要烧杀抢劫、破坏寺庙，以免招致后患，勒乌玛不听，松达贡布对此非常愤恨。现在听说勒乌玛被围，还将根据贡布朗结的指令，准备在撤退时将土司官寨、印经院、更庆寺和城乡居民住房，通通烧毁，便恳切地向贡布朗结建议，指出这种烧杀的办法只会造成不堪设想的后果。经取得贡布朗结的同意，写信命令勒乌玛在迫不得已撤离德格时，不得再有烧杀、抢劫和破坏寺庙的行为，否则绝不饶恕。语气十分严肃。因此，勒乌玛在撤退时，未敢再行妄为。勒乌玛撤退后，普雄占堆也跟着撤退。藏军占领了德格。

前线打了败仗，后方很快就混乱起来。原来被贡布朗结关押在甘孜等地的人犯纷纷组织越狱逃跑。其中，被关押在甘孜绒坝岔地方的人犯，在越狱逃跑时，被头人聂巴扎西邓珠发觉，以致

全部被杀，或被投河处死，引起人犯和群众的愤恨，相率组织起来反抗。聂巴扎西邓珠后被愤怒的群众肢解愤恨。

另一起被关押在新龙的人犯，在越狱逃跑时，有的人犯由于贿赂了看守人员就跑脱了，而有三百多人却因没有贿赂，在越狱时又被同伙出卖，以致被守军包围杀死了一百多人。这样的事情在贡布朗结的占领区内不断发生，虽然被镇压了下去，但却极大地分散了贡布朗结的精力，动摇了他的统治，影响到对藏军的抵抗。

藏军占据德格后，分兵向理塘进击。贡布朗结命令派驻理塘的头人聂瓦尤布策丁进行抵抗。激战下来，藏军大败，新龙部队取得胜利，俘虏了不少藏军，被全部投入勒曲（理塘）河。但是贡布朗结认为：理塘地域开阔，难以固守，为集中兵力，保卫新龙，他命令撤退。藏军又占据了理塘。

藏军进攻甘孜，贡布朗结将勒乌玛、聂瓦尤布策丁、普雄占堆和拉马泽仁等大头人召集到新龙，商讨对策。各头人有的主战，有的主和，意见不一。特别是部分头人互相攻讦，推卸责任。以普雄占堆、拉马泽仁为代表的头人，主张释放被扣押的活佛、喇嘛，派人与藏军谈判，不宜再战；以勒乌玛、聂瓦尤布策丁为代表的头人，则主张坚决抵抗，战斗到底。在两者之间，还有部分人主张放弃占领区域，集中兵力，固守新龙。

贡布朗结要大家团结对敌，不要互相攻讦。他说：“大致当前，团结对敌十分要紧。只有保住新龙，保住葛格家的权力和地位，大家才有前途。内部不和便会给敌人以可乘之机。”普雄占堆说：“我们已经失败，再想作为占领区的头人，已经办不到了，只有先保住新龙，才好谋划下一步的办法，否则，一切都将是空想。”勒乌玛指责普雄占堆是怕死的胆小鬼。并说：“宁可战死疆场，绝不临阵脱逃。”他认为“金布泽胆小怕死，霍尔五土司的兵吃的是豌豆稀饭，德格土司的兵是吃元根的粗，打仗都是不行的。对这些人打仗，心上不要有一点畏惧。”他要贡布朗

结给他补充兵员，愿意同藏军决战到底。

贡布朗结十分称赞勒乌玛坚决抗敌的决心，当场奖给他一群牛马和许多兽皮。同时批评了普雄占堆，说他已经失去了带兵官应有的性格，不能再带兵打仗。当场撤去了他的头人职务，只给了一甌茶，要他回家去打卦念经。并宣布按照勒乌玛的意见，与藏军继续战斗；要求勒乌玛固守甘孜，伺机收复德格。

勒乌玛的部队得到补充后，正准备重返甘孜时，甘孜已被藏军占领，群众象迎接菩萨一样，熏黑烟迎接藏军。勒乌玛曾多次试图向藏军反击，都没有成功。

普雄占堆受到贡布朗结的撤职和羞辱之后，十分不满。回到炉霍，亟想谋取恢复自己的权力。甘孜被藏军占领后，他便派人到甘孜与藏军联络，希望藏军东下攻取炉霍。这事被贡布朗结知悉，派次登罗布到炉霍转告普雄占堆，要他将在炉霍的嫌疑分子清查后进行集中管理。事毕，即带同妻子到新龙接受任务。普雄占堆明知是假，却对次登罗布虚与应付，表面上接受了贡布朗结的命令，表示对贡布朗结仍然忠诚，暗中却命其子以先向新龙为名，趁机逃走。随后便带领随从和次登罗布一起向新龙方向出发。途中，普雄占堆派人将次登罗布杀死，投降了藏军。

普雄占堆在炉霍时，早已疏通各方，要对藏军采取妥协态度，又借口固守新龙，将所属部队全部撤走，以致藏军从甘孜出发，未遇到抵抗，便占领了炉霍。

藏军占领了炉霍，又派兵进驻新龙麦科。新龙人心动荡，都认为聂格家的统治要彻底完了。降空寺较有名的喇嘛呼他仁增、温波尼麦二人，也带了财物去投降藏军。有人向贡布朗结报告，贡布朗结十分气愤地说：“有好吃的给他们吃，有好用的给他们用，但当我最需要他们为我出力的时候，他们却投降了敌人，这些无情的寺庙和喇嘛，我要坚决清除。”遂派人前往追捕，未获，又派人查抄了降空寺。呼他仁增二人到麦科后，引来藏军接收降空寺，在藏军接近降空寺时，受到了新龙伏兵的袭击，伤亡

很大，引起藏军对二人的怀疑。二人被捆打监禁。后经查证他们确无通敌关系后，才得到释放。

呼他仁增二人的背叛，引起贡布朗结对喇嘛麦琰的怀疑，遂派次里交去把麦琰唤来加以控制。但当次里交到麦琰那里时，却遭到麦琰的捆绑拘禁。麦琰在拘禁次里交后，投靠了藏军。当贡布朗结听到次里交的汇报后，深为感叹地说：“唉，为什么在关键的时候，我相信的一些人要背叛我呢！”

这时，新龙的局势已十分紧迫。为防止意外，贡布朗结将俘获的几个知名活佛，如果玛、温云、格泽和甘孜督科寺的下宗活佛等，集中关押在他的官寨楼上，将德格土司母子二人关押在官寨楼下，防止他们与藏军勾结。

藏军赤满率部占领了贡布朗结官寨的前沿地带；藏军阿批也率部占领了官寨的仲巴地方；藏军普然瓦率部从侧翼进逼到热鲁附近，形成了对打木卡官寨的包围态势。贡布朗结的下属头人，纷纷投降藏军，甚至连贡布朗结平日最为信任的勒乌玛、甲日拉马泽仁等也暗中与藏军取得联系。头人瓦则路古泽仁向贡布朗结建议，应该把关押的活佛释放，以稳定人心。在贡布朗结接受建议，释放了被关押的活佛后，瓦则路古泽仁也潜逃了。

这时在贡布朗结身边的，已只有他的两个儿子：邓登贡布和松达贡布。贡布朗结一再感叹他身边的人靠不住。邓登贡布和松达贡布语重心长地对贡布朗结说：“现在后悔已经晚了。当初我们曾一再劝你不能过份信任勒乌玛，可你却把他当成唯一的知心人。有的人向我们说真诚的话，你感到刺耳，而那些花言巧语吹捧你的人，你却十分偏爱。我们占领了很多地方，但没有得到人心。我们把很多人抓起来移地监管，把活佛头人也抓起来充作人质，任凭你用权势去压迫他们，结果压而不服。现在一切都完了，我们应该沉痛地总结教训。”对于儿子的话，贡布朗结仍不以为然，甚至认为儿子们也是临阵畏怯，想投降妥协。

就在藏军缩小对贡布朗结官寨包围圈的同时，住在热鲁的东

登贡布官寨也被藏军包围。东登贡布的下属头人加居扎西，莫委近巴，阿曲雍中等经过商议，准备向藏军投降。东登贡布感到部属已经动摇，无力防御，便请曲格寺的喇嘛郎卓多吉去同藏军谈判。喇嘛说：“现在是只有谈判这一条路了。但藏军不可靠，如其有诈，对你不利怎么办？”东登贡布说：“不能只考虑我个人的安危。只要妻子女儿以及百姓能够得到安全，其余条件我们都可以接受。”又说：“我父亲做事太过份了，以致众叛亲离，连百姓也站到敌人一边，这是血的教训。”

郎卓多吉受命前去谈判。藏军提出的条件是：由西藏地方政府派人接掌土司职权，土司的全部财产予以没收，奉献给西藏三大寺，东登贡布及其家属送西藏安置。这些条件，东登贡布全部接受。藏军派普热瓦接管东登贡布的土司职权。土司的全部财产，除金银珠宝等贵重财物运送西藏外，其余交新龙各寺庙接收。东登贡布及其家属被送去西藏，传说西藏地方政府给了他一座庄园安居。

藏军占领了新龙大部分地方以后，于一八六五年七月包围了贡布朗结的官寨。藏军首领赤满策划借谈判之机，诱捕贡布朗结。他通知贡布朗结随带儿子一同出寨谈判，迫于形势，贡布朗结同意谈判。赤满在离官寨不远的地方，搭起准备谈判的帐篷，并亲选了三十名勇武有力的武士埋伏左右，自己高坐帐中，等候贡布朗结的到来。

贡布朗结收拾妥当，对家人说：“今天我去谈判，藏军如果动手，我就和他们拚了。我要做的，一定要对我们有利。”便上马而去。他在马上装着有病的样子，一歪一倒地由随从把马牵着，慢慢地向帐幕走去。

快到帐幕时，他对牵马的人说：“我下马后，你要把马掉头牵好，在这里等我！”说完，即下马进了帐幕。并出其不意地冲到赤满面前，一手将他的脖子捏住，一手拔出腰刀喝道：“你准备怎样对待我，我告诉你，你胆敢动我聂格家一根毫毛，今天就

没有你的活命。现在你要赌咒，否则你就出不了帐幕！”赤满毫无准备，竟被这出乎意外的突然袭击吓着了。连忙说：“我赌咒！我赌咒！我担保不伤害你和你的全家。”贡布朗结捏着赤满的脖子摇了几下说：“我聂格家住在自己的家乡，没有犯着你们，你们为什么要把罪恶强加在我的头上？你们自称是神兵，是不是要我们经常供奉你们？”赤满说：“西藏政府本不想打你，是你褻渎了神灵，准备进攻西藏和三大寺，才造成这样的结果。”贡布朗结又问：“你们现在有那些条件？”赤满说：“首先要你释放德格土司！”贡布朗结说：“可以！”

由于贡布朗结捏着赤满的脖子，三十名武士都不敢动手。贡布朗结又说：“你们不是要抓我吗？现在抓嘛。”说完，放开赤满，撒开双手，扬长而去。等到赤满和他的三十名武士回过神来时，贡布朗结已打着口哨，飞马回到了官寨。

贡布朗结回到官寨，遵照诺言，将德格土司和其他被关押的人立即释放。然后对两个儿子说：“我们和藏军的谈判还没有结束，藏官已赌过咒了，人不吃咒正如狗不吃铁。我们和藏军双方伤亡都很重。我们也可以提出条件，你们可以再去谈判。如果你们害怕，我可以再去。”松达贡布说：“不去，违背了父亲的指示，去，生死难定。人死了，谁知道怎样吃咒呢？现在的问题是相信事实，还是信咒？勒乌玛不是叛变投敌了吗？士兵不是散伙了吗？百姓不是归顺了藏军吗？众叛亲离，只剩我们一家人被困在官寨里。现在摆在面前只有两条路，不是突围逃跑，就是血战而亡，要不就只好自焚官寨，同归于尽。除此，没有什么可谈的了！”邓登贡布表示了同样的态度。贡布朗结听了儿子的话，十分愤怒，自我感叹地说：现在里里外外都欺负我，你们也不听话了。我虽然已是快七十岁的老头子了，但还有决心消灭敌人，把已经失败了的残局扭转过来。”

两个儿子不愿再伤老人的心，商定松达贡布前往谈判，邓登贡布守护官寨。贡布朗结对儿子说：“同藏军谈判，只要求对聂

格家的人不加伤害；我们是住在自己的家乡，要求得到保住葛格家管辖百姓八万户的地位和权利。这是凭我们自己的力量得来的，西藏政府没有理由从我们手里夺走。”松达贡布答应照办。临走时，告别全家说：“我此去肯定回不来了。现在的局势很不好，我做梦也预示不祥。但我并不后悔，请放心，我不会给聂格家丢脸，希望你们也要注意安全。”这时，贡布朗结的女婿，朱俄土司洛色愿与松达贡布同行，并说：“我们要走一同走，死一齐死，回一起回！”临别了，一家人相对哭泣。松达贡布说：“每个人都有生、有死，离家迟早都要分离，我们已临近绝路，这是没有办法的。”又劝妻子不要伤心，然后亲了一下孩子，便和洛色一同上马，离开官寨前去和藏军谈判。

赤满受到贡布朗结的冲击，十分气愤。他责备那三十名武士没有尽到职责，以致使他受到惊吓，使藏军蒙受耻辱，按违犯军令罪，将三十名武士用皮鞭抽打后，另换了三十名武士，布置在帐幕周围，以待贡布朗结再来谈判时，加以扣捕。

松达贡布和洛色按照贡布朗结提出的条件，同赤满进行谈判，赤满表面同意，暗里却示意扣捕二人。当松达贡布正要起座欲走时，藏军一涌而上，先将洛色捆下；松达贡布拔刀拚杀，当场砍死几个藏兵，想趁势冲出帐幕，但门口已被藏军严堵，又想掀开幕布从侧面逃走，不料刚一伸头即被藏军将他的发髻揪住，遭到扣捕。

贡布朗结在官寨得悉儿女婿被扣，始信藏军真无谈判诚意，追悔不及。邓登贡布见大势已去，无力挽回，便于当晚将官寨中的一座楼房放火烧了起来。赤满胁迫松达贡布去官寨诱劝父亲和全家投降，并以死相逼。松达贡布提出要到官寨前，见到自己的父亲，才便于谈话。赤满遂将松达贡布和洛色绑去官寨外面。当松达贡布见到官寨浓烟时，哈哈大笑说：“财物不与敌人，饮食不给魔鬼，这就迷了我的心了！”到了寨前，他连喊三声“阿爸”。贡布朗结从窗口探出头来。松达贡布对自己的父亲

说：“我已落到这样地步，你看见了，你该怎么办，由你自己拿主意吧！”说罢，回头对洛色说：“我们现在该念六字经了！”于是二人便高声诵念“嘛、嘛、呢、叭、咪、吽。”赤满见诱劝无效，命令将二人刀劈处死。

贡布朗结一看见二人惨死，痛苦万分，泣不成声。当晚整个官寨燃起大火，外面只听见贡布朗结的大儿子其米贡布吼了一声，打了一枪，就没有动静了。第二天，大火熄灭，官寨已经烧毁。藏军在废墟上核对尸体，只发现其米贡布和他的妻儿以及松达贡布的妻儿遗骸，而没有见到贡布朗结和邓登贡布及其妻儿的遗骸。据说当大火燃烧起来后，贡布朗结和邓登贡布便带着妻儿和随从逃出了官寨。后来贡布朗结在新龙的雪山背后气愤而死，邓登贡布则经玉树潜逃往蒙古去了。这些都是传说，没有得到证实。（最近听说，青海有贡布朗结的后裔，尚待查证）

贡布朗结失败后，因群众对勒乌玛的控诉很多，后被藏军杀头处死；普雄占堆，东登贡布及其家属和聂格家没有死去的幸存者，都被送去西藏。藏军为了树立威信，杀一敬百，将贡布朗结的下属达哈罗布扎西，押送去炉霍砍头示众。

西藏地方政府占据新龙后，向清政府提出要求赔偿出兵费白银三十万两。川督不允，藏军即占领新龙，不予撤兵。

西藏地方政府统治了新龙，代替贡布朗结对人民进行横征暴敛，他们剥削压迫人民的程度，较贡布朗结有过之而无不及，人民群众后悔错把西藏当圣土，错把藏军当神兵，很久很久都流传着这样一首民谣：“不是圣土，是罪恶的地方，不是神兵，是作恶的鬼卒，不是佛官，是妖魔的化身。”新龙人民在西藏统治者的残酷压榨下，又不时奋起反抗，藏军则对之进行了残酷的镇压，施以挖眼、割鼻、断手、去足、杀头、长期监禁等酷刑。人民群众悲伤叹息之余，往往就传述贡布朗结的英勇事迹，以发泄胸膛中对藏军的愤恨。

四、贡布朗结与佛教

综上所述，贡布朗结对佛教是淡漠的。他曾调侃释迦牟尼是“阿勒索麦”（ཨ་ལི་ཤ་མེད།）意为“不懂事的娃娃”。但贡布朗结知道佛教在藏族人民群众中的深刻影响及其对自己事业的利害关系，因而，他表面上也信仰佛教，并采用赌咒、发誓等手段，来约束统治自己的下属，但实际上，则是择其对自己有利者利用之，对己不利者逃避之，甚至对其中有敢于对抗自己意见的喇嘛、活佛，同样进行杀戮。这可以说是他失去民心，招致失败的重要原因之一。

贡布朗结还在侵犯大盖土司的领地前，切依地方有一热阿支喇嘛家，世代相传，常为地方群众念经祈祷，禳灾求福，当地群众对这家喇嘛十分信仰，每户每年要无偿送给他家饲草一背，烤酒青稞两批，还要无偿为他家耕种土地，象对待地方头人一样，为这家喇嘛服役献供。

一次，这家罗布降泽和四朗丹珍两个喇嘛，背后议论贡布朗结说：“占堆家的祖辈是神的后裔，但他们现在偷盗抢劫，制造械斗，无恶不作，已经成为魔鬼的化身”。贡布朗结听到后，借口说热阿支家不是土司头人，却要百姓支差上贡，无异是在一个天地里，出现了两个帝王。并暗中派人将两个喇嘛抓去深山幽谷处死，将尸抛于河中，没收了他家的全部家产。

雄龙西地地方的空吉村有几户比较富裕的喇嘛，在贡布朗结占领热鲁后，没有表示归顺。他便派人将这几家的男丁全部杀死，抢走全部牲畜和财产。其中只有一个较有声望的德恭喇嘛，躲藏在雄龙寺，当时没有抓到。以后又被派人将一家三口抓去，德恭被杀投河，妻子被枪杀，一个出生不久的孩子被活埋在粪堆里。

贡布朗结占据昌台后，将当地有钱有势的安章家主要人物杀了一个，迫使昌台的几个部落相继向他投降。以后，他又将昌台两

个有名望的喇嘛安章珠巴、昌格更登，押至新龙作为人质，借以压服昌台各部落不致反叛。

雄龙西格桑寺有个喇嘛叫白马邓登，常在岩洞里修行，在社会上有一定声望，从他学经的弟子也多。因为贡布朗结杀了他在空吉村的一个亲戚，对贡布朗结曾表示不满，贡布朗结便把他关押了三年，后来迫于群众舆论，才予释放。

贡布朗结占领炉霍、甘孜、德格、理塘以后，也曾把那里较有声望的喇嘛、活佛，迁押至新龙，削弱他们在当地的影响。

与此同时，贡布朗结又打起信佛的幌子，把两个修道不成，学经不深的喇嘛甲措桑登、甲拖丹珍翁扎尊为上师。其中甲措桑登擅长于念咒经诅咒敌人，甲拖丹珍翁扎专司预卜吉凶祸福。这两个喇嘛在康区和在青海玉树、果洛等地为贡布朗结大肆编造神话传说。如有一传说是：“贡布朗结前有三只眼，后有一只眼，既能看清昼夜，也能看清前后；他的枪不但能扣自发，而且射击的子弹能分散连发；他身边的两个喇嘛法力很大：一个能预知那些是对贡布朗结不满的人，诅咒他们受到灾难，他‘哼’一声，能致人于死，拍一下能使人倒毙；另一个长有两只翅膀，贡布朗结的部队开到那里，他就飞到那里，在攻打官寨或碉堡的时候，他可以飞去抓住云梯的顶端，让部队顺利地翻墙越寨。所以贡布朗结战无不胜，攻无不克”。这种传说对贡布朗结起到了先声夺人的作用。据说，由于上述传说曾使色达、果洛的部份部落，及早逃过了黄河，避免贡布朗结的侵扰。

贡布朗结从佛教上得到的收获，促使他进一步起下了利用佛教为自己扩张统治服务的思想。他在自己称为“打木卡”的寨顶上修建了一座经堂，经堂里供的菩萨，按照他自己的意志，每一尊都要塑一画一。他说：“是神就不能孤，孤了就不成其为神；是鬼就要孤，不孤就不是鬼”。所以神像要双，鬼像要单。他要人们把佛像塑成人的样子，他说：“释迦牟尼本来也是人，如果画佛画得不像人，那就不是神了”。

贡布朗结以护法神自居。他说：“西藏有三大寺。我们也有三大寺。因此在洛热附近修建了留空寺、降空寺、普瓦寺三座寺庙，每年念一次颂扬护法神贡布的大经，由官寨负责开支。开始只是由三座寺庙的喇嘛来念，后来随着辖区的扩大，所有辖区内各寺庙的喇嘛也都要集中到三座寺庙来念，人数两三百、四五百，不断增加，最多时竟达到两千多人，时间七至八天。人多了，经堂不足，就在草坝上搭帐幕作经堂，人多了，杀的牛也要相应增加，由几十头增杀到五、六百头。在此期间，附近的每户人要来一人观摩祝贺，自愿参加者，不受限制。辖区内较富裕的户，要向官寨上牛、马、奶渣、酥油、粮食、青稞酒和牛羊腔子（宰杀牛羊后将其五脏掏去，叫腔子，是康区贮藏牛羊肉的一种方法），中等户要上一块酥、一饼酥油，一方“吐”（糌粑用酥油奶渣制成的糕，在康区各地名称不一），一瓶酒；贫困户只上一背草和一背柴。

念大经期间，制订有专门维持秩序的法规：不准偷盗；不准斗殴；除指定维护秩序的士兵外，其余人一律不准携带武器和刀枪，不准行凶伤人；不准悲伤啼哭；负责维持秩序的官兵，一律不准酗酒，更不准任意用皮鞭打人。官寨附近的道路路口设立岗哨，负责盘查巡逻，对贡布朗结本人及其家属起保护作用。

念大经期间，主要有两大活动：一是攘灾驱邪，抛投灵器（用木架做成的，长、宽各一公尺五左右，高二公尺五左右，三层塔形，用各色彩线缠绕成房屋形状的一种祭神、驱鬼、化解不祥的宗教器具），朵马（用糌粑制成，每个高约一米，有各种形象，用以表示佛、神、鬼的物品），同时进行射击比赛；对成绩好的可以受到表扬和奖励，成绩不好的则受到斥责和嘲笑。二是为贡布朗结诅咒仇人。为此要准备好与辖区寺庙数目相等的牛角，将所咒人的画像装进牛角，然后由每寺选一喇嘛，骑一烈马，将牛角飞马持回自己寺庙路口，埋于地下。喇嘛在途中如被烈马摔下，也要受到人群的嘲笑。

念完咒经，埋好牛角的第二天，是敬神山。每寺的铁棒喇嘛

都要在神前向贡布朗结汇报，并发誓保证本寺喇嘛已念完贡布经十万遍。这一天，在官寨后面的坝子上，还要将从念大经以来所宰杀牛只的皮子全铺在地上，再把大小轻重不等的新鲜牛肉堆成数堆，所有参加念大经的喇嘛围着肉堆，然后由贡布朗结亲自指挥，随着大声喊出“一、二、三”喇嘛们即一涌而上，纷纷抢牛肉。不论得得多，甚至毫无所得，都可从中得到欢乐。之后，所有喇嘛可以边念经边喝酒，群众更可以喝得醉醺醺地唱歌跳舞。

念完大经，贡布朗结要把青年男女留在官寨，唱歌跳舞，欢乐一天。然后赏给每人一块肉，一饼酥油，一瓶酒，一方“吐”。这是贡布朗结把佛事活动变为与民同乐，一次代有政治性内容的活动。

贡布朗结在涝热的打木卡，曾反复拆修过几次，最后修成一幢墙厚两公尺，高十二层（一说只有八层），上去可以望见呷卡龙日雪山的雄伟官寨。寨顶修了一座大经堂。经堂里的神鬼，按他的志趣，只能塑大眼睛，喜笑脸的形象，不许塑闭眼及苦脸象；多头神象只能塑正面象，不许塑侧面象；主神是护法神贡布，而不是释迦牟尼。所有神鬼佛像塑好后，按例请喇嘛念经开光。

贡布朗结把释迦牟尼称作“阿勒索索”，主要是因为他觉得释迦牟尼对众生不分好坏，都可得到同样的轮回报应，是赏罚不明。他还认为宇宙间有天堂，也有地狱，喇嘛中有好人也有坏人。能超度别人入天堂的喇嘛，本人不一定是好人。

事实上，贡布朗结还是十分相信轮回报应的。他的孙儿巴金暴病而亡，他按新龙习俗，给他念了四十九天的经，还特别邀请西藏呷玛巴第十九代活佛谷却多吉到新龙为他孙儿超度。他的妻子知玛病故，适逢西藏萨迦寺的活佛在德格传经，也被请到新龙，为她念经超度。他还请过竹庆寺的活佛，在甘孜开坛念经。这些活佛都受到他优厚的礼遇和丰厚的馈赠。他甚至把在石渠的一些牛场，送给了竹庆寺的活佛。每逢念经，他总要喇嘛们为他

祈祷，祈求升天，免入地狱。

贡布朗结还曾胁迫昌台的昌根良登活佛到新龙为占堆家族的子弟教习藏文。又从新龙各寺挑选了二百多名札巴集中到觉空寺听昌根良登活佛讲经。昌根良登在新龙三年，贡布朗结听经有所感化，于是也手摇“课洛”（转经），数佛珠，念“嘛呢”（六字经），做出一幅虔诚信佛的样子。昌根良登趁机劝他行善戒恶，他也答应。后来昌根在寺里主持念哑巴经，他也参加，但由于哑巴经，白天不能进食，他的肚子饿得难受，便对昌根说：“我饿，肯定你也饿，念哑巴经的人可能都饿，这样饿着肚子念经是人们受不了的！”请求开斋。昌根未置可否，他非常生气地警告说：“今后不许再念这种不吃飯的经了，像你这样不叫人吃饭的喇嘛，是自讨苦吃，于人于己都是十分有害的烂喇嘛”！

后来贡布朗结在实践中感受到：政教不能两立。他认为学经行善就不能伤生害命，也就不能打倒自己的敌人，达到自己的目的，给自己和亲友带来好处，这样活着就没有什么价值。要消灭敌人，念嘛呢，摇课洛就是多余的事。于是他即将手里的课洛、佛珠全部丢到河里。

他十分看不起一些不会念经不懂装懂的喇嘛。他说：“这样的喇嘛不如去作一个仆人，替主人倒茶装烟有用；俗话说‘不会射箭的，应去当札巴，不会织布的，应去当尼姑，不会念经的，应去当佣人’，穿起袈裟不会念经，应该知道羞耻”。但是贡布朗结却十分支持和鼓励小活佛、小扎巴学习经书。他认为通过学经可以学到文化，而文化知识是非常有用的。他说：“不会讲经的喇嘛是泥菩萨，不会念经的喇嘛是哑巴。只有学懂了文化，能写信看书，将来才能坐在汉、藏、蒙古族人的头上”。

五、贡布朗结统治下的有关制度和措施

在贡布朗结的辖区内，根据当地的一些传统习俗，和贡布朗

结的个人意志，逐步建立了一些初具规模的统治制度和措施。

1、差徭：

农民：按照当地农民有为土司耕种官地的习俗，贡布朗结原有聂格家的土地以及占据大盖、热鲁两土司的土地，统由新龙农民支差代种。过去代土司耕种土地的人，在春耕秋收期间，土司家一般要供应一点口粮和酒肉，在贡布朗结统治期间，由于连年战争，土地荒芜，收成不好，以致应当供应的一点口粮和酒肉也免除了，代耕纯全成了无偿劳役。农民每年每户还要向聂格家上交烤酒青稞四批（每批二市斤），由头人经手，一年报帐一次。在贡布朗结发现年景不好，群众生活困难时，也曾提出可以把仓库里的粮食分一些给属下的百姓，以解决实际困难，稳定群众情绪；但在实行时，除一小部份作为头人们的行政开支外，其余大部份被头人们鲸吞占有，群众没有得到实惠。

牧民：每户每年以所养牛群一天的产奶量，制成酥油、奶酪上交。对没收的牛群，由贡布朗结派专人管理，收入全部上交。

农牧民上交的实物，统由头人经收，一年报帐一次。为防止虚报，经手人报帐时，要在神像前赌咒发誓，方予认可。

在贡布朗结统治期间，新龙农牧民负担最重的莫过于他家修筑官寨。其间，运土、筑墙、伐木、抬料等，全是无偿劳役。材料一定要上好的，建筑质量要求也很高，每一板墙都要进行验收，验收办法是用牛角尖掏挖，挖不出裂口才算合格，否则即返工重筑。

2、兵制：

兵源：辖区内十八岁到六十岁的男子都在应征之列。以村寨为单位编队，又从中挑选年轻、力壮、勇猛强悍的编为先锋队，负责在战斗中冲锋陷阵。先锋队士兵被称为“打生”（ཉལ་མཁོ།），意为可以吃老虎的兵（藏棋：双方各有十个兵子和一个虎子，按步路兵子吃掉对方的虎子，则兵胜，虎子吃掉对方的兵子，则虎

胜)。在获得“打生”称号并立有战功者，可以被提拔为军官或头人。贡布朗结的下属军官和头人，大部是这样提拔起来的。每次战斗结束，贡布朗结都要从作战部队中选拔一批“打生”。

训练：一般在春节和念大经以后进行。项目有摔跤、赛马、打靶、拔河、爬树、拼刺、射箭、练刀（劈草人）等。一般一年一次，训练结束后，用一定时间开展文体活动，组织唱歌、跳舞。

每次打了胜仗以后，要举行为期三天的庆祝活动，结合进行整训。训练时，要进行考核，评定等级，发给奖励。一般被列为一、二、三等者，可获得哈达一根，茶叶一罐，以及藏洋三十、二十、十元的奖励。成绩最差的，要被抹黑脸，并由大众向他敬糌粑面，嘲笑中带有警告的意味。

武器：根据各户的经济情况，自备武器。富裕者自备明火枪一枝，好马一匹，长刀一把，火药一百瓶，锡弹头一百个，稍次的，自备长刀一把，枪矛一根，马一匹；较差的，自备斧头一把，“俄多”（用牛毛绳编成的，用以甩石头的绳具）一具。此外，几户人家要共备云梯一架。出征时，每人要自备一月口粮。

对上述应该准备的武器和口粮，贡布朗结随时派人检查，不得任意违抗。其中，规定购买明火枪的户，要在每二十人中选一人担任领导，战斗时，由他发布装火药，装子弹的口令，以免临时慌乱，发生差错。

部队的部署，调集和指挥权，由贡布朗结亲自掌握，他自任全军统帅。他的儿子松达贡布、邓登贡布在他的指挥下掌握部份兵权。后来地域扩大，部队增多，贡布朗结又在“打生”中提拔了一批军官，担任部属指挥。

纪律：主要有四条：①任何人不准投降，特别是“打生”，如有投降行为，除本人处死，没收其骑马、枪弹外，家属移地监管；②不许失马掉枪；③不许私藏缴获和抢劫所得财物；④不许遗弃阵亡尸体及轻重伤员。以上第③项实际没有执行。

3、其它：

①鼓励青壮年到统治区域以外的地区抢劫，所得归己。如被人追寻，可由贡布朗结出面，抢十退一。

②为了聂格家的统治而伤生害命者，贡布朗结愿代为承担一切责任，甚至代受“天谴”。

③被人杀害者，允许家属主动报仇，还追回命价。

④被人抢劫者，允许自行讨还，或通过赌咒发誓，自行解决。

⑤辖区内禁止小偷小摸，一经发现即处以罚款。

⑥不准擅抢妇女财物，一经发现，要将抢人者的财产分一半给被抢的女人。

⑦禁止弟兄同娶一妇。认为这是一口锅里放两把瓢，一根粮袋里伸两只手，容易导致家庭不和。主张分家立户，发展人口。

⑧鼓励生儿育女，对生下的女儿，规定父母要给予装饰品。

⑨喇嘛、扎巴，不准贪财，不许说谎，对贪财说谎者，即不予信任。

⑩辖区内的年轻人，要经常为贡布朗结熏烟，作祈祷，服从贡布朗结的绝对统治。

六、结语

综上所述，我们认为：贡布朗结从一个稍有振兴的没落土司家族的家庭成员，成为一个能够指挥千军万马，踞地千里，名噪一时的风云人物，促使西藏地方政府乃至清王朝统治者受到威胁，他的一生确有一定的传奇色彩。但盖棺论定，贡布朗结确实只能是一个不足效法的悲剧人物。

幼年时期，他在父兄耳濡目染的影响下，是一个寻报私仇的狂热信奉者。成年以后，随着地域和权势的扩大，他的个人野心也不断滋长，直到想当“印度的王子，汉族的皇帝”，要“坐在汉、藏、蒙族的头上”，个人野心可以说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

他挟私报复，嗜杀成性。顺我者昌，逆我者亡。为了达到一己

的私利，他不顾群众的生产生活，不管百姓的生死存亡，强行征兵，连年征战，四处树敌，八方抢劫，在康区造成了长达四十余年的混乱局面。

从贡布朗结制订的统治制度和措施看，大部沿袭了历代统治阶级的统治法规，并没有给人民带来什么好处。如果说贡布朗结反对一些喇嘛、活佛的伪善、注重文化的发展，有时也与民同乐，但也都是有局限性的，是为他的个人意志和统治手段服务的。同时，他也没有采取什么积极有效的措施，更没有给人民群众在某一方面带来哪怕是十分微小的改善和转化。相反，他给祖国的统一，民族的团结，以及人民富裕和安定所带来的灾难，则是极为深重而无法弥补的。

因此，贡布朗结在新龙等地所发动的战争，丝毫没有“民变”性质；他的所作所为，既然没有代表千万农奴的利益，当然，所谓“农民起义英雄”的桂冠，也就无法戴到他的头上了。

如果说新龙人民在以后的一段时间内，对贡布朗结还有过什么怀念的话，那只能说明西藏地方政府派驻新龙的管理谿甫，在新龙所执行的欺压人民，横征暴敛等手段，较之贡布朗结更为残酷、更为完整罢了。

(来作中、高济昌、邓俊康记录整理)

炉霍勒宗四部落的政教和婚丧习俗

郎加 沙古

炉霍县境东南部的阿拉沟，山高坡陡，水源充足，两岸峡谷间的浅丘平坝，是一片水草丰茂的天然牧场。历史上这里散居着一些属于藏族的游牧部落。明末清初，和硕特蒙古首领固始汗由青海进入康藏，这块地方受到蒙古族瓦述色达部落的统治。在清朝势力逐渐深入，和硕特蒙古族的统治逐渐削弱的情況下，这块地方又逐步脱离了瓦述色达部落。但他们既没有去向清廷朝贡、接受封赏，也没有象大小金川那样，参与叛乱，引来征讨，而是在互相兼并中，经过不断的分裂、聚合，形成了四个各自能够独立掌握武装、法律的政治实体，藏语称之为“勒宗区意”（འི་ལུང་ཁྱེ་ལྷོ་ཁྱེ）意为勒宗四个牛场部落，简称为勒宗四部。

勒宗四部的疆域，东南与道孚玉科的维它玛接壤，东北与色达的色尔巴相邻，包括现在的上、下罗科马和宗塔、宗麦四个公社，为炉霍县的第四区，其中宗塔、宗麦两公社的草场，按旧例还延伸到阿坝州的壤塘县境内。

肥沃的草原，强悍的牧民习性，又受到高山深谷、密林的掩护，以致直到解放前，这块地方都一直保持着它的独立的政治经济地位，甚至可以不清政府和国民党政府上粮、纳税、服役，在西康地区可算是别具一格。

现将勒宗四部的形成、发展及其在解放前的基本情况，概述如下，供作参考。

一、勒宗部落的形成和发展

勒宗四部即罗科马、宗塔、宗麦和阿收马四个牛场部落，其中阿收马原为罗科马的一从属部份，故勒宗即是以四个部落的前一个字母拼合而成的。四个部落各有自己的形成和发展过程，兹分别叙述如下：

1、罗科马部落(ལོ་ཁོ་མ་)

罗科马部落是勒宗四个部落中形成最早、实力最大、占地面积最宽的一个部落。世代统治这个部落的头人，自称是具有岭·格萨尔王血统的绒察玛勒(རོ་ཅང་ལམ་ལེག་)的后裔。据说在一千多年以前，岭·格萨尔王征服了玉绒色宗(ལུ་ཤང་ལོ་ཤེ་རྩེ་)现在的道孚县玉科区的呷之勒王(ལྷ་ལོ་ཤེ་རྩེ་ལྷ་མོ་)以后，即派遣绒察玛勒到玉绒色宗西方边境的阿拉甲绒松多(ཨ་ཁ་ཤེ་རྩེ་ལྷ་མོ་)现在的炉霍县宜木公社)去驻守。当绒察玛勒途经勒宗地方时，军中有懂堪舆的人(ལ་མཁེ་པ་)，见到那里水草丰茂，地形象一口铜铸的沙锅，其中心地带“科让奔格”(ལོ་ཤང་པོ་ན་ལྷ་)小山头，又是一颗野牛的心，预示着吉祥，因而预言这里将会出现一个强大的部落，并取名叫勒宗(ལོ་ཁོ་མ་)意为黄铜铸造的沙锅)。后来绒察玛勒的后裔在离开阿拉甲绒松多之后，便到罗科马牧区，繁衍生息，成为这一地区最强大的部落。

据记载，罗科马部落约于公元一七〇〇年前后，由若干小部落逐渐兼并形成现在的部落。其第一代头人格潘温穹有兄弟七人，开始都是部落首领。这七个部落分别是：格潘崩珠(“崩珠”是墨吉康都四字的缩写，即现在的下罗科马)、格潘阿色玛(现阿色沟)、格潘阿收玛(现阿森沟中段游牧地带)。格潘杜察(约为上罗科马)、格潘呷他玛(约为周嘎卡)、格潘染科、格潘维它玛(现道孚县玉科区维它公社)。格潘温穹原是格潘崩珠的头人，以后兼并了呷他玛(ལྷ་ལོ་ཤེ་པ་)和维他玛(ལོ་ཤེ་པ་)两部，将染科(ར་ཁོ་ར་)逼迁去甘孜，把杜察赶到色达，使阿色

玛只剩下二百多户牧民，保持住很小一块牧场，只有阿收玛在反兼并中保持了独立，成为四大部落之一。

格潘温穹在内部搞兼并的同时，对外也表现了他骁勇善战和机智过人。据说，那时的青海果洛人有一种习俗叫“果洛罗加”(ལོ་ཁོ་ལོ་ལོ་)，就是派遣部份牧民到别的部落抢劫，一年后返回。有一年七个果洛人来到罗科马部落抢劫，温穹一人杀死了其中六个，从此威名大振。统治藏区牧民的瓦述蒙古首领索·金格甲波(ལོ་ཁོ་ཤང་ལོ་ཤེ་པ་)来到罗科马，温穹曾将一死虎敬献，声称是他自己卡死的，得到了金格甲波的称赞，封为世袭头人。

从格潘温穹作为罗科马部落的第一代头人起，到一九五九年实行民主改革时止，共延续了十代。他们是：

第一代格潘温穹(ལོ་ཁོ་ཤང་ལོ་ཤེ་པ་)

第二代格潘色绒(ལོ་ཁོ་ཤང་ལོ་ཤེ་པ་)

第三代格潘白马根桑(ལོ་ཁོ་ཤང་ལོ་ཤེ་པ་)

第四代格潘勒交(ལོ་ཁོ་ཤང་ལོ་ཤེ་པ་)

第五代格潘扎西绕登(ལོ་ཁོ་ཤང་ལོ་ཤེ་པ་)

第六代格潘思拖(ལོ་ཁོ་ཤང་ལོ་ཤེ་པ་)

第七代格潘占堆(ལོ་ཁོ་ཤང་ལོ་ཤེ་པ་)

第八代格潘格桑克珠(ལོ་ཁོ་ཤང་ལོ་ཤེ་པ་)

第九代格潘格桑德清(ལོ་ཁོ་ཤང་ལོ་ཤེ་པ་)

第十代格潘泽仁本交(ལོ་ཁོ་ཤང་ལོ་ཤེ་པ་)

在以上十代人中，曾发生过几起较大的事件。第一件是：格潘温穹死后，部落曾一度衰落，瓦述色达部落趁机杀死了第二代头人格潘色俄。好在部族内部团结，对瓦述色达部落进行了长期的抗争，最后赶走了色达人，维护了格潘家族的统治。第二件是：一八九〇年上中下罗科马之间发生内部械斗，格潘格桑克珠打死了下属格潘洛额阿部落的头人格潘扎西绕登(ལོ་ཁོ་ཤང་ལོ་ཤེ་པ་)。绕登的儿子格潘占登于一九一〇年起来复仇，将格桑克珠及其儿子和随从三人枪杀，然后带领本部游牧民迁去绰斯甲(现

族世代执掌宗教权力。下设俄勒(ᠷᠣᠯᠡ)小头人)二十一人,分别由古咱、瓦述两部落的小头人世袭,负责处理部落内部的重大问题。从这时起,直到解放时止,瓦述宗家部落的大头人共世袭九代,古咱氏族的活佛转了十世。

瓦述部落的九代头人是：

第一代：瓦述古拉瑪(འགྲུ་གློ་ན་ལ་མ།)
 第二代：瓦述洛伍貢布(འགྲུ་ཤོ་རྩ་ལ་མཁོན་པོ།)
 第三代：瓦述四郎貢布(འགྲུ་ཤོ་རྩོད་ན་ལ་མཁོན་པོ།)
 第四代：瓦述貢布汪結(འགྲུ་མཁོན་པོ་དང་རྒྱལ།)
 第五代：瓦述呬瑪卻郎(འགྲུ་ཀ་ར་མ་ཤོད་པར།)
 第六代：瓦述呬瑪曲吉(འགྲུ་ཀ་ར་མ་ཚས་རྒྱལ།)
 第七代：瓦述扎拉(འགྲུ་དབུ།)
 第八代：瓦述扎洛(འགྲུ་འཇམ་ལ་མོང།)
 第九代：江根充翁卻加(ལྷ་གྲུ་མཁོན་པོ་དང་རྩ་ལ་མཁོན་པོ།)

（充翁郎加是卓斯甲部落大头人江根的儿子，因扎洛无子，以长女所洛招赘充翁郎加为婿，继承了头人权位。1956年康区实行民主改革时，充翁郎加参加叛乱，被击毙。）

古咱氏族的十代活佛是：

第一世：古咱呷玛一西(གོ་ཙ་ཀར་མ་ཡེ་སེམ།)

第二世：翁色乌金班觉(དཔོན་ལྷན་ཨ་རྒྱ་དཔལ་འབྱོར།)

第三世：温波昏朱多吉(དབོན་པོ་ལྷན་པུང་དོ་རྒྱལ།)

第四世：济麦扎巴邓登（འཇིགས་མེད་བླགས་པ་བསྟན་དང༌།）

第五世：仁增绒布扎巴(རྒྱལ་བོ་འཕགས་པ་རིན་པོ་ལུ་མཆོད་པ་འཇཉག་པོ་ཙམ་པོ།)

第十世：古咱雍中俄热（藏文：ཀུ་ཙེ་ཡུང་རེ་རེ་པོ་ལོ་མཆོག་།）

第八世：古咱格桑钦扎(新·མ་ཀུན་འགྲུབ་པའི་མཆོག་ལྷ་མོ་)

第九世：溫波四郎捆扎(5ཐོན་པོ་བསྟར་རྒྱལ་མཁས་པ་འགྲུབ་)

第十世：仁齐郎加赤乃(ཡིག་འཛིན་རྒྱལ་མཁས་འཕྲིན་ལས་)

瓦述氏族在世袭瓦述宗麦部落的大头人以后，有鉴于古咱氏族控制宗教，更具有统治权威，于是也积极选送自己的子弟出家为僧，有些也被挑选为活佛或大喇嘛，分享了宗教的部份地位。到解放时为止，也转了九世。他们是：

- 第一世：瓦述呷马根却(ལ་བྱལ་ཀ་མ་ཀླན་ཏྲལ།)
- 第二世：瓦述仁增降措(ལ་བྱལ་རིག་འཛིན་གྱི་མཚོ།)
- 第三世：瓦述呷玛龙央(ལ་བྱལ་ཀ་མ་ལྷོང་ཡངས།)
- 第四世：瓦述固茹多吉(ལ་བྱལ་ཀ་མ་རྩུ་ཏྲ་རྩེ།)
- 第五世：瓦述俄色降措(ལ་བྱལ་རྩེ་ལོ་གསལ་གྱི་མཚོ།)
- 第六世：瓦述登巴(ལ་བྱལ་བཏུན་པ།)
- 第七世：温波郎卡多吉(དཔོན་པ་ནམ་ལལ་རྩེ་རྩེ།)
- 第八世：古倾伶协俄热(གྱི་ཚེན་ཉིན་མེད་རྩེ་མཚོ།)
- 第九世：古倾绕色尼马(གྱི་ཚེད་རབ་གསལ་ཉི་མ།)

3、宗塔部落(གཙང་ཁ་མ་ཏ།)

宗塔部落原来也是瓦述色达部落的一个附属部落，由公它玛(གྱང་ཁ་མ།) 和科它玛(ཀོལ་ཁ་མ།) 两个氏族组成。大约在上世纪末和本世纪初，公它玛氏族的头人瓦述桑吉降泽(ལ་བྱལ་མང་མ་རྩུལ་གྱི་མཚོ།) 率领两族脱离了瓦述色达的统属而形成独立的部落，当时仅有牧民一百三十户，其中公它玛三十户，科它玛一百户，由桑吉降泽和科它玛的头人公之根却(གྱང་ཁ་མ་རྩུལ་གྱི་མཚོ།) 共同掌握部落权力。一九一九年，公之根却密谋杀害了桑吉降泽兄弟三人，图独揽大权，整个部落遂分为拥公派和反公派两部份，曾发生多次械斗。后经邻近地区麦瓦部落的头人瓦述郎洛(ལ་བྱལ་རྩུལ་ལ།) 调解，确定由热哈寺活佛卓之(རྒྱལ་མ་རྩུལ།) 代行头人职权。但公它玛氏族人心不服，数年后，热洛(རྩུལ་ལོ།) 和耶雅(ཉི་མ་ལོ།) 二人，竟带领族众迁到宗麦，投靠了宗麦第九代头人充翁郎加，成为宗麦部落的附属。卓之活佛看到公它玛氏族走后，科它玛氏族单独存在，困难也大，因而也率族众投靠了罗科马

部落的第九代头人格潘格桑德清。这样，宗塔部落即名存实亡。

4、阿收马部落(ཨ་བྱལ་མ།)

阿收马部落原是罗科马部落格潘氏族的七部落之一，统有白果(དཔོན་མོ།) 和拉果(རྩུལ་མོ།) 两个家族，散居在宗麦、罗科马和玉科三个部落的交界地带，现在道孚炉霍交界的阿森柯河地区，据有阿森柯河(ཨ་བྱལ་ཀ་མ་ལོ།)，牙尼科河(ལ་བྱལ་ཉི་མ་ལོ།) 和俄玛柯河(རྩུལ་ཀ་མ་ལོ།) 等地。由于辖区小，牧户少，力量薄弱，虽然曾顶着了格潘崩珠的兼并，仍常受到邻近大部落的威胁。一九〇〇年在头人格潘格桑德清(ཉི་མ་ལོ་གསལ་པོ་མཚོ།) 的率领下，曾先后同罗科马和绰斯甲部落发生械斗，损失惨重。格潘格桑德清死后，其子格潘洛它泽仁(ཉི་མ་ལོ་མཚོ་མཚོ།) 继任头人，无力恢复先人业绩，又不能解决与罗科马等大部落之间的矛盾，遂带领白果氏族牧民和寺庙扎巴迁往绰斯甲去了。留下的拉果氏族群龙无首，也投靠了宗麦部落。于是阿收马部落也就自行消亡。

二、勒宗部落的寺庙和宗教简况

勒宗四部落都有自己的喇嘛寺庙，其中著名的有罗科马的洞木寺(མདོ་མང་དགོ།)，阿收玛的土登却冷寺(ཐུང་ལྷན་པོ་མང་།)；宗麦的生根寺(མིང་གི་དགོ།)；宗塔的热哈寺(རྩུལ་དགོ།)。四所寺庙俱属宁玛派(红教)，约有喇嘛、扎巴千余人。

1、洞木寺

洞木寺为罗科马部落第二代头人格潘色俄于一七五九年在墨青康都(མེ་མེད་ཀ་མ་རྩུལ།)，即现在的罗科马地方兴建，以后第八代头人格潘格桑克珠、第九代头人格潘格桑德清、第十代头人格潘泽仁本父又曾三次扩建。

洞木寺是白玉降刚寺(འཕྲུལ་གྱི་དགོ།) 的分寺。据传降刚寺活佛温波赤村多吉(དཔོན་པོ་ལོ་གསལ་རྩུལ་མོ།) 曾受过清乾隆皇帝的敕封，并曾将皇帝赐予的一颗檀香木把，刻有“ཨ”字的铁铸大印，交付洞

金(ལྷ་མོ་གླེང་།)学习佛教经典的学校)深造。热哈寺在宗塔部落影响较大,在全部落只有一百三十户左右的牧民中,住寺的喇嘛、扎巴竟达二百五十多人,平均每户牧民家接近有两人。

4、土登却冷寺

土登却冷寺是阿收马部落的主寺,由宗麦部落的山古翁色乌金班觉活佛修建。寺内也有修显宗的法相院和修密宗(ཐུགས་ཀྱི་ཐུག་པོ།)的密咒院,密咒院主要修习密集、胜乐、大威德三金剛和其它金剛、护法等密法,也有喇嘛和扎巴三百多人。除本部落的牧民群众虔诚信仰外,外部落的群众也经常前来朝拜。

牧民虔诚信仰宗教,一般每户人家有了男孩,除留一人居室外,其余的都要送入寺庙当扎巴。手续上只要父母同意就可入寺。干扎巴先学“恩卓经”(启蒙读经),然后才正式入册。入册以后要想还俗,则必须向寺庙交纳“呷下金”白银三秤(一百五十两),以示向神赎罪。还要向寺庙活佛、执事分送财礼,赔情道歉。

除上述寺庙外,每个部落还要选适当的地点,修建了一些“日泽”,如宗麦部落的俄色更批日泽(ཁོང་གསལ་དེའི་འཕམ་གླིང་།),额鲁仁措桑噶汤曲日泽(ཤེས་ལུག་རི་ཁྱོད་གསལ་ཐུག་པོ་གླིང་།)、白马桑得日泽(འཕམ་མ་གསལ་གྲན་རི་ཁྱོད་།)、阿拉西巴热细日泽(ཨ་ཤེ་ལུག་པོ་རི་ཁྱོད་།)等专供少数活佛、喇嘛修习显宗、密宗和宁马派进行大圆满法会的需要。不仅如此,各部落还分别修建了一些经堂、佛塔、嘛哩堆等,作为游牧群众进行宗教活动的场所。如宗麦部落在牧民进行“天葬”的地方,修了经堂,供死者家属转经和超度亡人。小孩夭折,也根据卜卦确定埋葬在经堂附近某一方向,以避免“大折鬼”的继续为害。宗麦部落的第二代头人瓦述洛伍贡布,还在昔汝贡多地方修建了一座三层高的绕魔佛塔;第五代头人瓦述呷马郎拥的弟第一西娘波(ཁོ་ཤེས་ལྷོ་ཤི།)在柔都施木地方修建了三座佛塔。罗科马

和宗麦部落还在各自的寺庙附近,石刻了甘珠尔(གཡུ་འབྱུང་)经版摆成了长达数华里的嘛哩堆(རྩི་འབྲམ།)

此外,每一部落还确定有各自的神山,定期或不定期的供牧民进行供神山活动。定期供神山的时间,根据各部落情况的不同,一般是每年的五、六月份。如宗麦部落为每年藏历五月十三日,罗科马部落为每年藏历六月初四日。在此期间,部落所属的家家户户,都要穿上新装,前往神山熏烟敬神,然后“要坝子”,进行唱歌、跳舞、赛马、射击等项娱乐活动。部落的大头人、活佛、大喇嘛,也要在此期间共商解决部落的有关重大问题,以炫耀他们的才干表示得到神佛的护佑。

牧民还随时根据自己对神山的信仰程度和家庭婚丧嫁娶或伤病祸福等情况,不定期地在神山林里悬挂经旗熏烟、烧香摆面,祈祷免祸,寻求安康。部落头人也不断借神山之名,制造种种神话传说,用以蒙蔽群众、维护自己的统治。

各寺每年还有自己的例行法会,如生根寺在每年藏历正月(传说释迦牟尼在公元前五一年的藏历正月,曾显示神通,降伏了六大部道,故佛教徒统把藏历正月称为“神变月”),要把全寺的喇嘛、扎巴集中在寺内念经,并于十日那天举行大型的宗教仪式,由古咱、瓦述两族的活佛,主持选举铁棒喇嘛,全部落的男女老幼都要到寺庙观摩礼拜。

藏历六月,生根寺全体喇嘛、扎巴要集中念“密集(ཐུགས་རྒྱུ་ཚད་པོ་གསལ་པོ་འདུག་པོ་འཛིན་པ་བློ་བྱ།),汇集佛教密宗和大小乘道全部秘密要义的经书)二十五天,祈求神佛保佑安宁。

每年夏天,各寺庙还要举行“坐夏安居”(དབང་ལཱ་ཚོགས།),就是从寺庙喇嘛、扎巴中选出七、八十人,静坐念经四十五天。在此期间,只是坐禅修习,接受供养,足不得出寺,也不得缺席。如有特殊情况,必须取得寺面主持和铁棒喇嘛的同意。

润木寺除和生根寺有相同的念经时日外,还有以下几次较大

型的法会活动。

每年藏历正月初一至初八，要举行“修行供”法会，全寺的喇嘛、扎巴都要参加诵念大经。

相传：红教教主莲花生生前有十二行星转，死后，其信徒即以每月初十为其活动纪念日。因此，洞木寺的住寺喇嘛每月初十都要念经。四月初十，更要举行一次较大规模的跳神活动。为搞好这一次跳神活动，每年从三月十三日开始，就要挑选人员进行排练，于四月一日至三日布置坛场，四日至七日组织念坛场经，八日为坛场举行开光仪式，九、十两日组织跳神后结束。

寺庙的例行法会及法相、密咒两院所需费用的来源，各部落有所不同。宗麦部落是根据各牧户的经济情况摊派的，一般是将牧户分为三等，上等户每年每户交酥油五斤、木柴十驮，中等户交酥油五斤、木柴五驮，下等户上交酥油一斤。这些收入由铁棒喇嘛和第巴会首（即负责管理寺庙公物的会首）共同监收、保管、开支。也有分别确定部落中的某几户包干负担法会经费，某几户负担法相、密咒两院经费开支的。洞木寺法相、密咒两院的开支，是分别由富牧扎西央措捐献牦牛五十头，寺庙拨出牦牛五十头，共折合藏洋五千元，放债生息，供作开支。

每次法会都会收得一定数量的布施。布施分配情况为，凡寺内喇嘛、扎巴都可获得。按当年实际收入，多则多分，少则少分。但活佛、喇嘛之所得，按例是一般喇嘛、扎巴的五倍。

寺庙活佛，每年夏季，要到所属部落的各个牧民聚居区周游一次。在此期间，每户牧民要把当天畜群所产的奶制品，全数作为贡奉。

牧民死后，不论贫富，都要请活佛念经开路，为死者超度，以示虔诚。照例要奉送念经活佛好马一匹，配好鞍垫一付和毡毯一匹。

根据这种收入情况，每一活佛都有自己独立于寺外的“拉章”（藏语家庭之意）并有专人为其管理财产。

三、勒宗部落的统治系统和法规

勒宗部落的统治系统，大致可分为三个等级，即：部落大头人（དཔལ་ལྷན་）一人，为世代承袭；俄巴（འཁོ་བུ།）即小头人）数人，是世袭、选举和任命相结合；牧民。

各部落又根据各自的历史发展情况，在俄巴这一层的名称和人员配备以及他们的权力方面，都各有不同。如在宗麦部落，每三年由部落大头人和寺庙主持在所转世袭的二十一名“俄勒”（འཁོ་ལྷན་）中，选定八名“玛本”（དཔལ་ལྷན་）带兵官）和八名“入本”（འཁོ་ལྷན་）草场管理者）。在选定后的当年五月十三日，即部落供神会时，当众宣布，随即行使职权。

八名玛本的职责是：

- 1、负责对部落的武装人员进行编组和训练；
- 2、负责购置和检验部落的武器装备；
- 3、负责部落边境的防卫；
- 4、在发生武装械斗时，负责部署和指挥。

八名入本的职责是：

- 1、负责安排所属牧民的冬夏住所和放牧草场；
- 2、确定冬夏草场和住所的搬迁及驻扎时间；
- 3、负责调解处理本部落的民事和刑事纠纷。

罗科马部落是由部落大头人每两年选派自己亲信得力的四个小头人和四个牧民组成“入本戒”（即八个管理者），于当年藏历六月初四举行的供神山上向全体牧民宣布，随即行使职权。其职责是：

- 1、确定并安排每一小头人所管的牧户，以及他们在冬夏令居住的牧场和放牧范围；
- 2、除对原有的枪弹等装备要进行清理检查外，再根据各牧户的经济情况，确定当年需要新增购买枪弹的牧户和购买枪弹的

品种,数量;

3、研究与外部落发生纠纷后的解决办法,决定是谈判还是械斗;

4、调解和处理部落牧民的刑事和民事纠纷,遇有疑难问题,则留待供神会期间专门解决;

5、研究商讨其它部落逃亡到本部落的牧民的安置或驱逐问题;

6、监督与处理在同外部落发生纠纷中充当内奸的牧民;

7、决定和执行对违犯本部落法规者的惩戒;

8、随牧民在冬、夏季进行搬迁后,确定“入本戒”的办事地址。

部落的法规:为了维护部落的统治,勒宗四部落又各自根据本部落的情况,制定了本部落的法规,用以约束所属牧民。宗麦部落从古咱氏族第一代头人邓登汪修起,就根据佛教的“十善”(即不杀生、不偷盗、不邪淫、不妄语、不两舌、不恶口、不绮语、不贪、不瞋、不邪视)原则,制订了本部落的法规。这些法规在勒宗四部落有一定的代表性,它是:

1、严禁内部凶杀。发生内部凶杀时,要没收凶手的全部家产,作为赔偿命价的费用,其中要先选出好马一匹,好枪一支,送交部落大头人;另送给俄勒茶叶半包。

赔偿命价的标准是:杀死头人家的直系男子一人,赔偿命价折银子一百平(每平合藏洋一百六十元)、按例半交现金、半交实物(包括牛马),所交实物,一般可按所值提高一倍折价。凶手还必须将凶器(枪、刀等)交与被害人的家属。

杀死一般牧民家的男子一人,赔偿命价银子五十平;杀死别人者的家属,在与被害者的家属进行谈判时,要先向被害者的家属送马一匹,或牛一头,或茶叶数包,以表示诚心邀请对方接受调解。对方如同意接受调解,在进行调解的当天,准备入座时,要送礼物一件,表示请对方上垫入座;在支三锅庄烧茶时,再送

礼物一件,表示敬请对方喝茶;熏烟发火时,又送礼物一件,表示恭请对方用餐。每次所送之礼,可以是牦牛一头,或绵羊两只,或牛肉两腿。通过送礼、赔罪,使对方能够平心静气地接受调处。

2、对外部落到本部落进犯或抢劫的法规

任何人得悉这种情况后,须立即报告玛本;任何一个玛本得悉上述情况后,必须立即通知其它三个玛本,任何一个玛本都有权向部落武装发布抗击和追击的命令。

武装牧民在得到抗击的命令后,要立即带上武器干粮到玛本处报到,接受命令。

玛本和武装牧民对上述法规,如有违犯,部落头人可根据情节,予以惩处。

在抗击外部落的抢劫和入侵时,打死对方者有奖;丧命者对其家属进行抚恤,抚恤标准常按一般命价(死一人赔偿白银五十平或一百平)折算。造成损失赔偿命价和进行抚恤的经济来源,按部落所属牧民的财产状况,按户等进行摊派。

牧民不遵守购置枪弹的决定时,要处以警告或罚款处分。

为外部落充当内奸者,没收其全部财产。

本部落牧民私自到外部落抢劫或偷盗者,先罚好马一匹,送交部落大头人;外部落追赔偿命价,由本人负责;丧命者由本部落向外部落索赔命价,本部落不予抚恤。

3、对在部落内部进行偷盗的法规

当场被捉获者,先罚其好马一匹,送交部落大头人,然后按所偷盗财物的种类、数量,加倍赔偿。

事后发现,要求审理者,原被告都得先上“贡品”一份,其中案件较大的,要分别先送给官方和部落大头人各一匹马、一根哈达;一般的,双方各上一头牛;较小的,双方各上几包茶。其中情节较轻的规定以一赔四;较重的以一赔十。

在部落举行法会期间打架斗殴者，双方各罚好马一匹。在寺外发生的，马交部落大头人；在寺内发生的马交寺庙。

4、对弟兄因分家而诉讼的法规

双方应在家产中为部落头人提取一份“公分”（在罗科马部落一般是先向部落头人上贡一匹马或一头牛），然后由头人出面将财产搭配分配。

5、对到神山挖金、挖药和伐木、打猎的法规

按照宗教习俗，触犯神山会降临灾害，殃及众生，因而对到神山挖金、挖药、伐木和打猎者，要分别处以磕长头，刻石经版，罚印布经幡等处分，数量根据情节轻重而定。同时，要在每次法会上，进行宣传：“黄金、药材和野生动物，都是与部落众生福分相连的共同财富，任何个人不得私取”。

6、对不遵守放牧和定居的有关规定的法规

根据态度及家庭经济情况，分别进行处理。一般是轻者罚牛三头，重者罚牛十头。其中屡犯不改的，强制其居住一定地点，限制其放牧场所，进而造成其牲畜因缺草而死亡的重大损失，以示惩处。

凡违犯上述法规被罚的财物，首先要给部落大头人提取一份，其余归“入本戒”所得。

对上述法规进行抵制反对者，勒宗四部的规定，都是在宗教和经济两方面给予处分。在宗教方面，是断绝其宗教关系，如其家人死后，喇嘛不得给开路、念经，进行超度，以咒其永入地狱，永不超生。在经济方面，是根据情节，没收其家产的一部或全部。

四、勒宗部落的婚丧习俗

勒宗四部落解放前的婚丧习俗，和康区大部地区大体相同。但又因其以放牧为主，和外界接触较少，接受科学文化知识的机会更少，因而解放前他们在其某些方面和康区的广大农区又有些

差异。现将其婚嫁、丧葬方面的一些主要习俗，概述如次：

（一）婚嫁习俗

勒宗部落的婚姻关系，有男娶女嫁、女娶男赘两种形式；也有兄弟数人同娶一妇，姊妹数人同配一婿的情况。在婚姻促成上，既有父母之命、媒妁之言；也有自由恋爱、自愿结合；还有一厢情愿，凭借武力进行抢夺的。总的是一夫一妻制。姊妹同婚，弟兄共妻的主要原因是：有因弟兄姊妹情感深厚，不愿分居的；也有因家有世仇，兄弟需要团聚，以共同对敌的；也有因家境贫困，不愿分家，以免增加对部落头人的差徭负担的；还有因男性大部去当喇嘛、扎巴，导致姊妹共婚的。

自由恋爱，情投意合，一般也要取得父母的同意。这是因为：牧区婚嫁，门第等级相当严格，“贵不亲贱、贫不攀富”，早已成为牧区婚姻家庭很浓的社会风气。因此，尽管男女青年两厢情愿，如果门第不相当，父母不同意，一般也只好自叹命薄，难成婚配。

武力抢婚，在勒宗四部还较盛行。如某一男人看中一个姑娘后，一再聘媒说亲都遭到拒绝的情况下，就带上亲信武装到女家抢亲。如果女方力量薄弱，自然就很容易被抢走了，也只好被迫成亲；如果女方力量较强，就往往会酿成械斗，导致双方仇杀不已；这种情况在大小头人之间发生较多。事情发生后，部落头人就要出面调停，尚未婚配的可以强行制止，已被逼成婚的，也可令其分开，但双方都不准脱离部落。当然，事情的发展，往往并不那么理想。也常有在发生抢亲后，或不听调解、劝阻，而逃离本部落的。为此，还常常产生部落与部落之间的械斗。

在一般情况下，多是男女一方的家长，在物色好妇、婿对象之后，先找“则巴”（ ཇོ་པ་ ）意为卜算者）打卦、占卜，如占卜吉利，在男娶女嫁时，则由男方邀请亲友到女家说亲；女娶男赘时，又由女方邀请亲友到男家说媒。说亲的主要条件，首先是门第相当，说亲者（媒人）具有一定权势，这样，亲事就有较大的把握。

说合既成，说亲一方要向对方送聘下礼。聘礼多少，根据双方家庭的地位和富有状况决定。头人家娶亲，聘礼一般不少于牦牛一百头，或牦牛一百五十至二百头；普通牧民娶亲，富有者聘礼可达牦牛七、八十头，贫穷者也要一、二十头。受聘一方在接得聘礼后，要准备价值高于聘礼一倍的陪奩，如系男赘，陪奩除牲畜外，还要有好枪、好马、和镶有獐皮、豹皮衣边的皮衣若干件。头人家的子女出嫁或入赘到别的部落，还要陪送几十户差民随往。

结婚日期，由嫁娶双方家长共同请“则巴”打卦决定，一般在秋末冬初月份的二十一至二十八日之间。婚期既定，双方要在婚期的前一个月通知各自的亲友，亲友如期携带礼品前往祝贺。礼品主要是牲畜、牛肉、酥油等。头人子女婚嫁，其所属牧户都要前往祝贺，并按例每家要备送酥油一块，重量为其家所牧奶牛一天内所生产的酥油量，以及用酥油和奶渣制成的糕一块，糕一面用酥油敷凝成一个“卐”字，表示吉祥，这些是必备的礼品。此外，有的还要送牛、送马和送屠宰后牛的后腿（按部落习俗，一头牛被屠宰后，分为八块：颈项一块、前腿两块、胸叉一块、腰圈两块、后腿两块，前四块禁作礼品送人，认为是不吉祥）。

下聘之后，下聘一方要将一头犏奶牛送到被聘人家，以示对被聘者的生母报养育之恩。

婚期的前一、二天，双方家庭都要请喇嘛到家念经，嫁方希望子女被迎出家门后能交上好运，娶方希望新人进门能给家庭带来幸福。

婚期前一天，迎娶一方要派自己的两个兄弟前去迎亲（头人家则须派两个亲信头目），迎亲者按例要带彩箭一支，外形美观，内装小麦的小皮口袋一根和一只绵羊，远道迎亲，牵羊不便，可用一捆羊毛代替，用以象征福禄寿喜、人畜两旺。在到达被迎亲者家门口时，被迎娶者及其生母要到帐篷外迎接，从迎亲者手中

接过哈达、彩箭等物。待迎亲者致贺词后，请进入帐篷入座，献茶。当天，迎亲者就在被迎者家里住下。第二天根据路程的远近，决定出发时间，临走时，喇嘛念修福经，这时被迎娶者的家里要将一根股羊毛绒搓成的，约三尺长的细绳，一头交与被迎娶者拿着，另一头交与喇嘛，待修福经念毕，被迎娶者要将毛绳和身上的一件衣物留下，方法是被迎娶者将衣物从身上取下，顺着毛绳的方向与毛绳一起递与喇嘛，以示自己不能把喇嘛所祈求来的好运气全都带走，使两家都能得到幸福。

新娘的穿着，依照习俗要穿镶有獐皮边子的皮衣，从头到腰挂三根披带，带须要用各色丝线搓成，长短不论，带宽中幅约五寸，边幅约三寸；左右两胁佩带“洛净”（ལོ་གྲོ་ 意为侧饰品）；披带和洛净，均用红色藏片镶以绿色或黑色的边子，上面扎以珊瑚、密腊和金银花饰，洛净上扎有金银制成的鳄鱼或金鱼以及八宝花纹的饰物，挂有针线盒。头戴珊瑚和密腊穿成的“千马”（类似凤冠的女头饰）；金银耳坠长约五寸，也镶以珊瑚、密腊和松耳石；带珊瑚和玛瑙串成的项链，一般要佩戴三至五根之多。一个新娘所戴项链的多少，金银饰花的大小和多少，往往显示其家庭的富有与贫穷情况。新娘的衣著颜色和出行方向，要经则巴卜算决定。

新郎也要穿着一新。一般是头戴蒙古式的宽边红缨毡帽，或者用一张狐皮缠头，身穿豹皮镶边皮衣、足蹬崭新藏靴，背背长叉钢枪，腰插金银珠宝镶柄的藏刀，跨下骏马一匹。

婚期清晨，被迎娶者的娘家要在自家的牛毛帐前熏烟，请喇嘛念经，还要摆一支木桶，桶内装满清水，桶口横放一枝柏丫，桶旁摆“昔马”（ཐྱི་མ་ 在一四方木盒内，装上糌粑和酥油的混合物），当喇嘛念完修福经，新娘将身上的一件衣物连同手里的羊毛绳，递给喇嘛以后，喇嘛即抓起昔马向出行方向洒三次，新娘绕昔马三匝，然后上马向出行方向走去（如出行方向与去婆家的方向相背，亦应先向喇嘛指定的出行方向走一段，然后再绕向要去

的方向），送亲人跟在新娘之后。送亲人必须有一人是新娘的兄弟或姊妹。另一人是父母双全、生辰八字与新娘相合，名字又含吉祥意义的伴娘。亲友也要送一段路程。然后与新娘喝酒告别。

迎娶者也要在帐篷内外作一番布置。帐篷内的三锅灶边木凳上要放一块白毛毡，毡上用麦子摆成“卐”字。要面对面摆好两排坐床；帐篷外面也要摆水桶、芋马。还要按三包一杠地摆上几杠茶包，这既是新娘的下马足蹬，也是要馈赠给送亲人的礼品。新娘到来时，要先熏烟，以示迎接，然后由两个接亲伴娘（条件一如送亲伴娘）上前用哈达包着新娘的马缰绳，把马牵过来。牵马的送亲人如觉得茶包不少，就将缰绳交出，扶新娘踏茶下马。新娘下马后，还要绕马三匝，然后等喇嘛念完修福驱邪经，洒了净水，表示将邪气驱走后，即由迎亲人扶入帐篷。在帐篷内新娘要先在灶边白毛毡上坐一下，以示给婆家带来了吉祥，再往灶内加上几根柴块，使火明旺，预示新娘过门，家业兴旺。接着，接亲伴娘端来八宝花纹细瓷碗盛装的牛奶，碗内放一银制调羹，新娘先舀一调羹奶子放入左手心，再用右手手指调奶，向空中弹洒（敬神）三次，然后端起碗来喝三口，以示新娘吉祥如意，心地洁白。接着，新娘要同接亲的伴娘坐在一起，双方的主要亲属坐在另一边，新娘的坐垫后面要放一匹红色的缎子或布，用以把新娘的披带托起来，这匹缎子或布用完后，也要赠给送亲人带走，在大家都坐下以后，方略进些次食，等喇嘛通知念经。念经时，新郎要来到新娘坐在一起，共同听念招财吉祥经。念毕，举行婚宴，新娘要先吃些生人参果（即鹅绒委陵菜，属蔷薇科，藏名卓玛^{ཇོ་མཆོག་}其根部俗称人生果，是牧民在婚宴中必需的主要食品，据说吃人参果可以带来吉祥），再请客人共餐，席上主要是人参果、牛羊肉、奶渣糕、麻花、酥油汤等；边吃边唱“巴洛”（^{པ་ལོ་}即新婚歌）；吃过饭再喝酒，并请一、二个人作婚礼讲话，赞颂娘家的家族血统象海螺一样天衣无缝，婆家家族血统象松耳石一样洁净无瑕。赞颂两家的姻缘象一座走过万岁的桥，结成百家、千家

的亲联系。讲完后，再请人讲述格萨尔王传说助兴。

婚礼举行后，新郎新娘还不能入洞房同居，而是新娘在婆家住两三天后，仍返回娘家。这时，婆家要将新娘下马的垫足茶和垫托被带用的织布带走，还要给送亲者赠送一匹好马，给伴娘（^{གཞན་པོ་}）送一腿或半边羊肉，一腿牛肉，一饼奶渣糕，一块酥油；婆家还必须有与娘家送亲人数相等的“顿热”（^{དུན་ལྔ་}即迎娶一方的送亲人）送新娘返回。新娘回娘家住几天后，新郎再到岳父家去。这时，男女双方要共同在女家宴请至亲好友，被邀请亲朋，要馈赠礼品，礼品一般是狐皮、獭皮、松耳石之类较珍贵的东西；宴请中，摆在每个客人面前的食物，可以带走。新郎新娘在女家闲住几个月后，再回到男家，用同样的方式宴请至亲好友，客人也同样馈赠礼品。这些必经的仪式完成后，夫妻开始同居。

这一男娶女嫁的程序，同样适用于女娶男赘。

（二）丧葬

勒余部落的丧葬习俗同康区其它地方也大同小异。但由于它是纯牧业地区和独立的部落，因而又有它独特的风格。

一般人死后，先要在帐篷内停放三天，第四天专请一个有道理的喇嘛为之念开路经，并根据死者的生辰属相，经过卜算，决定采用那种安葬仪式。

葬仪分为三种，即天葬、水葬、火葬。火葬较多，据说这是将尸体火化敬神，火葬的方法，先是由喇嘛在焚尸处铺一层面粉，用木刻板在面粉上印出坛城上（^{བུ་ཁྱེད་ཀྱི་པ་ལོ་}）胜定，然后在佛像上架柴，柴上置尸。置于杂柴间的引火之物有青稞、小麦、酥油、丝茅草、空心树枝等。烧尸后的第四天捡拾骨灰，磨成粉末，渗上黄泥，做成“察差”（^{ཅམ་}是一种小圆锥形的土塔，大小不一，一般直径约七、八公分，高约四、五公分），再由喇嘛念经超度后，装入柏木盒内，放到山岩石洞之中。

天葬、宗教徒说是为了将尸体施舍于空中之鸟，进而解脱死

者幽灵的苦难。各部落都设有天葬场，场内栽有四根大的木桩。天葬时将死者四肢捆缚在桩上，先将头割下，用衣服包裹，再用刀将尸身划破成若干方形小块，然后由喇嘛吹号角、熏烟、诵经，雕鸟闻号角声、即飞来啄食尸体。俟尸肉被食完后，又将骨骼取下，连头骨一并砸碎，掺合上糌粑，洒向雕鸟，直至食尽为止。

水葬：按宗教徒说法也是为了将尸体施舍于水中之鱼，进而得到超度，早日投生人间。水葬有两种：一种是将尸体割碎抛入河内，另一种是将整个尸体抛入河中。

不论采取上述何种方式，都是将尸体用牛驮向火、天、水葬场所，驮尸的牛，即予放生。

在进行上述任何一种葬仪时，都要请喇嘛念经，从死后那天算起，要念七个周期，即四十九天。所请喇嘛的人数，按死者家庭经济情况，少则一、二人，多则几十人。人一死（最好是在弥留之际）就要念开路经，为死者开路。认为最好是请公认为修道有德的喇嘛或活佛。对他们的供奉，一般是奉送配备有鞍辔的好马一匹，毡毯一匹。家境再穷，也要将家中最贵重的东西供作“普打”（པད་དེ་ 意为给念开路经者的供奉）。人一死，要立即画一张死者坐在莲台上的遗像，名叫“擎浆”（意为灵牌），前放供品，喇嘛即围像念经，念完四十九天后，将像烧掉。宗教习惯说最后一天是死者经过超度投生的日期，来生好坏，完全取决于主持念烧像经的喇嘛的修行，故而千方百计聘请一名道行较深的喇嘛念经，对他则要供奉一头牛或一匹马。

为了纪念死者，死者家中往往花不少钱请人画一张根据死者死后卜算所要求的神像，名叫“结答”（意为超度像，为超度死者离脱恶趣，往生净土而修造的师、佛、神像）。画中死者双手合十，跪在神前，祈求超度。

解放后，特别是实行民主改革，实现人民公社化以后，经过一系列的工作，原属勒宗部落人民群众的觉悟有了很大提

高，群众生活有了极大改善，旧的封建制度得到废除，旧的婚嫁习俗有了很大改革。但由于长期以来的思想影响，流传很久的一些习俗，仍然可以看到他的踪影。我们相信，随着祖国和社会主义制度的不断巩固和发展，人民群众科学文化、思想觉悟的不断提高，勒宗人民一定會在党和政府的领导下，立志改革，废除不健康的東西，保留和发展具有民族特色的优良传统，为四化建设作出贡献，尽快地踏上先进民族的行列。

（朱作中 高济昌 邓俊康 整理）

一九八三年八月

四川藏洋始末

王承志

中国是世界上使用货币最早的国家之一。根据古代文献记载和大量出土文物考证，中国货币的起源，至少已有四千年的历史了。

这里介绍的四川藏洋，就是在祖国浩瀚的货币历史银河中的一颗星星。

(一) 藏洋概述

四川藏洋，又称藏圆、藏币、洋钱、四川卢比、川卡（为叙述方便，通称藏洋）。这种具有历史意义的地方银元，是中国与英国之间货币战争的产物。

藏洋是为驱除印度卢比而仿印度卢比铸造的银币，正面为光绪帝像，背面为“四川省造”四个汉字，它是全中国唯一广泛流通过的有中国帝王像的货币，在从光绪廿八年（公元一九〇二年）起到解放后的一九五七年止的整整半个多世纪中，它大量流通于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简称甘孜州，旧称康区）及其邻近藏族聚居区；它又是与西藏货币不相同的一种货币，西藏货币以两为单位，而藏洋却是以元为单位。

藏洋先从光绪廿八年至民国五年在成都铸造，后于民国十九年至民国三十一年在康定铸造。在习惯上，人们按时间先后，把藏洋的铸造分为四个时期，即：光绪廿八年至宣统三年为第一期；民国元年至民国五年为第二期；民国十九年至民国廿四年为第三期；民国廿五年至民国三十一年为第四期。

藏洋面值分一元（合四咀，重三钱二分，直径三十毫米），半元（合二咀，重一钱六分，直径廿四毫米），一咀（四分之一元，重八分，直径十八毫米）三种。半元、一咀均系成都铸造，铸量仅25万枚左右，而一元币的总铸量为2550至2750万枚左右。

一元藏洋的含银成色随着铸造时间的推移逐步降低，悬殊很大，高的达90%以上，低的每枚含银仅三分二厘。因此，人们又按含银成色的高低把藏洋分为四类，即：含银在90%左右的列作一类；70%左右的列作二类；50%至60%的列作三类；50%以下的列作红藏洋类。所以，藏洋的版别相当复杂，购买力也因含银成色的高低、时间地点的不同而各异。

由于半元、一咀两种小额藏洋铸量太少，加之岁月流逝，民国初年市面便已不易见到。为零星找补方便，人们将一元藏洋剖一为二、剖一为四作为半元、一咀在市面广泛行使，俗称“宰口藏洋”。

在半个世纪的流通过程中，由于贮藏、融化、改作装饰品及小用具等原因，到一九五八年初，藏洋的流通总量不过200万枚，不到总铸量的十分之一。

解放后，随着人民币的普遍使用，藏洋的流通范围日益缩小。一九五八年全州禁止金银流通后，人民银行对一、二、三类藏洋大量予以收兑，收兑量为100万枚左右。到一九五八年底，藏洋便退出了货币流通的历史舞台。

(二) 藏洋是中英之间货币战争的产物

十九世纪末，由于政治、历史、地理等原因，康区的社会尚处于封建农奴制度阶段。农牧业生产仍然停留在数百年前的水平上，处于广种薄收，靠天放牧的原始状况，手工业只是有了初步的分工，人民过着牛马不如的生活，自然经济占了压倒优势。

当时，康区的交换方式是很原始的。在光绪以前，西藏所铸

银币未输入康区，内地铜钱亦止行于打箭炉（今康定）。康定虽为“茶马互市”中心，但历代赏赐、贸易遗留下来的生银、大银并不广泛流通。稍后，因贸易的发展，银锭及外圆内方的铜质制钱才较大量地流通于康定、泸定两县。在关外（指折多山以西的康区），则长期保留了以易易物的古代交换方式，处于扩大的价值形态和一般价值形态的交换阶段之中；藏胞的生活必需品——边茶、青稞、食盐等，在一定程度上起了类似货币的作用，有时，银锭及散碎银两，亦充作交换媒介。

经济落后的地区，往往仰赖于先进地区供给商品物资，造成商业资本的独立发展与大量的入超，清季藏汉间的商业活动，是藏商将货物售与康定商人，取得四川成渝各地兑票，再以兑票购茶布杂货。当时，每年由康定销往关外、西藏之货，总值达数百万元大洋。也就是说，在十九世纪末叶，康区商业贸易已经有了一定规模的发展，而货币流通却几乎处于空白地带，很不适应商品交换的需要。这就给卢比的入侵造成了可乘之机。

在“夺取殖民地的‘大高潮’，分割世界领土的斗争”中，“英国特别加紧夺取殖民地。”（《列宁全集》第廿二卷）英国自十八世纪中叶稳定了在印度的统治以后，便逐步将邻近西藏的一些小国尼泊尔（公元一八一六年）、克什米尔（公元一八四六年）、锡金（公元一八六一年）、不丹（公元一八六五年）纳入其势力范围，并极力向我国西藏地区扩张。在鸦片战争打开了侵略中国的东大门之后，英国便加紧了对西藏的侵略。

由于清朝政府的腐败无能，以军事入侵为先导的英帝势力，便迅速把他们的商品倾销到西藏、青海、西康市场，对落后地区实行以掠夺式的不等价交换为中心的经济侵略。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那样：“鸦片战争替英国商业开辟了中国市场。”（《马克思恩格斯论中国》）

光绪初年，随着英印商品的大量倾销，印度卢比也大量侵入，几乎成了西藏通行的货币。光绪廿年前后，卢比流通到打箭

炉一带。当时，不平等条约的赔款，英帝强迫拉萨色拉寺交的罚金，朱倭、麻书、孔萨、白利、东谷（今甘孜、新龙一带）土司向西藏派驻瞻对（今新龙）的官员缴纳赋税，都是以卢比为单位计付的。

印度卢比银币由英国东印度公司用机器铸造，是英帝国主义控制印度殖民地的经济工具之一，分一卢比、二分之一卢比（即50派士）、四分之一卢比（即25派士）数种。一卢比重三钱二分，正面多为英女皇维多利亚像，亦有英威廉四世帝像、爱德华七世帝像等，背面英文标明币值，四周用花纹环绕。因卢比含银达八成以上，又以元为单位，加之英印输入商品多系藏胞需要的日用品，故卢比在康藏流通日广。英帝利用卢比控制康藏贸易，翻手为云，复手为雨，三钱二分一枚的卢比却作四钱购货，使清王朝利权外溢，主权受损，人民也深受其害。

卢比侵入后，打箭炉同知刘廷恕认为这样发展下去必将使边疆为英帝霸占，因此，呈请四川总督奎俊设法铸币抵制。奎俊怕由此引起外交上的争端而没有同意。刘两次报请，奎俊才默允以藏饷之银试铸三钱二分纯银币抵制卢比。

刘廷恕于光绪廿七年左右铸造了三钱二分银币，币的正面有汉文“炉关”二字，背面有藏文，并用花纹围绕。这就是藏洋的前身。刘廷恕首铸的这种银币因系土法制造，出品不多，而浩繁的边饷则以此币发放，故供不应求。因此，从光绪廿八年一起，藏洋正式由四川省成都造币厂代造。

彭信威在《中国货币史》中指出：“印度的卢比，不但在西藏流通，而且在云南、四川也有流通。四川当局在光绪年间曾铸造一种卢比与之抵抗，俗称四川卢比。……这种银币是有历史意义的，它标志着中英间的一场货币战争。”

在英帝国主义卢比侵略的逼迫下，藏洋应运而生。从此，中英间的这场货币战争打响了。

(三) 藏洋的铸造

一、铸造经过与铸造总量

大批藏洋先后在成都、康定铸造。

根据有关资料记载，藏洋在成都开铸于光绪廿八年。

四川总督锡良在光绪三十一年十一月廿九日的奏折中写道：“川省机器局设有铸造银元厂，……爰仿照印度重三钱二分为一元之卢比，自行试铸……铸成后虽核计获利甚微，而行之炉厅暨附近边台，汉番亦均乐用，……现飭随时酌量续批鼓铸发充饷需等项……，以恢币政而利边氓。”（《中国近代货币史资料》第一辑）。从锡良的奏折中可知：在光绪三十一年之前，成都造币厂已在仿卢比试铸三钱二分藏洋并且已发行到康区了。具体铸造于何年呢？《四川文史资料选辑》第四辑记载：光绪廿八年“始铸藏币”（此处藏币系指藏洋）。仿四川省财政厅厅长甘典燮撰写的《清末至解放前四川地区货币概况（初稿）》计算藏洋的总铸量，也是从光绪廿八年算起的；黄云鹏在《四川财政录》中进一步明确记述：光绪廿八年，成都造币厂铸造的三钱二分藏洋是230,340元。

铸造藏洋的目的、要求、铸造地点、使用范围，在锡良的上述奏折和清廷的批准文献中交待得非常清楚。清政府看到“国币关系主权”的严重性，针对“……印度卢比流行卫藏，……近年则竟侵灌至关内打箭炉关”、“利权尽失”的状况，而采取仿卢比铸藏洋的措施来达到“保我利权免致外溢”的目的；其要求是从质量上要“铸造务精，银色务足”，从数量上是“期于足用而止”；其铸造地点则是“川省机器局”之“铸造银元厂”（即成都造币厂）；其使用范围是“此项银币专为藏卫而设”，“应准在西藏及附近边台行用，作为特别商品，自不得任便行使内地。”（以上均见《中国近代货币史资料》第一辑）

这样，经清廷进一步认可，大量藏洋便由蓉续铸，发行到卫藏。清亡后，民初又接着铸造。

光绪廿八年至民国五年在成都铸造的整元藏洋总数为1750万枚左右，半元约14万枚，一咀约11万枚。

民国元年后所铸藏洋，因成色减低，在康定由原三十一元一咀换十两生银增至四十元才能换十两生银。加之生银日昂，成都造币厂无利可图，故民国五年后停铸。

藏洋停铸后，来源断绝而贮藏、融化、改制如故，流通所需藏洋数量日益减少，市面深感周转不灵，军商交困。这表现征，一方面，民初所铸成色较清季低的藏洋由每四十元才能换十两生银升值为廿四、五元就能换十两生银；另一方面，康定商家不得不发行大量期票以资周转。

当时，期票多由康定出票，成都、重庆等地取款。范围限于汉商交易，如集文生、世昌隆、丰记、天增公、集庆隆等号。一年周转的期票，有二百万元左右。

川康边防军第二旅旅长马骏见此情景，即呈准川康边防总指挥刘文辉，于民国十九年在康定设造币厂鼓铸藏洋。康定所铸藏洋均为一元，无半元、一咀。

康定造币厂的开工情况是：

铸 造 起 迄 时 间	开工月数
民十九年五月四日至廿四年正月初二遭火灾暂停铸	57
民廿四年底搬迁厂址至廿五年七月	8
民廿五年十月至廿八年七月	34
民廿八年十月至三十一年年底停铸	39
合 计	138
折成正常生产时间	约100

由上表可见，从民国十九年起，至民国三十一年止，康定造币厂正常开工铸造时间共约100个月，按月平8至10万元计算，总铸量约800至1000万元。

综上所述，蓉、康一元藏洋的铸造总量是2550至2750万元左右。

二、康定造币厂

康定造币厂是专为铸造藏洋而设立的，厂址在康定县南门。

康定设厂铸币的原因主要有二：清末以来，康区人民使用藏洋已成习惯，贸易周转必需，这是其一；借市面急需而设立像造币厂这样的摇钱树来解决康区浩繁的军政需要与财政大额亏空的矛盾，这是其二。

民国十九年，康定造币厂从成都、雅安搬来机器，从成都造币厂雇来技术工人，经过一番筹划，于同年五月四日正式开工，当日即铸出藏洋四千枚。

该厂内部组织分事务、工务两股，股下面按工种设段。工务股下面设钢模、融化、捶片、辗片、打坯、印花、机修等段，各段分设头目，由一工师督率。因无水、电力，故机械运行全凭人工。工人每人平均劳动十小时左右。

康定造币厂厂规颇严。工人入厂必须有担保人，除工场设有监工外，还有伪廿四军一个班的兵力专门守卫。该厂所用铸模，由一专门师傅雕制，通常一副铸模可用一月左右，模坏即毁，严禁外拿。

该厂从民国十九年五月四日起至廿二年正月初八止由川康边防军第二旅旅长马辅主管；从民国廿二年正月初八日起至廿四年正月初二止由川康边防军第一旅旅长余松林主管；从民国廿四年底起至民国廿八年元旦止由伪康定边关税局局长张家汉主管；从民国廿八年一月起至三十一年停铸止由伪西康省财政厅会办李先春主管。

三、铸造时间、版别与成色

中国的银币，不少是仿外国的银币铸造的。如：清朝的龙洋，就是仿的墨西哥银元；乾隆五十七年西藏所铸章噶，就是仿的廓尔喀（今尼泊尔）银币。藏洋也是如此。

藏洋正面易维多利亚像为光绪像；背面易英文为“四川省造”四个汉字，正中有一立花子或横花子，周围环绕的花纹与卢比相仿，其重量、大小均与卢比一致。

藏洋的成色，总的规律是：铸造时间越早，成色越高；越迟，则成色越低。

时间与成色的关系大致是：

习惯分期	时 间	地 点	成 色
一	光绪廿八年至宣统三年	成都	银九成左右
二	民国元年至民国五年	成都	银七五成左右
三	民国十九年至民国廿二年	康定	银七成左右
	民国廿二年至民国廿四年	康定	银六五成左右
四	民国廿四年至民国廿八年	康定	渐降至银五成左右
	民国廿八年至民国三十一年	康定	渐降至银不足一成

藏洋的版别相当复杂，大约有四十二种。仅现在收集到的有较大差别的，也有十几种。

版别与成色的关系大致是：

人民银行 收兑类别	正 面	背 面	成色
一	光绪像无衣领	“四”字中间为两点，花纹 深细	九成左右
	光绪像有衣领	“四”字中间为两点四字右 上端有一酷似蝴蝶的图形	九成左右
二	光绪像有衣领	“四”字中间为两点	七成左右
三	光 绪 像 有 衣 领，背驼或头 方	“四”字中间为八字	六成左右
红藏洋	光 绪 像 有 衣 领，头像粗糙	“四”字中间为八字，花纹 粗糙	五成下以， 越次铜色越 显

此外，还发现过一些私铸藏洋，如：大白事件（一九三〇年由甘孜大金寺与白利土司之间的矛盾引起的一场争斗）期间开始出现于康定市面的所谓“西宁藏洋”，一九三八年曾流通于炉霍的“克罗洋钱”，一九五八年人民银行在收兑中发现的“铝镍藏洋”。

（四）铸造藏洋的白银由来

清末在成都造币厂铸造藏洋所需的白银，由清廷以边饷名义拨付。在赵尔丰统治川边时期，则列入开边经费拨给。

光绪三十一年，驻藏帮办大臣凤全被杀死于巴塘。锡良命提督马维祺、建昌道赵尔丰率兵镇压。攻下巴塘后，马即返川。赵接办善后，移兵讨乡城，历数月而克。“于是赵尔丰建议筹边，锡良以闻加尔丰为侍郎，充川滇边务大臣。赵尔丰会锡良及云贵总督丁振铎奏陈改流设官、练兵、拓垦、开矿、修路、通商、兴学诸端，延议准拨开边费银百万两。”（《清史稿》四十二册）光绪三十四年，清廷调赵尔丰之兄赵尔巽督川，命赵尔巽为赵尔丰大力提供军需银两，对筹边“应需款项……无分畛域，随时接济”，“倘有不敷之款，应由四川总督遵旨随时接济，以固边

陲。”（《清季度支部遵旨筹拨边务常年经费折》）这样，藏洋就用源源不断的开边银两铸成而运到康藏。

民初，四川都督、西征总司令尹昌衡时期铸造藏洋所需白银，也是以边饷名义拨付的。据记载，“民国改元，尹昌衡督师西征，开府康城。年余之久，川省解济边款约300万两。”（《新西康》创刊号）

在康定铸造藏洋的生银，相当部分用的是印度银砖。银砖每块重约七百两，大小与现在建筑用的砖相仿，成色较好。民国初年，岁必运银百余驮，以后，尚有数十驮运入康定。每驮能载两砖。当时，康定造币厂直接向藏商收购银砖，开初用藏洋收购，后期用法币收购，每两合法币九角。该厂所码银砖，几乎盈屋。至于铸币所需红铜，则主要用西昌的铜板，每斤合法币八角，有时亦化铜元。

印度银砖是怎么流通到康定的呢？

这就得简略地谈谈以边茶为中心的藏汉贸易了。

元、明、清封建王朝利用藏胞视边茶如同生命而藏区又不产茶这个经济弱点，把控制边茶作为控制藏区的有力工具。随着“茶马互市”地点的步步西移，康熙四十年（公元一七〇一年），清廷设关在打箭炉。从此，藏汉间以边茶、药材、皮毛为大宗的贸易中心便确定到康定。

康定设关后，藏汉贸易绝大部分通过康定市场（少数经西宁和滇北）。因此，直到一九三二年前，康定关都掌握了康藏和内地贸易的主要货物。在康定的贸易中，边茶是出关的大宗，茶课的征收因此成为一项最主要的收入，常占税收总额的40%以上。康定关年征茶课常在十万两白银左右。按当时规定，每一引票计茶五包，征银一两。照此计算，每年入康的边茶有十万引即五十万包。据记载，入康边茶最高曾达到六十万包，而近年甘孜州边茶的年销量才三十多万包。可见，当时从康定出关的边茶，一半左右都销往了西藏。

随着以边茶为中心的藏汉贸易的继续开展,既是边茶的主要推销者,又是经营英印货的转口商——大金寺、理塘寺、邦达昌等大藏商往返于康定、拉萨之间,沿着前辈开拓的“边茶之路”(藏语为贾兰姆,意即茶路)奔走经营。

藏商把数额庞大的边茶、日用品等运往西藏换取银砖(通过藏印贸易获得)、英印货,又将银砖、英印货、皮毛药材运到康定换取边茶等商品(大部分英印货、皮毛药材通过这里输往二郎山以东),形成了边茶、日用品、银砖、英印货、皮毛药材的不断循环。这样,用以填补藏汉贸易差额的银砖便一驮又一驮地运到了康定。

值得提及的是,在康定造币厂成立前后的数十年时间里,康定的银炉铺为调剂货币起了不小作用。因藏洋只通行于康定和关外,而大洋、银锭虽通行于内地但又不通行于关外,康定茶商便将收到的银砖送到银炉铺兑成五两、十两的银锭用作支付背茶力夫的运费,流往内地;藏商和去关外的人员又将银砖或大洋拿到银炉铺兑成藏洋携往关外。这样,随着商品的循环,又形成了银砖、藏洋、大洋、银锭的货币循环。

一九三二年以后,康藏政局日益不稳,路途不宁,商贾裹足不前,云南茶价低廉,康南一带多由滇进茶;滇越公路完成、印度铁路抵萨地亚后,部分藏商改道经商,不过康市,故康定贸易额锐减,导致银砖来源日益枯竭。此时,历代散布于康藏的银两(元宝、银锭等)才大量用于铸造藏洋。

但是,在抗日战争时期,由于海岸线被日寇封锁,康藏高原一度成为重要的国际交通线。作为转口贸易重要通道的康定,因此呈现出虚假繁荣。这样,仍有不少白银流到康定,充作藏洋原料,只是价格日昂、数量日益减少罢了。

(五) 藏洋的流通

一、藏洋与卢比的斗争

如果说刘廷恕首铸“炉关”银币揭开了中英间这场藏洋、卢比战争的序幕的话,那么,赵尔丰就把这场货币战争推向了高潮。

光绪三十一年,赵尔丰率兵行至理塘时,藏民拒用藏洋,赵尔丰即诛为首二人,民众畏懼,不敢不用。赵尔丰赴巴塘、克乡城后,随着改土归流政策的步步实施,藏洋才在关外广泛流通。

光绪末年至宣统元年,卢比在康藏作四钱行使,而同样质地的藏洋却只作三钱五分使用,加上赵尔丰的武力征讨与改土归流,使藏洋迅速推进,卢比步步退却。

但是,英帝国主义并不甘心在这场斗争中的失利。它利用军事力量的威慑和强大的经济实力,拚命压低藏洋的购买力,竭力稳住卢比阵脚,以达到侵略的目的——变中国为殖民地。

藏商、藏民持藏洋向英印商购货时,英印商故意刁难,推说藏洋分量不足,不是拒用,就是每元只肯按三钱给货。当时,藏印贸易量大,英印货在西藏逐渐占领了除边茶以外的大部分商品市场,因而英印商就能在很大程度上左右市场,使藏洋在大部分地区只能作三钱使用。那时,驻藏大臣衙门、川滇边务大臣衙门及其下属的军政费用,大多使用藏洋。但是,按三钱五分一元拨付的藏洋经费,薪俸在西藏只能按三钱购物,使驻藏人员经济受损。这样,使得藏洋在与卢比的斗争中处于不利的地位。

为挽回失利,宣统元年,驻藏大臣联豫、边务大臣赵尔丰遂咨请川督赵尔巽将藏洋照本位三钱二分行使,并奏请由川鼓铸当十铜元一千万枚运康辅藏洋而行。议准后,赵尔丰于宣统元年十二月廿一日发出告示,通令每元藏洋按三钱二分行使。其时,税收机关亦采取相应措施,在征税时,则只收藏洋,不收卢比。

从北，迫使卢比在康区由原来的作四钱使用降为与藏洋等值流通，其流通量逐渐稀少，而藏洋几乎成为康区唯一的通货。然而，在除昌都一带以外的大部分西藏地区，清末、民初铸造的藏洋每元仍然只能作三钱使用，康定所铸第三期藏洋只能换一钱五分藏币，第四期则根本不能流通。这样，藏洋实际上仅主要流通于康区及其邻近地带。

双方斗争的结果，造成了康区藏洋多，卢比少，西藏卢比多，藏洋少的局面，迨至以后。

完全可以说，在中英间的这场货币战争中，藏洋在康区是立住了阵脚，然而，却没有达到从卫、藏驱除卢比这个预期的主要目的。这是清王朝统治时期的腐朽政治与落后经济造成的必然结果。

二、流通的范围、数量与购买力

藏洋是清末至解放初期流通在甘孜州及其邻近藏区的最主要的地方货币。

三十年代，除泸定、九龙县外，甘孜州各县均有大量藏洋流通；除泸定、九龙、丹巴、乡城外，各县流通的主币均是藏洋。就连石渠这样的纯牧业县，在县上使用的货币也主要是藏洋。邻近的西藏昌都，青海玉树、称多、囊谦等地，藏洋也是主币。直至解放初期，情况亦如此。此外，当时流通于市面的货币，还有西藏地方造币厂所造各种“藏币”；袁币、孙币、川半开、云南铜洋、铜元、铜钱等内地货币；印度卢比等外币。四十年代，在康定、泸定等县，伪法币等纸币也曾充作主币。

在经济生活中，藏洋发挥了价值尺度、流通手段、支付手段、贮藏手段等各种职能。在州内，除商品交易外，畜税及部分粮赋的征收，喇嘛寺、土司头人的部分放债，寺庙的散招，乃至帝国主义分子用地的租金等等，都是用藏洋来计价支付的。

据估计，民国时期至五十年代，藏洋的流通量大致是：

时 间	流通数量（元）	累计铸造总量（元）
1916年	300万以上	约1750万
1929年	约100万	约1750万
1936年	200万以上	约2100万
1943年	400万以上	约2550至2750万
1952年	约350万	
1956年	250~300万	
1958年初	不到200万	

如前所述，藏洋的购买力，随时间、地点、成色的不同而各异。在刘文辉统治时期，康区藏洋的购买力大致是这样的：康定多用二类藏洋，其与大洋的汇率，大约是两元半至三元藏洋合一元大洋；当时，一人一月的中等伙食费约需十五至十八元藏洋，可购金尖茶一包或大米48斤；一个中等木工的日工资为1.2元大洋。康北甘孜、德格一带多用二、三类藏洋，其与大洋的汇率，通常为五元藏洋合一元大洋；德格县五至七元藏洋可购一氈茶或青裸四十斤。康南理塘、巴塘一带多用三类藏洋或红藏洋，其与大洋的汇率，通常是八元藏洋合一元大洋；巴塘一元藏洋可买鸡蛋十二个。

三、藏洋的特殊形态——窄口藏洋与加盖印记藏洋

马克思指出：金银铸币“除直接的贮藏形式以外，还有一种美的贮藏形式，即占有金银制的商品。”（《资本论》第一卷）藏族人民是很喜爱装饰的。选作装饰品的，除金银珠宝外，他们还选中了精巧的铸币。这是小巧玲珑的半元、一咀藏洋损耗迅速的一个重要原因。由于半元、一咀铸量不多，这样，到民国十年左右，市面就不易再见到它们了。赵尔丰时设法运入的不少川铸

铜元、铜钱，也因损耗迅速，不敷找补。

早在卢比流入后，因缺乏小额卢比，交易不便，有人便将整元卢比一宰为二或一宰为四，充作二分之一卢比、四分之一卢比零用。藏洋辅币无着后，人们便如法炮制，并把宰割的藏洋称之为“宰口藏洋”。有的人在宰割时竟抽去币中之三分之一，只剩呈新月形的两小瓣，而仍作半元使用，从中牟利。在金属货币流通的情况下，劣币驱逐良币是普遍规律，因而，这种实际上是货币符号的劣币亦能照样通行使用。

但是，在交换过程中，卖货方怕吃亏太多，上十元的交易，往往须有整元搭用方能成交；大额交易，卖方只接受少部分宰口藏洋，大部分仍要付整元。在道孚等康北一带乃至青海玉树，一般规矩，皆于售物计价时以二八成交兑，即一百元中付八十元整币，二十元宰口（这二十元宰口，仍以两个半边算一元）。同时，清末民初，地方当局均严禁宰割藏洋；税收部门又只收整元，加上宰口藏洋多系一、二类，三类、红藏洋不行；这样，又在一定程度上遏制了宰割的更大量进行。由于三、四期所铸多为三类及红藏洋，宰割后不能通用，故市面上流通的多数还是整元，宰口藏洋主要只起辅币作用。

在藏洋上打印记主要是理塘寺（全称为长青春科耳寺）所为。理塘有大量低成色藏洋流通，其购买力很低。于是，以该寺为主体的调解委员会就在三类藏洋或红藏洋上打上印记，以二当三或三当四强行升值流通。但是，该寺在收债时，却并不看印记，而是看藏洋成色，好的才收。理塘喇嘛寺通过打印升值，操纵货币，加重了对人民的盘剥。

（六）藏币券

一、藏币券的发行

康区的财政历来入不敷出，亏空很大。在伪西康省政府成立

前后的抗日战争时期，伪中央更是拿不出多少钱来经营西康。开支无减而来源无着，于是，在经过一番幕后策划后，利用发行藏币券大捞一把的演出便开场了。

民国廿七年，伪西康省建省委员会指令伪西康省银行发行藏币券，借口是通过发行此券，收回藏洋，推行法币。发行藏币券八条办法规定，藏币券发行总额是200万元，由五元券二十万张、一元券七十万张、五角券六十万张组成，限三年全部收回。民国廿八年，由伪财政部核准、成都印刷所承印的藏币券全数运到了康定，实际运到数是210万元。

迄今发现的一张一元藏币券长12.5公分、宽7公分。正面为绿色，上方用汉文印有“西康省银行”字样，下方印有“财政部核准”、“财政部成都印刷所承印”字样，币中为布达拉宫图案及“壹元”字样；背面为蓝色，印有藏汉两种文字，藏文内容与正面相同，汉文印有“藏币”、“壹元”字样。

民国廿八年，伪西康省主席刘文辉颁发了发行藏币券布告。其主要内容是：一、藏币券是“经呈委员长蒋饰由财政部印制”的；二、凡持有藏洋者，“均须悉数持向西康省银行或其办事处兑换法币或藏币券”每藏洋一元，“准兑换法币五角；而藏币券每元，亦即按此执行”；三、藏币券“行使全康”，“所有康境机关人民均须一律收受，不得歧视”，如持有藏洋“隐匿不兑，或操纵意存歧视者，除将藏币没收外，并以破坏币制，紊乱金融论罪，决不宽贷！”这样，继川边镇守使陈延龄和西康省商总会之后，甘孜州第三次藏洋兑换券的发行就开始了。

当时，伪中央社、中央社蓉市讯、川康社等分别在《党军日报》、《华西日报》、《新疆新闻》上宣传了伪西康省发行藏币券消息，为藏币券的流通鸣锣开道。

在此之前，还发行过两次藏币券。第一次是民国十年，陈延龄因银根吃紧、商业周转不灵发行了三十万两藏币券。该券均为一元面值，有两个火柴盒大，粉红色，印有藏洋花纹，一元兑藏洋

一元。当时，曾设兑换局专主其事，后全部收回。第二次是民国廿六年西康商总会发的藏洋券，计划发两万元，实发9853元，后尚有128元未收回。

二、藏币券是掠夺藏汉各族人民的工具

伪西康省政府为了骗取人民信任，在发行藏币券之初，其购买力与一类藏洋（康定人称为老洋钱）是一样的。当时，两元藏币券值一元大洋。这样，藏币券得以很快抛出。

本来，按藏币券发行办法，发行额应是200万元，但伪西康省银行从成都取回的却是210万元，而在该行的帐面上记载的藏币券发行额又只有1,999,774.50元，与领回数相差十万多元，从领券人想方设法多领回十万藏币券，而且要伪西康省银行总行不声不响的事实来分析，这十万多藏币券肯定是发行了的。至于帐实不符，那在旧银行则是不足为怪的。因此，该行发行藏币券收回藏洋的实际数应是210万元。这样，伪西康省银行在发行藏币券之初，就为伪西康省政府发了多领的藏币券这笔横财，其价值相当于五万余元大洋。

更大的油水还在后头。到三年藏币券发行期满时，伪西康省银行只收回销毁136,350.50元。帐面上余下的186万多元（实际应是196万多元）一直到金元券发行后的一九四八年底，都分文未再收回来，即按300万元法币合一元金元券的比率，摆了笔二角八分金元券的币券发行了事。至此，发出未收回的近两百万元藏币券化为废纸，而相当于近一百万大洋的藏洋却变成了伪西康省银行的营运资本，为伪政权大谋其利。

在发行藏币券时，210万藏币券值105万大洋，可是，到一九四八年底，这笔藏币券只值三角五分金元券，合0.175元大洋（帐上所列未收回部分只值二角八分金元券，合0.14元大洋）。时隔才八年，两者悬殊竟达六百万倍。可见通货膨胀之速，国民党反动政府对人民的剥削之巨。

藏币券发行的结果，是藏洋继续流通，币制也未统一，藏汉台

族人民却深受其害。唯一捞到好处的，就是伪西康省政府和伪西康省银行的权贵。

连伪西康省银行的经、襄理自己都说，西康省银行就是靠发行藏币券起家的。伪西康省银行在一九三七年八月一日成立时（该行是甘孜州成立最早的银行），号称资本五十万元，其实本身一元钱都没有，纯粹是个官办空头银行。开业时，只有建省委员会搜刮的民脂民膏中拨给的十余万元现金。但是，它依仗国民党反动派，凭借手中的权力，发行藏币券，抛售伪西康省廿九年地方金融公债，利用存款、放款、汇款等手段操纵市场，投资工业，经营商业，大发横财。在从发行藏币券的民国廿八年到藏币券发行期满的民国三十年的短短三年中，仅据公开的数字，该行就盈利1,327,266.30元，其资本在民国三十二年时便增为三百五十万元。藏币券事实上成了国民党当局掠夺人民的工具。

（七）人民币的统一与藏洋的消亡

一九五〇年三月廿四日康定解放后，根据党的“没收官僚资本”的政策（《毛泽东选集》第四卷）康定军事管制委员会立即于当月廿六日派出军代表组成六人接管小组接管了伪西康省银行总行和伪中央银行康定分行。同年六月十六日，成立了中国人民银行甘孜藏族自治州中心支行（原名中国人民银行康定专区办事处）。从此，康藏高原的金融开始了崭新的日月，货币繁杂、通货膨胀的历史就要结束了。

五十年代初期，人民银行除在康定、丹巴、甘孜等县兑过几千枚藏洋外，对藏洋采取了“不收，不兑，不禁”的三不政策，并发出适量袁头银元与其平行流通。

人民银行在党政领导下，在党的民族政策的光辉照耀下，本着有利于各族人民的团结，有利于生产发展，有利于提高人民币威信的精神，紧密地配合着商品的流通，稳步地扩大了人民币的

发行，造成了人民币与藏洋、袁头银元混合流通的局面。

由于人民币币值稳定，加之新币印有藏文等少数民族文字，易于识别，携带又方便。活生生的事实扭转了解放前国民党反动派滥发纸币造成的各族人民“银洋唯一”的传统心理，有力地证实了人民币为人民。

在康定、泸定两县城区于一九五一年形成了单一人民币市场的基础上，人民币在关外的流通，也从县城起步扩大。

一九五八年四月一日，甘孜州人民委员会发布了全州禁止金银流通的布告。康定中心支行经请示四川省分行批准，从七月一日起对藏洋“以杂银予以收进，”其收兑价是：一类每枚三角六分，二类二角七分，三类一角八分，红藏洋则不予收兑。据统计，全州人民银行收兑的藏洋总量约有100万枚。

一九五八年底，在党的领导下，在全州民主改革取得了伟大胜利的基础上，人民银行终于史无前例地在全州范围内把一个流通着多种币制的复杂货币市场变成了单一的人民币市场，流通了半个多世纪的藏洋从此退出了康藏高原的货币舞台。

在千里高原上，统一的、稳定的货币制度建立起来了，币值混乱，物价飞涨的时代一去不复返了！

（八）简短的结束语

作为一个历史过程，藏洋已经退出了货币舞台。然而，藏洋起了一些什么样的历史作用呢？概括起来，主要是：

一、在甘孜州基本上达到了驱除卢比，捍卫主权的目的。在中英间的这场货币战争中，藏洋虽未能在西藏广泛流通，但却在甘孜州建起了广阔的藏洋屏障，抵御了卢比的入侵，遏止了卢比的继续东流，用货币武器在一定程度上捍卫了国家的主权与民族的尊严。

二、促进了康区商品货币交换的发展。藏洋在甘孜州的广泛

流通，使落后的物物交换逐步为商品货币交换所取代。虽然这个范围主要限于县城，但这无疑是一个历史性的进步。藏洋的流通大大方便了商品交换，从而促进了甘孜州及邻近藏区商品经济的发展。

【作者附记：本文是拙作《藏洋》的缩写稿。在编写《藏洋》的过程中，得到了人民银行四川省分行金融研究所，康定县支行，四川省档案馆、图书馆、博物馆，甘孜州政协、档案馆，成都市图书馆，任乃强教授和钟穆、张策刚、王正刚同志的热情支持。在此，仅表示诚挚的感谢。】

原稿于一九八〇年六月

改写于一九八四年十月

我对康裕公司的回忆

李万均

康裕公司创办于一九三九年，到五〇年康定解放前有十一年的历史，公司的开办对西康省会的水电、印刷等工业，开始垫了一点基础。现就我的记忆和了解所及，将康裕公司的历史演变概述于后以供参考。

一、康裕公司创立缘起

一九三七年前后，康定有美明电灯公司、启康印刷厂、康定裕边实业公司、新康合作社等几家企业。美明经营电灯，启康经营印刷，新康合作社（系李嵩高于一九三六年筹办）经营康定至雅安旧道各站的旅行社及康定二道桥温泉浴室，裕边实业公司（系原西康政务委员会统筹处处长程仲渠集资兴办，以陈化鲲为经理，周懋均为主任），经营烟、酒、糖等日杂货，运销至营官、鱼子石、乾宁等地，供藏族人民和挖金人等的生活需要；同时还经营建筑材料（与康定附近如雅加埂、柳杨、日地等青山工人及石灰、砖瓦工人签订合同，订购原木、板材，烧制石灰、砖、瓦，交货时按价付款）及房屋建筑（聘请阎锡祖和上海人金宝荣为建筑工程师，负责设计绘图、承揽修建后，再包给城内泥工、木工、铁工、漆工等。那时新建较少，多属维修，平日业务，只买卖点建筑材料和小五金玻璃而已）。

旧西康地处边远高寒，交通梗阻，加以长期封建统治的影响，经济极为落后，人民生活非常痛苦。1938年西康正式建省，康定作为省会，机关林立，商旅日繁，对住房建筑迫切需要修缮，

原有印刷设备，无法应付各机关单位对公文印制品等的要求，白土坎水电厂的电灯照明，更是有名无实，至于一般市民生活必需的柴炭燃料，由于长期采伐的结果，周围山头已呈童山秃秃，在当时真是米珠薪桂，实康定人民生活上的威胁，西康省政府委员兼财政厅会办李先春感到要改变西康贫穷落后面貌，必须从经济建设入手，因此积极向刘文辉主席建议：首先成立西康经济研究社，设总社于康定，分别在雅安、西昌建立分社，李先春担任理事长，段天爵、周馥昌、徐孝恢先后任总干事，延聘漆颂平（即漆鲁鱼，曾任成都市人民政府市长）等先后担任总编辑，广泛邀请社会各界学者名流，对如何建设西康经济，定期进行研究和探讨，并撰写论文和专稿，出版《西康经济季刊》，为一些建设项目，制造舆论；其次将上述四个独立经营、自负盈亏的企业组织——美明、启康、新康、裕边合并组成康裕公司，以便集中力量，举办一个水电厂，作为发展经济的先行。

1939年组成康裕公司，选张为炯为董事长，李先春担任总经理，黄松乔（康定市商会主席），王玉岗（济康银行经理），胡子云（汇通银行经理）三人为协理。总公司下设：秘书室由陈容峰任主任秘书，李荫苍任文书主任，林效农任总务主任，李文清任出纳主任，业务处由李参化任经理；贸易部由黄松乔兼经理；会计室由蒲耀京、吴荫彬先后任主任；稽核室先后由羊治安、张子惠、王卓、李文灏、陈有滋任主任。总公司业务单位有：

- （1）建筑材料厂由陈化鲲任经理；
- （2）印刷厂由张少廷任经理；
- （3）二道桥服务社先后由胡咸宜、李参化等任经理；
- （4）大石包供应社由李参化兼经理；
- （5）康定水电厂由李万均任厂长；
- （6）电气材料由李万钧兼任经理；
- （7）雅安水电厂公司入股一亿元，由刘长轩、徐方先后担任经理；

(8) 约于1946年~1947年公司入股新修“康乐电影院”

(即今州文工团下侧、原电影院设在南门,被火烧掉)由王玉岗任经理,李万钧任副经理;

(9) 约在1946年公司曾向重庆一家电池厂投了资。

除雅安水电厂、电影院、重庆电池厂独自经营管理外,前面六个部门,均不再设置会计、出纳等管理人员,只搞产、供、销的业务,避免管理上重叠机构,从而大量减少人员的设置,即以康定水电厂来说,仅有厂长一人,工程师2~3人,城内供电电工6~8人,升航发电电工6~8人,水班工2人。

1948年黄松乔、陈蓉峰、胡子云、李参化、李万均等相继离去,而王玉岗升任警备司令,无暇顾及公司业务,由李万鹏(西康省银行副总经理)担任公司副总经理,主持日常业务,一直坚持到解放后移交给人民政府为止。

二、康裕公司经营业务的溯源与演变

(一) 康定电灯的溯源与大升航水力发电厂的建成

过去康定地处边陲,1941年以前公路不通,交通极闭塞,清末民初,仅有五六千人,除藏族、回族人民而外,多系内地川北、雅安、荣经、汉源及山西、陕西、江西、云南等省来此经商、做工、挖金的。鸦片战争后,随着帝国主义者的文化侵略,欧美等国的传教士,纷纷深入康藏高原,在康定就建有真源堂、修道院、安息会、福音堂、天主堂。法意天主教士办的修道院里设有医院,美国基督教士所设的安息会里也办有医院。民国十四五年(1925—1926年)安息会医生康定人民称之为安洋人者,除医术外,尚擅木工,自己制作了一部上冲式木质水车,外圆直径1.5米,宽0.6米,安装在安息会医院内部,(即今州人民医院下半部)利用子耳坡山溪水经水桥子(康定县招待所侧)至水车处,约有2米落差,以平皮带传动,带动了一台丹麦制造的120伏,3瓩的

直流发电机发电,还安有直流电流表、电压表、开关等简单的配电板,并修木板房一间加以掩护;只需提开闸板,合上开关,将门锁上,不再用人管理,专供医院里五十多盏电灯的照明用电。1926年第一次点亮电灯,炉城人民为之轰动,参观者络绎不绝,从古只知菜油、酥油、松光、火把,可以发亮,对此明珠,无不感到惊奇,安息会的电机,一直发到解放时,传教士撤离康定为止。

由于吴崇安一直跟随安息会安洋人供役,亲自看到修建电灯的过程,和以电照明的优点,乃于1931年出面承头募集资金,成立文明电灯公司,委托安洋人帮助在成都购买了一台乃飞厂

(Life Co)造的立轴轴流式水轮机及3相230伏、25千伏安同步交流发电机,聘请苏端同先生负责施工,张汉帜工程师任电厂管理,在白土坎河边建渠道厂房,工程行将完成,尚未发电即遇洪水,将其冲毁。复于1932年重新修建发电,主要供市民用电,实为炉城人民用电照明之始。1938年又在引水渠上分出支流约30米长新装一台奇昇厂(Genengl Electric Co)造立轴轴流式,导叶由手动调速机构调节的水轮机和2300伏,37.5千伏安,3相交流同步发电机,专供河西人民照明用电,25千伏安发电机组,则供河东用电。这两台机组的水轮机立轴上均装水平伞齿,25千伏安者为铸铁伞齿轮,37.5千伏安者为铸铁齿盘上嵌九江水制成的木齿72个而成,再和地轴上固定的竖置铸铁伞齿轮啮合,带动地轴上的皮带轮,通过平皮带进一步驱动发电机进行发电,以其经过两次间接传动,机械损失大,效率低,震动厉害,噪音严重,特别是硬木齿盘,稍有一齿损坏其余随即打坏,经常发生故障,鲜有正常供电的时候。传动部分没有安全护罩,值班工人詹善培、张克修先后被绞进齿轮惨死。至于输配电线路和室内照明用布线非常零乱,经常发生碰线短路,漏电走火故障。由于发电电压不足,用户多采用低压灯泡,增强光亮,以致电流负荷愈来愈大,恶性循环的结果,离厂稍远一点的用户,晚上用电时间,还须点上油灯,才能找着电灯位置,说明电压损失殆尽,已不能

烧红灯丝了。

1936年西康建省委员会从雅安移驻康定后,技师张材林在将羊桥头河边上,利用磨房尾水,修了一座上冲式木制水车,带动一台上海华成厂造3瓩、230伏直流发电机发电,供将军桥附近人户用电,亦归美明电灯公司经管。

后来这台发电机在升航电厂发电后,即由张材林折到泸定冷碛,仍以木制上冲式水车作原动力,供冷碛街上用电,实为泸定最早的一所农村电厂;白土坎电厂25千瓦安水轮发电机组,于1945年赠送给大邑县安仁镇文彩中学,成为该校的照明设备。

约在1942~1943年,趁大升航水电工程没有动工之前,分出部分工程技术人员,修建了雅安太平场铁索桥水电厂(这是雅安第一座电厂,当时称为康裕公司雅安水力发电厂)。装机容量为80瓩,水轮机和发电机分别为资源委员会所办的贵阳机器厂和昆明电工器材厂产品。由康裕公司与济康银行等投资,刘长轩、徐方先后担任经理。

约在1945年,向雅四行联合办事处贷款,又在铁索桥电厂原有水工设施基础上进行扩建,增加装机容量为150马力水轮机一台,配发电机容量为125瓩,机电设备均为资源委员会所办的工厂制造,耗时两年余方告完成。

1939年8月成立协康水力发电厂工程处。经西康省金矿局长林霁青的介绍,聘请留美留德的水电专家,山东大学教授王志超任总工程师兼工程处长,全权负责修建电厂的事宜。先后约聘了林得文(南开大学电机系毕业)、李肇端(山东大学水利系毕业)、王东江、孙凤英(夫妇二人都是山东大学土木系毕业)、田新亚(山东大学机械系毕业)、李万均(金陵大学电机系毕业)、熊锦源、曾世民、陈永棠(三人都是重庆大学电机系毕业)、唐心源(重庆大学机械系毕业)、安万涛(修康青公路的工程师)、徐伯豪(旧西康省政府电台的工程师)等十多名为工程师。通过考试招收了电厂学工,进行培训。1939年设流量站于康

定大风湾,始按日测量,作有系统的记载,根据一年半测记结果:1940年元月枯水流量为11秒立方米,洪水流量为175.4秒立方米。通过勘测,厂址选在康定大升航建立一座装机容量为500瓩,有效水头100米的高水头电厂,在旧中国工业极端落后的情况下,这样小型的机器设备,竟然不能制造,系1940年通过昆明美商卫利韩洋行,订购水轮机、调速机、发电机、控制屏及压力钢管等,其余变压器、输电电线杆、水泥钢筋等,则购自昆明、贵阳、重庆、成都、乐山等地。前后设立了成都、重庆、雅安、宜宾、贵阳、昆明、乐山、雅安、仰光、加尔各答等十多个办事处和采购站。并购置了8部道奇牌卡车,专门接运器材材料。其时抗战方酣,太平洋战争爆发,缅甸仰光沦陷日军手中,运款全长为160米的无缝钢管的货轮,在太平洋被日军潜艇击沉海底,机组主件改在印度加尔各答交货,幸得援华美军航空部队的帮助,派遣巨型运输飞机运到昆明,其中发电机座底板,体积过于庞大,飞机舱门不能纳入,遂顺电机轴线切而为之,始装进飞机。那时途经二郎山的雅安至康定公路,虽勉强修通,但冬季冰封,夏季雨毁,通车次数,屈指可数,即以大后方国防公路成渝、成昆等来说,路况亦极坏,关津渡口都是船渡。洪水时期,汽车从成都至康定,至少得经5次船渡,所以要将黔、渝、昆、蓉、乐等地器材,辗转集中到康定,工作是很艰苦的!1944年夏,所有器材材料,悉数安全运到康定升航,由于各地办事处、采购站都系选派得力工程技术人员担任,购回的器材,极少发生差错,运输途中,小至丝钉螺帽之微,殊少损失,实为参与其事的人员辛勤努力的结果。

大升航电厂工程于1943年冬季正式开工兴建,施工时以物资欠缺、物价不断上涨,经费筹措极感困难,不得已将此项工程分为两期进行。第一期先自菜园子构筑挡水坝一道,拦截高山流来的溪水进行发电,此项工程经13个月的努力,于1944年12月落成发电。至此设在各地的办事处、采购站,全部撤销,随着抗日战争

争的胜利，总工程师王志超、工程师林得文、王东江及安装技师上海师傅陈景奎、岷江电厂内线技工宣百流、厉其金等二十几名工程技术人员先后离去，庞大的开支，得以缩减。但在枯水季节，溪流甚小，不能保证机组正常供电。1946年向中央银行、中国银行、交通银行、中国农民银行贷得五亿元后，立即派人员从汉源县购进8万斤大米，同时将第二期工程所需的木材、水泥、石灰、钉子等购妥，1947年春以李万均工程处主任，聘徐方、陈建速、赵吉祥（三人均为西昌技专毕业）为工程师，1947年正式进行大风湾至菜园子段引水渠道工程的修筑，由于改变原计划在椒子岗急流处筑坝取水为从大风湾自流引水，很顺利地在地1947年底竣工通水，整个电厂的修建，至此方告结束。

1944年起，开始对全城用户的室内线路采用逐户停电整理的办法，一律由包灯制改为表灯制，特从印度购回一批英国造的3至20安各种用电容量的电表，并设电料行，统一供应用户购买，按照下杆线加卵形保险后，接铅包线始进入屋内电表，再从表板上的出线经保险盒、开关，布线到各用电设备，导线的安装、开关、吊线盒、灯头等接法，严格按照安装规则，妥妥后用摇表（即兆欧表）检查绝缘电阻，是否符合要求，经一年多的努力，全城杂乱无章，乱如珠网的低压配电用电线路，基本上改观。

在升航电厂发电后，全城用电高峰负荷仅160~180瓩，白天用电者更少，为了解决电力过剩，结合康定高寒、炭薪日趋缺乏，炊爨取暖颇成问题，于1946年10月利用国产电炉盘、电炉丝，制成火盆式电炉，和一台方形圆顶锅电灶，高90厘米，长、宽80厘米，用15厘米直径圆电炉盘1只及22.5×12.5厘米长方形电炉盘4只组成，圆者置锅底，方者对称置于锅之四周，并嵌入形似锅面之石灰土中，外部以木板制成漏斗形式盛之，全部支承于方形木架上，用22号电炉丝5根，分绕于盘上，按两组并联于开关，藉此调节热力，锅之边缘与灶头接触处，用石棉绳胎垫，

以绝热能传走。经试验结果：电压180伏时，最大电流为23安培，最小电流为12安培，15公斤水自摄氏零度加热，约30分钟，即行沸腾，耗电为2.2度，加白米1升（4斤），直至沥米蒸好，约再需30分钟，计先后用电4.5度，如电压升高至220伏，所需时间，当相应缩短。经邀请市民参观，表演烧水、煮饭、炒菜后，纷纷申请登记电炉、电灶，回民清真馆安上圆顶锅电灶，以之炖、炒、蒸牛肉，感到满意。因此电厂很快达到满载运行。

因避雷设备不完善，1945年夏，发电机定子高压绕组4只的绝缘，连续2次被雷击穿，切除后带病运行，直至1947年向美国西屋公司购回绕组30余只（约为定子高压绕组的半数），拆换修复。

现将工程概况简述于后：

甲、引水工程 从康定城郊椒子岗起至大升航，渠道全线多经过乱石堆积的坡面，从经济出发，利用附近地区材料，故采用水槽引水。于大风湾处，设取水口及控制闸门，从瓦斯河自流引水，经3661米木制水槽，比降1.5‰，引水流量2立方米/秒。引水水槽宽1.7米，高1米，用厚4厘米杉木枋，刨企口缝，镶成矩形槽，外框以横梁、立柱、拉木、撑木等，置于高10厘米的两道地龙墙上，施工时先将乱石坡面开挖成平台，地龙墙用浆砌片石于其上，纵稍有渗漏，容易排走，不致造成涌漏。渠槽转弯处，加浆砌块石护墙，用以加固水槽结构。

乙、前池 选在完整坚岩上，引水渠水流至前池，速度大减，水中所含泥沙，大部沉淀池底，减清砂石对水轮机磨损。前池长33.25米，宽5米，深2.5米，全系条石水泥浆砌，并用1:2:8水泥石灰沙浆勾缝，蓄水容积250立方米，当负荷变化时，产生调节作用。正向溢流处下设冲砂孔一眼，以备冲放泥沙；侧向设进水管，长4米、宽1.5米，高2米。压力管道的喇叭管，用1:2:4钢筋混凝土浇筑于上筑墩中，进水管口安有钢制拦污栅一道，靠近喇叭管口，设平板闸门一扇，利用手摇启闭机，以

司启闭。

丙、压力钢管 前池之水，经压力钢管导至厂房发电。每管均能承受压力200磅/平方吋（14.1公斤/平方厘米），系重庆中原机厂利用废旧船板焊制，惟以钢板过厚，较美制无缝钢管重2倍。全部钢管计43节，共长154.6米。喇叭管口内径为36吋（91.4厘米），第二节内径为22吋（55.9厘米），渐次缩小，至第43节内径为12吋（30.5厘米）。喇叭管、第23节管及第40节管分别固定于钢筋混凝土筑成的上、中、下镇墩中，其余均承托于钢筋混凝土支墩顶上的钢瓦垫上，第11节及第41节装置伸缩节各一，以备气温变化，钢管伸缩之用。各管法兰连接处，均填以石棉绳，使受法兰螺丝压紧，而无漏水之虞。钢管下至厂房，得水头105.4米。

丁、泄水渠和尾水渠 泄水渠位于溢流埝下游，长92米，以5%纵坡引至硬岩基石处，任其泄下。尾水渠长40米，系排泄水轮机运转后的尾水，出口处立水标尺测记水轮机用水量，尾水渠与泄水渠汇流后，同归瓦斯河中。

戊、机电工程

（1）水轮机 美国摩根斯密斯厂（S. Morgan Smith Co.）1940年造。水头330呎（100.6米），流量0.7立米/秒，出力719马力（529Kw），为混流式（法兰西斯式Francistype）水涡轮。转子由铜合金铸成，直径21吋4分（54.5厘米），转速每分钟1000转，封闭于蜗壳中，蜗壳为铸铁整体浇铸，进口直径12吋（30.5厘米），蜗壳进口端与压力钢管联接处装有闸阀，用人工转动手轮，以司启闭。蜗壳出口端联尾水弯管，下接圆锥形尾水管。蜗壳右侧为转轮所带动之主轴，横置推力轴承上。水轮机转轮外周均匀分布有12片导水叶片，由导叶操作环连于调速器的推拉杆，用以调节水量。蜗壳及推力轴承底座，均各用长2呎（61厘米）地脚螺丝4根固定在1:2:4钢筋混凝土基础中。

附水轮机名牌于次

Head（水头）330ft（呎），HP（马力）719，R.P.M（转/分）1000，Serial No.（序号）9053，Designed by S. Morgan Smith Co.（摩根斯密斯厂设计）。

（2）调速器为油压式，美国伍德瓦德厂（Wood Ward Co.）造，除能籍油压自动调节水轮机速度外，又可用手动操作，可以实现手动开、停机，自动关机到空载位置，调速器装有速度表及负荷限制器等，可以揭示水轮机转速及导叶开启度。调速器的齿轮油泵容量为2500呎磅（346公斤·米），油压为200磅/平方吋（14.1公斤/平方厘米）。

（3）发电机为美国西屋公司（Westing House Elec. Co.）1941年出品，系625千伏安、6900伏、3相、50周波交流发电机和励磁机在同一轴上。发电机轴端联轴器与水轮机主轴上飞轮直联，籍水轮机原动力，带动发电机，励磁机先发出直流电，供给交流机转子磁场，再籍磁场磁力线旋转时产生的变化，遂发出交流电。发电机及其两端轴承座底板，原为整件，在印度空运时，因体积过于宽大，被切为二，安装时，鉴于切断处恰在轴中心线下，考虑机组旋转迅速，容易产生震动导致底板移位，故另配铁板5枚，两轴承下各置铁板一枚，用40呎（101.6厘米）长地脚螺丝2根固定在混凝土中，其余铁板3枚，分别垫于发电机、励磁机之下，用2呎（61厘米）左右地脚螺丝，埋固于混凝土中。

现将发电机名牌数据附录于次。

（1）A.C. Generator（三相同期交流发电机），Westinghouse Co.（西屋公司造），625K.V.A.（625千伏安），R.P.M.1000（1000转/分钟），6900 Volts（6900伏），E.X.C.A.M.P.S.47.2（励磁电流47.2安），52.2 Amps.（52.2安培），Exc.Volts 125（励磁电压125伏），80% P.F.（功率因数80%），Inst R. Book 5442，3 Phase（三相），Series 149853（系列149853），

50 Cycles (50周波) 28787。

(Ⅱ) Excitor (励磁机), Westing house Co. (西屋公司造), 7 Kw (7瓩), Shunt wound 分流或并励绕组), 125 Volts (125伏), Type SK (型式SK), 56 Amps (56安), Frame 83 (构架83), 1000 R.P.M.^① (1000转/分), Style 149854 (型号149854), 100% Load (百分之百满负荷), Serial is 149854 (系列is 149854), 24 HRS (24小时连续), 1747 A, 50°C Rise (温升50°C)。

(4) 配电盘 亦西屋公司所制。计有三面, 一面为发电机控制板, 装有电流、电压、电力等表, 及电压调整器、变阻器、开关等。其余二面为高压开关板, 两者设备相同, 有电度表、继电器, 仅用电流互感器、仅用变压器等, 一以控制市区用电, 一以控制厂区用电, 高压母线出线孔前串联3只熔断器, 同时安装了3只高压避雷器, 由于避雷设备不够完善, 发电后第二年先后遭雷击二次, 致交流发电机高压线圈绝缘被击穿燃烧, 被迫切零损坏线圈, 较长时间带病运行。

己、线路工程

(I) 输电: 采用6900伏、3相、3线高压输电制。输电线路为19股20号裸铜绞线, 共长29,000米, 沿线立杉木A型电杆, 上架木横担, 籍高压瓷子支持输电铜线。至市区后, 由降压变压器至电压降至380/220伏, 市区变压器共9台, 合计650千伏安, 并于每台处装高压避雷器、跌落式熔断器各3只, 以资保护。

(II) 配电: 采用3相4线制, 干线用7股14号裸铜绞线, 支线路用8号、10、14号等单股裸铜线, 线路分布共长18,000米。

(III) 架空避雷地线: 电机被雷击后, 雷雨季节, 由值班人员观察气象, 当雷电活动频繁时, 采取停电拉闸, 避免雷害, 对发电工作, 造成很大不利。在当时条件下, 于1946年冬沿高压输电线路的A型电杆顶部, 用19股20号裸铜绞线敷设了一条避雷地线, 全长近10,000公尺, 在每台降压变压器处, 重复接地, 起到

了一定保护效果。

纵观康定大升航水电厂的设备和工程概况, 四十年代在旧中国的已建成水电厂中, 除被日本占领的东北三省而外, 无论从装机容量之大, 利用水头之高, 以及设备之先进, 都是名列前茅, 而建厂期中困难之大, 却又超过内地同级水电厂, 能够建成该厂, 实非易事! 在购置机器中, 经费来源, 主要依靠四个企业合并后的业务收入来筹集资金。如旧省府原设在中山台内 (过去为民政衙门, 即今州人民政府内), 1940年冬, 被火烧毁, 李先春肩负省财政责任, 向重庆国民政府竭力请求, 于1943年拨款五百万元, 交由康裕公司负责修省府的民、财、教、建四个厅, 及秘书处, 建成交付使用后, 各厅处均感到满意。但以物价不断上涨, 电厂订货和运费等, 都无法预算, 要筹的资金, 越来越大, 而大升航电厂的机器, 大部已经购妥, 从各地运集康定, 必须付出大笔运费, 修建工程开始后, 应付的工资, 更是刻不容缓。在此期间, 黄松乔、陈蓉峰、李参化等对筹办资金, 四方奔走, 各界人士襄赞尤多, 但筹划经费的压力, 和建厂中遇到的各种困难, 使李先春呕心沥血, 额上的皱纹和两鬓的白发, 不断增添。每当筹措无方时, 他曾打算倾家荡产, 卖掉自己的房地财产, 来凑集资金, 祇以杯水车薪, 于事无济, 始作罢论。只好利用他在财政金融界的威信, 向康定一些较大的公司: 如康藏茶业公司、康藏贸易公司、西康公司等, 和一些银行: 如中央银行、西康省银行、济康银行、汇通银行、和成银行等贷款; 同时开展贸易业务:

(1) 与复兴公司 (国民政府的出口公司) 签订合同, 购销康区的羊毛, 由公司洗净后运出交货; (2) 运销康区特产麝香、药材等到上海出口; (3) 由上海购回日用百货, 供应边区人民的需要, 只是这批百货, 就赚了四千多万元。因为伪钞不断贬值, 如1946年向中、中、交、农四行贷款五亿元时, 约可买大米十万斤, 到还款时, 只买得到几千斤大米了。所以能顺利地按期偿还贷款, 虽然经费支绌时, 靠贷款来救燃眉之急, 历尽许多困难, 可是偿

清贷款后，康裕公司则赚到很大便宜，可以说大升航水电厂相当大一部分资产，是靠这种方式积累起来的。在电厂完成后，由于当时社会制度的局限，对于积累的资产，李先春为了表达自己的清白，采纳李参化的建议，通通地把它列出，折作股金，制成股票，用刘文辉的名义，分赠给帮助过修电厂的人士。如送给张为炯的股票为二百万元。省政府各厅处的有关人士、及省参议员们都赠送了股票，有些还邀请担任公司的董事，对公司内部的职工也都送了股票，作为公司的股东。

（二）康定铅印之始与启康印刷厂的扩建

清末赵尔丰经边到康后，退回成都，留其幕僚傅华丰，欲以巴塘为首府，成立西康省，对藏族人民作长期统治。为适应当时政治上的需要，运了一些印刷机器和汉藏文字的字模（当时只有较大的字模）到巴塘，嗣以满清迅速被推翻，赵尔丰被四川人民枭首示众，所以这批印刷设备一直搁置巴塘。1928年刘文辉派龙守贤为西康政务委员会主席，才将这部分印刷设备运来康定。1936年西康建省委员会从雅安迁至康定集资从成都添购脚踏石印机、手摇石印机、手摇四开铅印平台机、切书机、装订机及藏、汉、英文各号字模、字钉、化铅炉等，设厂于金刚寺内，1943年迁至白土坎（即现甘孜报社处），名为启康印刷厂，以张绍庭为经理、杜金鉴为主任，并入康裕公司又扩大规模，聘请铸字、排版、印制、书写、刊刻等技工多人，并招收年轻学徒进行训练，承担了康定各族各界的印制藏经、书刊、表册、报章杂志的任务。

（三）康定二道桥温泉浴池的演变与建筑业的开办

炉城至丹巴、乾宁的官马大道上雅拉河畔，离城四公里处有热泉多眼，部分位于雅拉河中，以其温度多在40℃左右，含硫化二氢，气味熏人，银饰浸入，渐变乌黑，惟能治疗风湿、皮肤病等，是炉城人民沐浴健身场所。该泉原为露天掘成澡堂，供人濯洗沐浴。清乾隆年间，打箭炉同知符兆熊始在池上盖屋成简陋的浴室，男女分期沐浴，并修“望江楼”于池旁观音阁处，以备泡水

者休息。民国初年，康定至神庙承头募集，黄福兴等捐款，由何长盛监修桥头为亭阁式雕梁画栋的通天桥，左岸照壁上，兰底黄书，题有“小天竺”三字有通向天竺之意。1935年国民党第十六军军长李抱冰进驻康定，令其军工修筑了城北至二道桥段公路。但仍仅有一个浴池有房屋遮盖，因此，严格规定泡澡时间：星期三为军队，星期一为妇女，其余时间为普通人等，以致妇女泡澡时，还须放哨值卫，如在露天沐浴还要使用大马伞遮护。

1936年李嵩高筹办了新康合作社，1938年西康建省后，李嵩高离去，该社由西康省政府合作事业管理处接管，那时合管处处长李先春派李参化到该社担任经理。经营二道桥浴池，扩建房屋增设浴室五间，还设置了茶堂、饭馆，并购进十几部人力车，专为去二道桥泡澡的人服务。并入康裕公司后，李参化继续任经理，扩建了浴室达十间，编为“复”、“兴”、“中”、“华”、“民”、“族”、“健”、“身”、“运”、“动”等字样，将各字浴池的温度，所含矿质、治何种病，悬牌列出，供泡澡人购票时选择，外设大澡堂一所，免费供浴。1944年向西康省银行贷款15万元，由阎锡祖工程师（解放后是建工部总工程师）设计新建一座旅馆、餐厅，于右任先生亲笔题书的“与点楼”，援引论语：暮春三月，冠者六七八，童子二三人，舞雩兮，浴而归……子曰：吾与点也。寓意是孔子及其高徒曾点等春游沐浴，既歌且舞的情景。继又改建已朽的“通天桥”为木桁架结构的“文辉桥”。“望江楼”、“通天桥”的古迹，已不复存在了。傍“与点楼”坡上建有凉亭，有小径可通，缀以花草树木，显得环境幽雅。在浴室前，有温泉涌流暖池一处，池边绿草，四季如茵，修一水榭亭台，名“先春亭”。却公山麓，浴室入口处，曾有刘恒如先生作的二道桥温泉碑铭，大理石篆刻，惜石碣已失，无从查考了。

康裕公司成立后，建筑业务亦有所发展，先后修建了筹边别墅，省府民政厅、财政厅、教育厅、建设厅、秘书处、省民众教育馆等新厦，改建了行将腐朽的将军桥、上桥、中桥、下桥等为

木桁架结构桥，举凡新市街和公私房屋的营造修缮，建筑材料，皆出自此公司供应。

三、结尾

1949年12月9日刘文辉通电起义的消息传到康定，李先春署名积极响应，拥护起义，督饬所属财政厅、西康省银行，康裕公司暨康定水电厂等部门，保全机器设备、器材物资，财产帐目。在1950年康定军管会成立后，都完整地移交给人民政府。

一九八四年十二月四日

附注：

1. 方文有关大升航水电工程部系根据1947年3月31日出版的《西康经济季刊》第14期：李万均写的“康定水力发电厂概述”。

2. 本文有关雅安水电厂的扩建，也是根据同一刊物所载：西康经济研究社雅安分社所作的“社务报告书”中摘来。

3. 本文承蒙成都省水利勘测设计院副总工程师唐心源及成都市金牛区政协委员李参化提出宝贵的补充和修正，表示感谢。

边茶史话

高 济 昌

一九五〇年中国人民解放军进藏部队，初到高原，一些人头晕、疲倦、不思饮食，军医诊疗无济于事。后来在康定听到一位中医师说：“吃大茶嘛！”果然，大茶一吃，诸症消除。大茶就是边茶。从这个例子可以看出边茶对于内地来到高原生活的人是如何的重要，对于长期世代生活在高原的各族人民更是不可缺少。

这是因为康藏高原海拔高，气压低，气候干燥，人民多食牛羊肉和奶酪，边茶既可以解油腻、助消化，也可以补充人体因大量蒸发所失去的水份。明代四川巡抚严清说“腹地有茶，汉人或可无茶，边地无茶，番人或不可无茶，先此议茶法者曰：‘茶乃番人之命’”。都御史杨一清更说：“远夷”“如不得茶，则病且死！”^①藏族居住区也有“宁可三日无粮，不可一日无茶”的说法。

正是由于这样，历代政府都在边茶上大打主意。明史卷八十食货志四，在提到茶时，一开始就说：“番人嗜乳酪，不得茶则困以病，故唐、宋以来行以茶易马法，用制羌戎……。”这种“以茶治边”的论调和措施，经明到清到民国都是存在的，方式各自不同，但其于人民的剥削和压迫则一。现在政府从改善人民生活着想，充分供应各少数民族人民生活必需的边茶，边茶成了民族团结的纽带。所以我们在这里诉说一下边茶的历史，对于激发热爱祖国，热爱社会主义，对于促进民族团结和边疆建设是有好处的。

一、边茶缘由

生活在康定的人，一谈到边茶就会想到这是由邛崃、名山、雅安、荣经、天全五县生产制作后，运经康定销到甘孜藏族自治州全州各县和西藏自治区供群众饮用的茶叶。实际上这只是“南路边茶”，每包按品种不同，包装成十六斤至二十斤不等。

此外，还有“西路边茶”云南紧茶，湖南湖北的黑茶和老青茶。

西路边茶是指在灌县、彭县、什邡、平武、北川、大邑、安县、绵竹、茂县、汶川各县所产的边茶，以松潘为行销中心②，运销到今阿坝藏族自治州和甘南藏族自治州。这种茶每包重一百二十斤，包装成方形，所以又叫“方桌茶”。

云南的紧茶则以佛海、景谷、缅宁为三大中心，品类有方茶、圆茶、紧茶和散茶四种③，产量大，质量也很好。紧茶也运销今西藏自治区和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和南路边茶一样，有的还销到不丹，尼泊尔等国家。

湖南湖北的黑茶和老青茶，以湖南安化生产的质好量又多。这种茶在历史上先是经汉水，后来是经京广，陇海两路进入陕西，销到宁夏、甘肃、青海、新疆、蒙古等省的；还曾远销到苏联的中亚细亚和西伯利亚。

上述产地和销地都是清王朝定下来的，由于这些茶都专销到边疆各少数民族区域，所以叫做“边茶”。这里我们主要谈“南路边茶”。

二、茶马互市

“茶马互市”起源于唐代的“以马易茶。”唐代国势强盛，疆域辽阔，西北、西南各少数民族在向大皇帝进贡时，大皇帝或

以茶行赏，或“以马易茶”，这就是后来茶马互市的开始。

少数民族说是“以马易茶”，历代政府说是“以茶易马。”“唐宋以来，行以茶易马法，用制羌戎。”怎样制呢？明正德年间，都御史杨一清说：“戎人得茶，不能为害，中国得马，足为我利。至我朝纳马，谓之差发，如田之有赋，身之有庸也。彼既纳马，我酬以茶，我体既尊，彼欲亦遂。前代曰互市，曰交易，大不相侔，且金城以西绵亘数千里，以马为科差，以茶为酬价，使之远夷皆臣民，不敢背叛。如不得茶，则病且死，以是羁縻，实贤于数万甲兵矣，此制西番以控北夷之上策也。”④马是当时战争的主要工具，战斗和运输都需要马。唐、宋、明三代政府用边茶换取少数民族的马匹，无异乎解除各少数民族的武装，因此各少数民族就只能作大皇帝的臣民，而不敢背叛，如果背叛，大皇帝就用不给茶的办法相威胁。宋史平西夏就是用不给茶的办法，逼元昊降顺。⑤所以杨一清认为这个办法比用数万武装部队对付少数民族还要好。在杨一清看来，宋代把以茶易马称着“互市”或“交易”都是不对的。各少数民族的马匹应该象内地人民有田就该纳赋，有人就该服劳役一样，向大皇帝缴纳“差发”或“科差”。至于茶，应该说是大皇帝的赏赐，即使换马，也应该得到许可。这样才能显得出大皇帝的尊荣。

其实，大宋皇帝何赏不想这种尊荣；但宋势孱弱，版图比较狭小，特别是南渡以后，处偏安之局，国防上需要马匹，而产马的地方多非自己所属。急需的马就不能不在西北，特别是西南的少数民族相换。以茶易马就逐渐形成制度了。

为了换马，于是对茶实行了统购统销的官卖制度，甚至由政府自种自焙，然后在内地卖给人民，在边疆用以换马。这就是所谓的“榷茶制度”。就是说人民喝茶要纳税。“税课作茶输租，余则官悉市之”。“凡民茶折税外，匿不送官或私贩鬻者，没入之，计其值论罪。”⑥“农民种的茶叶，每年除折实纳税外，余下的茶一律要卖给政府，如果有隐瞒或私自贩卖的，不但茶要

没收，还要按所藏（卖）茶叶的价值判罪。这条规定有个例外：

“天下茶皆禁，惟川陕广南听民自买卖，禁其出境。”^⑦大概这些地方接近少数民族时还“不清”吧？至于禁其出境呢？第一是“茶之利甚博，商贾转致于西北，利尝数倍”。^⑧榷茶本来就是增加税源，增加政府收入的好生意，当然只有大皇帝能做，对于极贫弱的宋政府是要考虑的。第二是如果令其出境，就会影响换马。这点例外行之不久，至熙宁七年，就“遣三司干当公事李杞入蜀经画买茶，于秦（天水）凤（凤县）熙（临洮）河（临夏）博马”。同时又采用蒲宗闵的建议：“川陕民茶，尽卖入官，更严禁私行交易，全蜀茶尽榷。”^⑨

宋代实行榷茶制度，首先受害的是汉族种茶的“园户”和商人。元祐元年侍御史刘摯奏道：“蜀茶之出不过数十州，人赖以生，茶司尽榷而市之，园户有茶一本而官市之，额至数十斤。官所给钱，靡耗于公者，名色不一，给借保任，输入视验，皆牙侩主之，故费于牙侩者又不知几何。是官于园户，名为平市，而实夺之，园户有逃而免者，有投死以免者，而其害又及邻伍，欲伐茶，则有禁，欲增植，则加市，故其俗论谓地非生茶也，实生祸也。”^⑩农民种茶被逼到外逃或寻死，甚至逃了、死了还要牵累邻居，砍也不敢砍，种也不敢种，大家把种茶说成种祸。

对农民如此，对商人呢？经手官吏层层加利盘剥。熙宁十年知彭州吕陶奏道：“今茶场司务重立法，尽榷民茶，随买随卖，取息十之三，或今日买十千之茶，明日即以十三千卖之，变转不休，止占三分。”^⑪不特商人受损，饮茶者也够苦了。

因此，建炎元年，成都转运判官赵开言：“榷茶买马五害，请用嘉佑故事，尽罢榷茶而全漕司买马。或未能然，亦当减额以苏园户，轻价以惠行商，如此，则私贩衰而盗贼息。”^⑫那“五害”不举了，就上面所述各点，已可看出榷茶制度业已逼民至死，逼民为盗的程度，不能不变了，“遂以开同主川秦茶马。”“二年开至成都，大更茶法”：“以引给茶商，即园户市茶，百

斤为一大引，除其十勿算，置合同场以讥其出入，重私商之禁，为茶市以通交易，每百斤引钱春七十、夏五十，市利头子钱不预焉。所过征一钱，所止一钱五分。”^⑬这就是后来茶引制度的开始。

更改了的茶法虽然比原来的榷茶要好些，但税率还是重，“除其十勿算”已经抽税十分之一了，另外还要“引钱”，茶农还要付市场的“市利头子钱”，茶价高了当然影响易马。但需马又急，不得不见马就买，这是一；北方既然多事，在强敌压境下，政策更不能牵动西南，这是二。有此二点，所以在南宋末年，在易马问题上，对西南各少数民族便实行了迁就和退让政策。“南渡以后，文（文县）黎（汉源）珍（赤水？）叙（宜宾）南坪（綦江）长宁（长宁）阶（武都）和（和县）凡八场（易马场），其间卢甘番马岁一至焉，洮州番马或一月或两月一至焉，叠州番马或半年或三月一至焉，皆良马也。其它诸番马多孱，大率皆以互市为利，宋朝示怀远之恩，亦以是羁縻之。绍兴二十四年复黎州（汉源）及雅州（雅安）、碉门（天全）、灵西岩（？）易马场，乾道初川秦八场马额九千余匹淳熙以来为额万二千九百九十四匹，至后所市，未尝及焉。”^⑭看，弩马也要，而且只顾数多，说是“怀远”“羁縻”。实际是国势衰微，图西南安定而已。

明继宋制，仍以茶易马。不同的是更加严苛了。如果说宋代的榷茶制度是执法者从中剥削人为地造成了“五害”，那么明代是严苛的法律将中间剥削直接收归了皇家。下面谈几点情况：

（一）法律严厉商人在产地买茶，“纳钱请引，引茶百斤，输钱二百，不及引日畸零，别置由帖给之，”^⑮所谓“引”“由帖”都是税票，茶引和盐引一样都证明了纳税的金额和货物的数量。一张茶税票称为一引额定茶量为一百斤，不满一百斤的茶税票叫由帖。运销茶叶需要引或由帖，如果没有引或由帖，或者有了而没有和茶在一起，就是犯法，带茶的人就要被捕。为此专

门设有检查的机构负责稽查和过称，如果茶引数量不符的，或者没有引的茶，都按私茶处理；如果经过关卡，关卡人员不检查的，关卡人员和带茶的人一并处死。皇帝的女婿“驸马都尉欧阳伦以私茶坐死”，^⑩老百姓犯了就不要说了。

（二）税额一再提高。先是“引茶百斤，输钱二百”。“后又定引茶一道，输钱千，照茶百斤；茶由一道，输钱六百，照茶六十斤。既又令纳钞，每引由一道，纳钞一贯”；这是对商人征收的“税”。对种茶农民增收的叫做“课”，先是“三十取一”，后来是“每十株官取其一”。^⑪

对少数民族换马，则一再压低马价。开始是茶马司定价：“马一匹，茶千八百斤，”后改为“上驷一匹给茶百二十斤，中七十斤，驹五十斤，”再后使用金牌规定部落的换马数，实际每匹马只换茶三十六斤多。^⑫

（三）规定了用茶“以易番马”的地方和数量，“设茶马司于秦（西宁）、洮（临洮）、河（临夏）、雅（雅安）诸州。自碉门（天全）黎（汉源）、雅（雅安）、抵甘朵（甘孜州）、乌斯藏（西藏）行茶之地五千余里。山后归往诸州，西方诸部落，无不以马受者。”又用金牌发给各部落，规定其换马的数量。“又制金牌信符，命曹国公李景隆赍入番，与诸番要约，篆文上曰‘皇帝圣旨’，左曰‘合当差发’，右曰‘不信者斩’，凡四十一面，洮州火把藏，恩囊日等族，牌四面，纳马三千五十四，河州必里卫西番二十九族，牌二十一面，纳马七千七百五十四，西宁曲先、阿端、罕东、安定四卫，巴哇、申中、申藏等族，牌十六面，纳马三千五十四。下号金牌降诸番，上号藏内府以为契，三岁一遣官合符。其道有二：一出河州，一出碉门。运茶五千余万斤，获马万三千八百匹。”^⑬

（四）经常巡查，“太祖之禁私茶也，自三月至九月，月遣行人四员，巡视河州（临夏）、临洮、碉门（天全）、黎（汉源）、雅（雅安）。半年以内遣二十四员，往来旁午。宣德十

年，乃定三月一日遣。”^⑭

（五）将全国所产之茶，分为官茶、商茶和贡茶三种。官茶即由政府收购存贮用以换马之茶，就是边茶；商茶即由商人请引折税后在内地销售之茶。贡茶则是上贡给皇帝，供应皇宫所用之茶，三种茶都规定了产地、销地、和数量。^⑮

但是，所有这些都是大明盛世，即在前面所说那个都御史杨一清以前的事。等到大明式微，情形就不一样了。贮存换马的茶有的竟霉烂了；茶一多造成了马贵茶贱；边茶贮存在规定贮存的边远地方，而内地的人没有茶吃；发了金牌，少数民族不用不理了，这些情况都发生过。《明史食货志》对茶政有这样一段结语：“明初严禁私贩，久而奸弊日升。泊乎末造，商人正引之外多给赏由票，使得私行，番人上驷尽入奸商，茶司所市者，乃其中下也。番人得茶，叛服自由；而将吏又以私马换番马，冒支上茶，茶法、马政，边防于是俱坏矣”。“碉门茶马司至用茶八万余斤，仅易马七十四，又多瘦损”。这和宋末有什么不同呢？杨一清是不会想到这点的。

三、部引官商

清代是东北的少数民族入主中原做大皇帝的，对少数民族情况有所了解。顺康雍乾各代都国力强盛，版图辽阔，不缺北方良马，因此需要马匹，没有宋明那样急。但是习于宋明两代对西南的控制，一开始还是搞以茶易马。不过它要的是好马，所以只在陕甘两省进行。用以易马的茶则是折实税，即商人用茶代纳税额。每年额定易马数为万一千零八十四，上马给茶十二篋（每篋十斤），中马九篋，下马七篋。本来这一比率是比明代盛世高的，但是这里发生了几种情况：一是明末走私之风未除，“时商人多越境私贩，番族利其值钱，趋之若鹜，兼番僻处僻壤往来，夹带私茶，更不能诘。”因此，番族人民觉得以马换茶，茶贵马

贱，不愿与马换茶^②。二是存茶等换马而又“无马可中”以致“年久淤滞”，为了免于损失，只好“悉令变卖”，或者以充军饷，“在五镇俸饷内，银七茶三，搭成发放。”“每新茶一篋折银四钱，陈茶折六钱，充饷。”甚至“用茶六万五千五百余封易杂粮三万八千一百余石。”^③这些情况说明有清一代不仅有良马不需要以茶易马，而且由于在少数民族地区驻了重兵既需要支付大量的军饷俸给，又需要军粮马乾，而放着茶无用，因此不得不“停止易马”。为了筹军饷，购军粮，遂将宋明两代的以茶易马改为“设引招商”的“引岸制度”。边茶全由商人经营，政府只收取税课。

茶由商营不等于让商人自由贸易。所谓“部引官商”当然不是一般商人。“引岸”制度实际是宋赵开的“设引招商”和明代“令商人给钱请引”，取其所长，弃其所短地进一步措施，是积两代的经验而提出来的。其要点是：

（一）由“户部宝泉局铸刷引由，各省预书请领，年办年销”，“行过残引皆缴部”。“凡伪造茶引或作假茶兴贩及与外人买卖者，皆按律科罪”。部引按预书请领数量发到省盐茶道，然后由各县商人认定数量，缴纳税金，非到“人亡产绝不能另招承充”，但认引商人之间可以互相转让和顶借。在实行中，税款也可以拖欠^④。

（二）将明代的边引、腹引改为边引、腹引和土引三种，使产地，产量和销地（销地即“岸”）对口，不得任意乱购乱销。边引茶分西路与南路都定了产地，产量和销地，前面谈过，不再重述。土引，专指南路边茶中的天全边茶，规定只准在当时天全土司所辖地内销售^⑤。在征金川后，天全改土归流，所产茶经民国到解放一般销康定、道孚、丹巴、九龙及雅江等地，这是习惯并非明文规定了。天全就是宋明两代的驷门，据说边茶销地（易马处）在城内蛮市老，后移大渡河边的岚州，后又移今泸定县属烹坝，最后才到康定，说是从马鞍山顺山脊到岚州还可发现

当时背茶者留下的拐子窝窝。

（三）顺治年间，四川边茶边引定为80,492张，土引16,490张，共96,902张，合茶96,902担。雍正八年只南路边茶就定边引73,304张，土引31,120张，共104,424张，合茶104,424担。连同西路边茶边引18,800张，总计123,224张，合茶123,224担。光绪年间南路边茶（不再分土引）减为80,000张，西路边茶却增为30,000张，共110,000张，合茶110,000担。可见清代由于改变制度使边茶经营达到了历史上最繁盛的时代。^⑥

（四）顺治时认为以往对农民按茶株抽税不公平，改为每斤征课银四丝九忽，雍正时改为一厘二毫五丝。顺治时对茶商所征税银每斤四厘三毫四丝，嘉庆后改为每引征四钱七分二厘，清末改为每引征税银一两，另征引用纸张费每张（即一引）三厘三毫^⑦。以嘉庆时的引数和征收计算，则当时清政府对农民征收茶课银154.03两，对茶商征收茶税银58,361.728两，另征低张费406.639两。合计嘉庆时清政府每年在四川边茶上所收课税共58,922.397两两银。当然光绪以后按每引征税银一两计，数字更要大，仅川西十余县的边茶一项就征收如许数字的银两，不能不说是财政上的大收入，也是对人民的大剥削。商人卖了茶，换得藏族人民等价的（当时实际是不等价的）土特产品如黄金、麝香、皮毛、药材运回内地去卖，无疑清政府又要征税，这笔数字有多少，因非本文范围未作查考，但可以肯定数字当不在茶税之下，这是显而易见的。

直到清朝末年，还在增加税银，而这时的川滇边务大臣赵尔丰还积极谋划振兴茶务与英商竞争，这不能不说是清政府边茶政策的成功。至于说由于英印茶的侵入使边茶的销售受到影响，应该咎在鸦片战争后清政府腐败媚外的结果，于边茶政策本身无关。

一九四〇年中英鸦片战争后，大清帝国的纸老虎原形毕露，继之而来的是中法战争，中日战争，日俄战争，清政府处处丧权

辱国，列强因谋瓜分中国，在中国划分势力范围。久已侵占印度的英帝国主义于1893年（光绪十九年）强迫清政府签订了《1890年藏印条约》的附属章程，攫取了在西藏亚东开埠免税通商的权利。^①英印商品大批涌入西藏，英人在将印茶运入西藏的同时，还派人到雅安调查边茶的制法，进行仿造，但由于藏人习惯饮雅茶，印茶虽然价格低、包装美，但性热不如雅茶之性凉适于藏人饮用，且印茶味苦，藏人多不喜欢，所以即使买了印茶，也还掺用雅茶。尽管这样，印茶对边茶的抵销，英帝国主义对于大清帝国的经济侵略，仅就边茶一说，也是很严重的，那时南路边茶每年减销了三万引，即三百万斤，同期由西藏运销内地的土特产品，仅黄金一项就减少了一半，约四千盎司。（据1959年B、J1列昂节夫《外国在西藏的扩张》一书）。这是清政府在边茶贸易上遇到的问题之一。

由于茶商是官商，引引后只要不入亡产绝就可以世代经营，因此有些商人或其子弟就易流于养尊处优，骄奢淫侈，以致拖欠税款。例如乾隆年间五属茶商就拖欠税银四百万两，其中以天全茶商邱瀛州最多，清政府派员勘问，公推邱瀛州为代表，一说邱贿赂该钦差全金鸦片烟盘一个，一说邱对该钦差说：“天雨不润一家，皇恩岂能泽及于少数人！”“遂以入亡产绝报免”。清史稿记有“乾隆八年，免四川天全所欠之羡余截角，成都、彭、灌等县之未完银两”。这又是清政府边茶贸易遇到的问题之一。

虽然如此，就宋、明、清三代而论，无疑清代对边茶的措施还是比较成功的。如说宋明以茶易马换得了西南的稳定局面，清代尽管在西南出了几次乱子，但它把边茶贸易推到了高峰，用边茶增加了自己的财政收入，特别难得的是没有象宋明两代立法的那样繁而苛。

四、边茶的衰落

民国肇始，军阀混战，既无统一之中央政府，遑论边疆经济事业，直到本世纪四十年代论边事者仍以“中央鞭长莫及”为遁词。在这样的情况下，一切都由盘据地方之军阀自行其是，边茶也是一样。

这时仍沿用茶引办法，每年由炉关（即康定东关，当时又叫茶关，设有税局长，办理进出口货物的稽查和抽税，主要是边茶）制定引票十万四千四百张，引一张配茶五包（不论品种和轻重），征税银一两。每百引再征课银五两。课银原来是征收茶农的，在产地进行；这时军阀除在产地向农民征收外，又在销地对商人再次征收。刘文辉据有川边后，又由在康定的川边财政统筹处（后改为西康财政统筹处）发行十一万张，其它不变。

茶商引引，按引纳税，然后将引票送回产地茶厂，按引发茶。茶过泸定桥时，桥头有检查卡，检查茶引是否相符，无引者不得过桥，引茶不符者即为违法，要受罚，引茶相符者由检查卡将引截角，这是明的规定。实际上检查卡是有收费的，除泸定县规定每背茶收多少外，卡员对背茶者常有索取。茶到康定过炉关时又要检查，还需茶商派人到关上销引，等检查人员喊过才能过，叫做“引茶”。

四川军阀混战所需粮饷，均寅征卯粮，一年数征。刘文辉于1928年占据川南川边，即借粮借税，一九三三年已借征田赋至一九四〇年，借税亦然，那时各种捐税名目繁多，在五属及康定莫不是以茶商为先为重。在刘之前，川边镇守使陈遐龄在康定为了强征强借茶税，甚至采用“押缴”的办法，任意关押毒打茶商，如雅安孚和茶号老闆余东皋被打断两腿，夏永昌茶号管事郝柱臣、王庆槐茶号经理王仁杰竟被毒刑压死。这样遂使南路边茶受到严重影响。据一九三九年金陵大学森林系调查，当时五

属年产边茶不过五万担而已^②。这就比清代最盛时减少了55%，比清代最低数的八万担还少37.5%。

边茶衰落了，关于衰落的情况，下面还要谈。

五、三个公司

从清末到解放，南路边茶曾筹组过三个经营公司，分述如下：

奏办边茶股份有限公司 为了对付印茶的大量侵入，川滇边务大臣赵尔丰曾努力谋组公司，积极在边茶贸易上对英人进行“商战”，他在给清政府的电文中说：

“炉茶行銷藏卫，为川省一大利源，而印茶以种植之繁，焙制之精运输之便，又立一大公司，论商智，团商力，以困我茶商，夺我权利，若不设法抵制，势且寝取东下，不独失我西藏之大商场，亦将摇我炉边之根据地”。“今者江孜开埠，印藏交通，印茶之输入为通商条约所必许，川中茶商苟欲保其权利，咸宜急起直追，为改良之方，为补牢之计”。^③

根据敌情，提出对策，既然打不赢别人，和别人订了条约，不要别人运茶进来是不行的，唯一可行的办法是组织起来和英人“竞争”。所以他主张“在省创立公司，以树先声”。于是他和四川劝业道周孝怀联名奏请将南路边茶全部收归官办，但受到五属茶商的激烈反对，改为“官督商办”，命名“奏办边茶股份有限公司”。公司股本原订为五十万两，由茶商自愿认股。于光绪三十二年十二月批准，在雅安成立边茶公司筹备处，以雅安知府武瀛为总办，开始集股，几个月后，雅安知县全禀元报说只招股九十五个，本银七万六千两。武瀛也报说每月认股不过三、四万两，计至七月底止，茶商本帮（即专营边茶的）共收股银二十一万六千五百两。这样招股实有困难。因此，他主张劝令原来不经营边茶的外帮商人也认股，经久还是集不起来。武又禀报对各小

商“晓以利害，各令入股公司”，实行强迫入股。各种办法想尽，经过一年多时间，还是只筹集了股银三十万五千两。一九一〇年四月公司正式在雅安成立，由武瀛作提调，由雅安茶商刘义兴，余云舫、夏鼎三、张子武等分任总理，协理等职务。制造厂都设在五属各县的原大茶商的茶厂中。一般小茶商由于股本少，在公司说不起话，又因入股带来了原有生产设备闲置不用而造成的损失，遂对公司不满。由于种种原因，生产并未因组织起来有所提高，原订茶引十万张，当年只用了八万。第二年，辛亥革命爆发了，赵尔丰为保路同志会杀死于成都巡抚衙门，公司也就解体了。至于康定公司留存资产全由永昌茶号老板夏鼎三吞没，尹昌衡到康定后曾追查永昌茶号，夏家行贿赂皮百张，白银三千两了事。

这第一个边茶公司还是做了些事的：第一，组织起来和帝国主义竞争，挽回国家的利权，方向是对的。第二，为了弄清英帝国主义在西藏倾销印茶，公司曾派雅安候选巡检郭子材前往调查印茶输藏和川茶在藏销售情况，这就给以后经营边茶提供了资料。

川藏公司 袁世凯任大总统后，北京农商部又筹划统制边茶，拟在雅安重振公司，由政府经营。当时雅安余孚和茶号余云舫之子余孟荪正在北京工作，听到消息后，为了家庭经营茶业的利益不受侵占，即去找他的老师农商部部长周志齐，请求由余孟荪回雅安筹组“川藏公司”。在周的支持下，余很快就请准备案。但雅安五属的茶商知道后，基于以往组织公司的经验，竟群起反对，因此，这第二个公司就流产了。

康藏茶业股份有限公司 一九三八年国民政府在日本的逼迫下，迁都重庆。一九三九年财政部中国茶叶公司派蒋康成（e.e. 份子寿勉成之弟）到西藏调查边茶情况，拟筹组该公司的分支机构，想从地方收回边茶的税收。统治川边数十年刚被任命为西康省主席的刘文辉觉得于己不利，遂暗中指使他的警卫大队长王玉

岗（后任康定城防司令，刘辉文的警卫团长，长期兼茶关税局长）出面纠集原有五属大茶商等组“康藏茶业股份有限公司”进行抵制，并以边防开支浩大，拒不向财政部上缴茶税。公司很快于一九四〇年成立，股本为当时法币一百万元，每一百元为一股。据说几个成头的如玉玉岗、李先春、余根仙、夏仲远等都只写了所认股数而没有实交股金，几家陕帮认缴，超过了一半，都兑了现，这就为公司成立打下了基础。除陕西帮外，五属茶商中，以天全为例，只有高泰昌入股一万元，零茶商高国昌认缴五千元实交了股金；其余各家如黄祖元、高泰茂、李庆发等都存观望，由公司各借给股本一千元入股。这样一百万元的股本不仅没有筹集，且为以后公司内部纠纷和诉讼种下了祸根。

公司成立，总公司设康定，由雅安孚和茶号余根仙，永昌茶号夏仲远任正副经理，另有协理、襄理若干人，都是五属大茶商。分公司设雅安，公司和分公司在经理之下都设有总务、会计、文书等机构，另有监事若干人。制造厂共十个，一、二厂设荣经，九、十厂设天全，其它各厂都设在雅安。和第一公司一样，这些厂都设在原来的大茶商的厂房内，如设在荣经的一、二厂就是原来的兰荣泰和姜公兴二家的厂房。

公司开办的第一年，业务还比较正常，和第一公司一样，生产了边茶四十万包，合八万引。第二年就减为三十万包，合六万引，以后就逐年下降，到一九四九年解放时只有四万包了。但这只是以公司名义生产的数字，公司之外实际还有生产的，下面再述。至于生产下降的原因，大体有三：

一是抗日战争以及抗日战争后的三年解放战争国统区通货膨胀，币制贬值，使得边茶也和其它工商业一样，由难办而肖条以致倒闭，加上印茶的大量倾销，造成了生产萎缩，销路日窄。

二是公司先天有病，这又有点：由于有些股东认缴不给钱，又抓揽大权，日久败露，遂与另一些股东，特别是陕西帮的股东发生纠纷，由纠纷而诉讼，以致于一九四四年发生相率退股

提回股本自己造办的情况。其它非陕帮的也提回股本，如天全高泰昌就提回五千元，相当其原认股本的一半。资金既减，生产自必受制。公司成立之初，天全股东高国昌看出其中有弊，乃以监事身份向公司提出：原来天全各茶商所办之茶，有的在路上，有的在天空仓里，如何办？（实际是天全小厂多，除两家作公司厂房外，其余各家按规定都要停产，厂房工具困在那里，⁵⁰公司无钱收购，这些厂也损失不起），公司准许将这些茶陆续运到康定销售，售完为止。这时因为政府实行货物税制，即凡工厂产品出厂，抽一次货物税，几百年的茶引制度自此废止了。但为了“余茶”，公司规定由高国昌给这些“余茶”发引，税仍交茶关。

“余茶就这样一直办到解放。所以这时期的每年边茶产销量，不能以公司的产销量为依据。对于这样借“余茶”名义，各小厂继续自行生产的情况，公司也曾阻止过，但阻止无效。如一九四七年作为茶关税局长的王玉岗，先将天全茶商王元记的六百包“余茶”在康定东关外烧了，又挡压其它天全茶商的“余茶”四千余包在菜园子，不准入关，扬言要烧。天全茶商共推高国昌往见王玉岗。开始，王甚傲，说：“高老师为天全茶来？不谈！”高说：“我不是天全人推我来的，我听见他们要选代表到南京去，才找你来的。现在南京正在反对刘主席（文辉），（时高国昌之弟高济昌继重庆之后又在南京号召西康同乡支援天全、荣经、芦山为鸦片反对刘文辉的所谓“鸦片战争”，组成请愿团请求国民党政府撤销刘的省主席和二十四军军长的职务），代表如去南京，岂不又给主席增加麻烦，到时你如何向主席交待？”王被吓住了，改口说：“依高老师怎么办？”高说“茶税按例照交，另每包酌情罚款，作为你个人对慈善事业的捐赠，捐给同善社办一药房。”王答应了，药房办起来了，名叫“同善药房。”解放后改为康定县城关镇中医联合诊所，即现在康定县城关镇中医院的前身。一九四八年天全茶商彭裕泰又被扣八百包于瓦斯喇。这次由于西康社会愈乱，高国昌找得公司副经理段仲远直接威胁

说：“天全人不好惹，夺了别人衣食，怕不好走路！”夏就喊打条子将茶领回。这类事情，天全有，其它各县何尚无。名有公司，实际仍然是各家分散经营。

三是地方官僚的趁火打劫，公司的成立本来就是刘文辉的一项计谋，既抵制了国民政府财政部统制南路边茶的打算，又拖垮了原有经营边茶的五属茶商，特别是陕西帮大茶商，从而为大邑县以刘为首的经济集团打开了经营边茶的路子。这些人凭借军政权势，在种运鸦片之余，利用暴利涉足边茶，先后成立了“西康公司”、“利康茶号”、“兆裕茶号”、“一三七师合作社”等名义繁多的鸦片和边茶都经营的商业号口，廉价收买原有茶商的生产资料，进行无税生产和运销，甚至同藏商勾结走私。在这些人中还有既不开设号口，也不报资经营而专靠权势搞空头交易的份子，先向公司或原有茶商赊购茶包，按当时价格提货，然后以高价出售，卖了后才给公司或原有茶商付款。由于当时币值一日数变，等到付款时，公司或茶商几乎亏尽了。

另外，在公司逐年侵蚀的情况下，国民党e.e.系控制的农民银行曾在康定发放所谓“茶贷”，企图再行染指边茶，但茶贷只贷给了少数大茶商，变成了私相接受的贿赂，至于真正需要贷款的茶商和茶农却毫无所得。e.e.图控制边茶的算盘始终是幻梦一场。

由上所述，可见三个公司的成立和没落，实际上也就是边茶衰落的情况。

六、边茶的产、制、运、销

四川的雅安、荣经、天全、邛崃和名山五县，气候温湿多雨，土质肥沃，土层深厚，酸度适宜，浸透作用良好，极宜茶树生长，但解放前的数百年却无专营茶叶生产和茶场或茶园，一般都是田边地角，房前屋后，田埂基旁散种一些茶树作为副业；也有间种在玉米或麦子地里的，并不影响粮食作物的收成；在山区

也有集中种在山顶或石头较多的缝隙地里的，专种茶树不种庄稼的，但面积极小，种茶数不过十余株或二、三十株而已。

茶树比较容易成活繁殖，栽种也没有一定时间，“种茶不论月，只要不黄叶。”撒播或点播种籽的比较少，一般都是插枝。将老树干劈成尺多长的短节，两端削成斜口，插在松了土的窝里，再把周围踏实就行。茶树并不需要多的肥料，一般在玉米或麦子施行中耕时，用小铁钩（一般带在腰间）抓去树下的杂草地衣，附带也松一松土，然后略施人畜清水肥就行了。

采摘边茶是在春耕以后，秋收以前，并不影响作物的耕作。采时，用专制小刀将嫩干嫩枝连叶全部砍下，带回家中晒干后堆在屋里，等候茶厂来收。茶厂购农民的茶叶，名叫“踩茶”，因为用的是高七、八尺，直径约二、三尺的大麻袋，装时用脚一层一层踩紧，每袋约一、二百斤。

种茶在五县是农民的副业收入，春耕以后，秋收以前，历史上往往是农民（贫下中农）口粮青黄不接的时候得些钱买粮。所以农民亲切地把它喊为“二季粮食。”

边茶品种，按质分为砖茶、金尖、金玉、金仓（粗茶）数级，砖茶、金尖，一般是藏族上层人士购用的，金仓则多为农牧民饮用，金玉是中等茶，可上可下。到本世纪三、四十年代，实际上只有砖茶、金玉，粗茶三级，而粗茶只有天全生产，也只销在康定、丹巴、九龙、道孚数县。由于边茶分有等级，一般人多认为一株茶树，先采毛尖，次采砖茶，再次金玉，最后摘老干老叶作为粗茶；实际上分级“择茶”是茶厂的事，茶农是不这样做的，因为按这个程序采茶，不但茶树容易枯老，而且抽条快，结叶少。所以茶农往往把茶树分开，采边茶的树，专采边茶，不采毛尖，采毛尖的树，不采边茶，专采毛尖。毛尖一年可采三、四次，而边茶一年只采春秋两次，而且在同一株茶树上，上年或上次在什么地方开刀，今年今次还是在什么地方开刀。这样才能保住树荫，不致过早枯老。对于已经老枯的茶树，在秋季采茶后，应在离土寸

许的地方下刀，将其砍掉，这样第二年它又可能在刀口地方发芽复青。

赵尔丰在整顿边茶准备和印茶竞争时，雅安知县全禀元根据茶商邱德元等“禁假除弊，以维茗纲”的禀贴，中把假茶的责任推给农民。他说：“整飭茶务，以禁伪为入手，办法固必杜端茶之弊，尤必清采摘之源。”认为是茶农把一些“可选茶之杂树叶”混采在边茶里了。当时一些人，更把“掺杂伪物”列为印茶侵入的理由之一。^⑩这里为了生产边茶作参考，不妨谈谈历史上有关边茶掺假的问题。

首先，掺杂假茶在清末实是政治腐败的结果。全禀元的顶头上司，雅州知府武瀛在给赵尔丰关于筹组边茶公司筹办处经过禀帖中，即说：“查部引本各有定数，各有责成，今则或顶商，或代商，行商少，歇商多，每值新茶登场之际，无论销岸衰旺，行商按引办茶，各有计算，歇商则大小不一，值畅销则临渴掘井，值疲滞则引置度外，迨至截封期迫，引悬无着，茶关委员乃强迫各行商通融改带，”“在有力自爱之茶商，先行布置，不患无茶配引，而时过茶空，一种滥商，只顾目前，此掺伪夹杂之所由起，亦放帐滥售拖欠之弊所由来也。”^⑪一句话，假茶是茶委员对商人的掺伪夹杂通融造成的。商人掺伪夹杂是因为本身不是茶商，而是顶替或代茶商制茶推销的，平时不制茶，临时有引无茶，因而粗制滥造，只图赚钱；至于茶委员为什么准许通融，武没有说，按清末吏制情况，当系贪污无疑。重要的是武对此没有提农民而指的是茶商。显然是茶商向农民买茶，如无掺假企图，绝不会要假茶，即使农民掺了假也会在踩茶和择茶时剔出来。

其次，边茶掺假确是有的，除上述那种为了凑数掺假外，还有一种情况是为了增加色道（又名“熬头”）。纯茶熬出来是绿色或淡黄色，熬得久点，也不过是浅褐色，褐色，要现棕红色或增加香味，茶商们就各家有各家的做法：有的掺虫茶（将一种能熬

茶的树叶，川东、川北是老鹰茶，川西是桉桢茶，采回放在蔑兜里，撒上少量糯米，将蔑口盖好，和玩魔术一样，过一段时间，约十天以上，打开盖口，蔑里的树叶和糯米都没有了，有的是和油菜籽一样棕红色的“虫屎茶”，这是四川劳动人民最欢迎饮用的饮料），有的掺椿辟了的茶籽，有的掺川南出产的河茶，天全是掺桉桢树叶和嫩枝，甚至有的专把桉桢茶办成金玉茶的。

解放前在天全种桉桢树的人家多，房前、屋后、沟边、地边都有。桉树成活易，长得快，三、五年就可以栽枝。每年春夏之后，农民把桉树枝截下，把粗杆作为燃料，把小枝嫩枝和叶一起放在锅里煮，到一定时候，捞起晒干后堆在屋里，等茶厂来踩茶。但桉茶不和真茶放在一起，因为两种茶的价钱是不一样的。

赵尔丰曾因天全茶商王兴华用桉桢树办茶，认为是假茶，对其处罚“尽烧其茶”，但一直到解放，天全茶商还是在办这种假茶。一九四七年国民党康定银行，企图染指边茶，趁康藏茶业公司亏本的时候，派人到康定发放“农贷”。声称“不给天全”，“因为天全办假茶”。五属茶业公会理事高国昌在会上说：“这种茶有熬头，能消食除胀，专销南路各县，藏人已习以为常，甚至舍此不要”，该行来人前往调查属实，对天全茶商仍发了农贷。

茶商把茶收购到制作厂后，一般就堆在仓库里，仓是敞的，有房顶，无房壁，或缺一壁两壁，随时可以翻晒。制茶也是在农闲时间，工人就是农民，每天除供给伙食，住宿（有的要自带被子），茶水，叶子烟（或毛烟）外，给一至二升米作为工资。（二、三十年代雅安所属各县斗称大小不一，一斗二十斤、三十斤、四十斤不等，天全是每斗二十斤旧称。各县所给米折合工资的大体一致）。制茶的工序因品质不同，有筒、有繁、金尖、砖茶较简，金仓（粗茶）最繁。简叙如下：

（一）选茶，即将堆存的干茶进行选择分级，把不是茶的杂物去掉，同时按质量级别分堆。这多由童工和女工择作，大体都是

厂附近的居民。除这道工序外，其它工序都是青壮年男工。

(二) 制茶，用制刀将枝干带叶制成半寸以内的短节。金尖和砖茶没有这道工序。

(三) 上浆，将制好的茶，拌上一层熬好的糯米浆。粗茶多，砖茶不上，金玉少上。

(四) 上炕，炕是石头做成的灶，呈圆锥形，下圆直径二至三公尺，在圆心立一直径二十公分，高约一点五公尺的石柱，圆周用弧形条石砌成的，高约七十公分，最上一层是弧石槽，顺内槽边用等腰三角形石板的顶角斜搭于石柱的顶端，砌成圆锥，每块石板都开有品字形的缝隙，缝隙长约10—15公分，宽约二至三分，炕的下方贴地等分圆开三门。由门加柴块燃烧，然后将浆好的茶叶撒铺在石板上，烘烤起来，茶如下滑，只能滑到槽内，不致落地，只有粗茶和金玉才这样做。

(五) 上甑，把上炕炕好的茶，按一甑的重量（粗茶五斤、金玉四斤，砖茶一斤）用较细的麻袋装起放到大桶甑里去蒸，一甑同时可蒸几袋，边进边出。

(六) 上板凳坡，在厂房的一角里，紧贴墙角，顺墙壁的一侧并排斜搭二至三块二至三寸厚，一至二尺宽、三至四公尺长的木枋，枋和墙的俯角为30°，仰角为60°，不靠墙壁的一边设有扶手，这这叫“板凳坡”。将蒸好的茶，趁热由桶内提出，连袋一齐甩在坡上，坡上的人由一个至四、五个不等，便用一双赤脚不顾热和烫地来回上下踩，一直将茶踩绒为止。踩了一甑又一甑，大汗淋漓真是费劲。

(七) 搭包，按茶包的大小长短用木方做成一个可以拆卸的长方盒子，用架子直立固定起来。用时，先将一包茶的篾兜放在盒内，然后把已经上了板凳坡又回甑蒸热的一甑茶倒在盒里，盒外对面站住两个人，共用一块木制椿板（方木）交换着一下一椿板，将茶椿成块，这块茶称为一甑。椿好一甑，再倒一甑进去椿，四甑都椿好了，算是完成了一包。然后拆盒，连篾兜带茶一齐取出，

堆放一边。重新换篾兜，再椿第二包。

(八) 倒包（最后包装），经过椿包的茶，到一定时候水气干了，就从篾兜里翻倒出来，用原篾兜进行重包。将倒出的茶，先用草纸或黄白纸连同藏文的商标说明书一甑一甑的包好，在包外打上藏文印记；由于茶块两头是平的，而篾兜的两头包成椭圆以减少受潮和耐撞击，另用草纸把半斤到一斤茶包成半个椭圆作为茶盖；茶盖放两头，四甑茶放在中间，一甑一甑接成长条形，然后用百家竹花成的络篾顺捆两道，再装到原篾兜里去；篾兜外又要用络篾顺捆两道，横捆三道；篾兜外四面都印上藏汉文商标；封口的一头，打上黑巴一块，表示原封。另外还有半包的，则是将一包包好的茶从中切开为两半，一半两甑，各用笋壳将切口封起来，用络篾将每一半包顺捆二道横捆两道，在笋壳上打上一个黑巴。砖茶是每砖（一甑）包一次，四砖包成一甑，四甑一包，其它相同。

商标说明书是木板刻的藏文，没有汉文。上面是商标图案，下面是藏文说明，说明茶商名称，产品、质量和产地等等。如天金高泰茂的粗茶，商标是 ལྷོད་ཤི།，茶包外面，两个正面中间印一个“松”字，两头是花纹，两个侧面中间印的是藏文“ཉ”字，两头也是花纹；说明书的上头是一对金鱼图画，下头则是藏文说明。熟悉的藏商，无论是从包外或包内都能很快辨别出真伪。

花络篾、编篾兜也是茶区农民的副业。自己有竹林的花好编好买给茶厂，茶厂有竹林的雇农民花和编，更有地主有竹林雇农民花好编好卖给茶厂的。络篾一般是用百家竹的青篾，用楠竹花的，则把一、二、三道黄篾编成篾，青篾就花成络篾，总之，篾兜用黄篾，络篾用青篾，因为青篾的柔韧性适合捆绑。

茶商在产地设厂制茶，在康定设店卖茶，茶制成包后，必须雇人运到康定。受雇者当时叫“背脚”或“茶脚子”。（制茶工人叫“茶伙子”。）受雇者有单个的，也有数人或十数人成伙的。

单个的往往是茶厂人家的佃农，或与其有亲戚关系的农民；这种人除背茶外，往往要给厂家来回捎带食物、衣被、用品、特产，有时（如年节或遇厂家的婚丧喜事）甚至是专为厂家运送这些东西，而附带运茶的。成伙的必然有一个领头，这个领头往往是厂家的佃农或亲戚，或由其亲戚友好担保的人。

受雇者到茶厂发茶，按自己体力大小开单，愿背多少，便背多少，但必须配成整引，即一引五包，必须是五包或五包的倍数，单个成伙都是一样。单个通常是背五包粗茶或十包金玉。成伙的则数量参差，有背二十包砖茶的，有背十余包至二十包金玉的，有背粗茶七、八包，至十包的有的带着十余岁的孩子让孩子背五、六个半包的，但一伙所背的总效必须是五的倍数。单个背五包的名叫“跑五包子”由天全到康定来回一趟九天，一月可以往返三次，成伙的、背得多的就不一样了。

受雇者在决定自己或一伙所背茶包数量后，茶厂就按数发引，并付给一部份工资，一般不超过50%，名叫“发脚”，引和发单必须带在身上，等把茶运到康定交给“座庄”先生后，座庄即照发单所写情况发给其余工资，名叫“清下脚”。

背上数十包至二十包茶，一天只能走三、四十里，由天全到康定来回要十二、三天，乃至十四、五天，每月就只能跑两次。夏季骄阳似火，汗流夹背；冬季积雪滑冰，手足僵冻。走的时间少，歇的时间多。夏季乘早晨太阳未升高的时候，从五、六点钟开始到九、十点钟就歇了。冬季则与相反，要等雪化出路来才敢翻山，所以是九、十点钟上路，下午二、三点钟就歇了。如许长的时间，住在客栈里，（沿途每户人家都是客栈，有大、有小、有早有晚，但都不是专营客栈办的，而是农民），除睡觉外，就是抽鸦片烟。赌钱赢的时间少，输的时间多。输了，没有路费再走了，只好把茶卸在客栈里，一走了之。也有在路上生病，甚至死亡，而把茶卸在客栈的。这种茶堆多了，茶商损失大，因此每年各家茶商都有根据情况考虑派人到沿路清理的问题。这种清理，

名叫“清极仓”、或“清路寄”。茶商对此是很头痛的。但是，背茶者的痛苦更大。背茶者是农闲活，每年农闲总是夏、冬二季。加上山高坡陡，道路狭窄崎岖，坎坷不平，无论是从雅安经荣经汉源到泸定的大路，还是由雅安经天全到泸定的小路，情形都差不多。徒手都难行，何况还要背上一、二百斤。特别是翻山越岭，大路要翻大相岭，飞越岭；小路要翻猪红山、马鞍山。每年都有倒卧的，跌下岩的，摔进雪窝里去了的，甚至到了康定大风湾还有被风吹死了的（冻僵了的）。那时，小路上流行几句话：“上得象鼻子，下得风吹林，翻得马鞍山，当得屁不疼，”意思就是要有能力过这几个险要地方，你才能背茶。康定大风湾有个万人坑，地址在现今交通监理所附近，象一间小屋，全由石灰涂壁，正面下开一个小洞，凡属倒毙的背茶人，无人收尸掩埋，便拖来甩入洞里。正面横写“白骨塔”三字，一幅对联是“满眼蓬蒿游子泪”，“一盂麦饭故乡情。”虽然坑中不只是背茶的，但背茶者占多数，每过那里，都叫人望而心酸。

一九三九年后一直到解放，修了一条未通汽车的川康公路，运茶改用了胶轮马拉车，但不仅问题更多，而且被地痞流氓，袍哥大客所把持垄断，农民对运茶就没有份了。

茶商在康定设庄，把茶厂运来的茶卖给藏商。在清乾隆年间，五属茶商在康定设庄的有八十余家，资金最雄厚的是陕西帮，（陕西人在五属特别是雅安最多），他们聚居在陕西街（已毁于火灾，约在今农牧大楼大礼堂一段），其次是雅安商茶。天全产茶虽多，但自邱瀛州报“人亡产绝”后，各家资金都很少。其八十余家茶商经过兴衰衰败，以大并小，到一九三九年还存在的不过二十余家了。他们是荣经的姜公兴、兰荣泰、王长盛、王怡盛盛，雅安的义兴、恒太、聚诚、天增公、恒春、（五家都是陕西帮），余孚和、夏永昌；天全的黄福元、高泰茂、高德泰、李庆发、杨天德、高泰昌、王兴华、彭裕泰、王恒升、王元记；名山的李胜和，邛崃的王驥成。名山、邛崃两县茶商少，一般是天全

人到那里设厂制茶，算为全茶。雅安茶商多，当地产茶不够制作，往往到雷波、马边、屏山、峨边、眉山、青神等县采购，这是清政府规定的。二十余家茶商只是二十余家号口，实际上，由于祖传产业，年代日久，弟兄分家，在康定是一家号口，在产地则是几家茶厂。如天全的黄福元，在康定只一家，在天全则有福元贞、福元太、福元义三家，都各自设厂办茶，三家所产茶运到康定，却由代表三家的座庄销售。同样，高泰茂有泰茂松、泰茂久、泰茂长。其余四县也有类似情况，不一一列举。

康定茶商把茶卖给藏商，付价讲白银秤数，一秤是白银五十两，按茶的品级和质量议定每秤合多少包茶，由双方议定。茶价议定后，藏商或付给白银（清末至一九三九年藏区通用藏洋，每枚纹银三钱二，故一秤应为藏洋一百五十六元多，但由于铸造厂不一，成色也就不一，使用时，一秤白银合多少藏洋需双方议定，三十年代一般总在—百七、八十元之间），或以货易货，即以黄金、麝香、皮毛、药材等土特产品作价易茶；如两样都付不出或付不足的，可由锅庄主人担保出具藏文欠条，（双方熟悉的的不必担保），这种欠条，名叫“夷票。”夷票一般是要计息的，偿还时，本息齐付。但有多年不还，甚至因死亡而成为呆帐的。一九三九年后，边茶不断减产，时值抗战期间，沿海沦陷，后方商品缺乏，英国人乘机向西藏大量倾销商品，印茶也大量进入西藏，藏商将这些走私物品运到康定推销，换取边茶，边茶反而供不应求，于是前述夷票情况一反而为买“预茶”（即订购），藏商先付款，约订时间交茶。当时的康定也和它后方城市一样，备受通货膨胀，物价飞涨的影响，往往交茶时，茶价涨了，仍只能照原价交付。这样茶商就大受损失。这也是西康边茶公司亏损的原因之一。

茶商将边茶堆存康定待销，一时卖不出去而又急需用钱，或者康定及附近各县的农牧民到康定买茶。或一甌，或半包，或一包，或数包，或不满一秤，或只二、三秤的，都找中间的茶商，

前者是卖茶，后者是买茶。这种介于二者之间的茶商叫“零茶帮。”零茶商就在这一进一出之间获取一定的利润。一九三九年以前康定的零茶商有六、七家，较大的三家是信昌裕、天元长、德成昌。当时地方政府在康定南北门都设有税卡，茶包过关要交一定的税，两包以下的就免，三包是半驮，就必须纳税。清政府规定每驮收藏洋半个；陈迺龄时改为茶一驮收藏洋一个，杂货一驮收三个；刘文辉到康定后先援陈例，一九三九年边茶公司成立后，撤了北门税卡，在二道桥设检查站，还是征收，但税额较低。

边茶在康定除零售外，一般是批发给藏商。当时最大的藏商是西藏的“三昌”，即邦达昌、三多昌、岔绒昌，三昌一方面搜集西康省属藏区及西藏的土特产品，一方面购买英印商品，运到康区换购边茶，再运到藏区及西藏出售。三昌不仅做生意，还干预政治，对西藏来说、也是“亦官亦商”。例如邦达昌的邦达多吉，不仅和西藏的藏族首要相通，也和西康省主席刘文辉以下的文武官员相通，曾任过藏军代本，三十年代西康的三大事件中的“诺那事件”就有他参与。除三昌之外，来康定批发边茶的多是土司头人，或他们的管家，或者是各大寺院的喇嘛，喇嘛一穿俗装便成了充本。这些人都同样带来土特产品推销，买回去的，除边茶外，还有布匹、针线、铜铁用具和金银首饰等等商品。至于一般藏族农牧民，除康定县属及附近各县的部份邻近区域外，是没有能力来到康定买茶的。农牧民买茶是在各自住家或牧区附近的寺庙庙会期间把土特产品带去参加庙会，向土司头人和喇嘛换，至于茶价和土特产品的售价，则一任对方计算。所以在大量被剥削下，一般农牧民吃茶是很困难的，一点茶叶，熬了又熬，最后还把茶渣碾烂，掺些糌粑再熬成糊粥一齐吞食。

藏商在康定成批买到边茶后一般是用牛马驮运，但原装蔑篾经不起途中碰撞，所以又必须改换包装。专门从事这种包装工作的藏族工人叫“佳做娃”（ཁྱེད་ཀྱི་བླ་མ་），意思是缝茶的。

缝茶有专门的割皮小刀，和象腿工的履针那样的缝针。缝前先将牛皮带毛用水泡柔和，缝时先用小刀把一部份牛皮开制成约一公分宽的细条作为线，把线穿在长约十五公分的缝针一头圆孔里，坐在地上很快地缝起来。包装形式有两种，一种是花包，即运输途程较近的，用刀先把牛皮按需要的尺寸开割成块，再将每块割许多条交错的缝，把整包的三包茶重叠起来，将割了缝的牛皮在三包茶上绷开，把茶裹起，用针线把两块皮之间的缝口缝起来，两头再用大小合度的两块整皮缝起。这种缝好的茶外面象戏台上孔明穿的道服，所以叫花包。这样缝好的茶捆叫一只，两只为一驮，适合一头牛或一头马驮运。另外一种为满包，即运途较远的边茶包子，花包已不济事，只好把整块牛皮用上。办法是将原包边茶倒出来，两甌（半包）一层，两甌一层地重六层，（共三包），然后用牛皮缝包起来。缝好的茶是方形的或近方形的六大块。然后用小刀先在上面划上藏文的地址和收货人的姓名，或代号，然后用红按划好的刀痕涂写一道，缝口也用红涂上。一大块也是一只，两只一只，和花包一样，供一头牛或马驮运。在途中野宿时，即把茶卸下来堆砌成墙，围合成院，主人即在院内住宿，熬茶，牛马则放去吃草，院外有狗守护。放牛也有狗跟随。

藏商在康定投宿的旅店，叫“锅庄”。锅庄不仅住人，驮马，还可以堆放货物。在清乾隆嘉庆年间，边茶业最盛时，康定有大小锅庄四十八家；到一九四九年，只有二十多家了。锅庄主人，一般都是女的，熟习汉藏语言，替藏商推销土特产品，购进边茶和杂货，宛如内地的经纪人。藏商住在锅庄，主人不收宿食费，只是在经手介绍藏商的买卖时，从土特产品的出售金额中抽取2—4%的报酬，大概是供给客人酥油茶的抽4%，不供应的只抽2%。每个锅庄都各有自己的长住客人，不能强行招住，如张家的客人住到李家去了，其生意仍由张家主人经手取酬，李家无理不得争夺。由于锅庄主人居间重要，她往往也要和五属在康定坐

庄的一些茶商熟悉和来往，这样就往往招致一些流言和蜚语。但是，一家锅庄和来往的藏商和其茶商往往几代人都不变。

七、尾 语

我国是产茶之国，国内各民族长期形成了饮茶的习惯。在过去的年代，由于不是人民当家作主，历代统治者都把边茶作为统治少数民族的工具，还列如财源。从边茶史实可以看出历代统治者既是压迫者、剥削者，并是民族不平等的制造者。解放后，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人民当家作主，实现了各民族在政治、经济、文化上的平等。仅边茶一项，由国家补贴收购，低价按口配售，保证了边地各民族的饮茶所需，仅此，也充分说明，中国共产党好，社会主义制度优越。

（此稿承康定老中医高国昌和天全茶商黄福的后人 黄元佐提供了一些情况，特此致谢。）

注：

- ①《明史》食货志、茶
- ②③《康导月刊》五卷、五期
- ④《明史》食货志、茶
- ⑤《宋史》西夏传
- ⑥⑦⑧⑨⑩⑪⑫⑬⑭《宋史》食货志、茶
- ⑮⑯⑰⑱⑲⑳㉑《明史》食货志、茶
- ㉒㉓㉔《清史稿》食货志、茶法
- ㉕《雅州府志》
- ㉖《清史稿》食货志、茶法
- ㉗《康导月刊》五卷、五期
- ㉘㉙㉚《康定县图志》

康定锅庄传闻录

高济昌 来作中

过去，康定有几十处藏族人民居住的大、小院坝，被群众称为“锅庄”，公认有四十八家。有的虽被列在“四十八”家之内，但实际上早已不存在；有的虽然据有锅庄名号，又不为群众所承认。其原因为何？众说纷纭。为了探索这一问题，我们进行了一些调查研究。现将有关康定锅庄的传闻，综述于后，供作参考。

一、有关“锅庄”名称的几种传说

1. **侍贡说。**据《康定县图志》记载：“康熙三十九年（1700年），土司锡拉扎巴克被藏番昌测集烈杀害了，旋经四川提督唐希顺率兵征剿，以土司之妻滚噶袭职，其子坚参德昌自木雅移此（康定）建垒营寨，置土目于此，所差侍贡，名曰锅庄。”照此解释，锅庄则是明正土司下属土目派在康定的“侍贡”，其栖息之所，是为锅庄。

2. **古草**（ཀུ་མ་）说。这是和“侍贡说”有直接关系的另一种说法。其根据是《清史稿》卷513“土司”条中叙述：明正土司辖有土百户四十八家。藏语“古草”即汉语“代表”之意，“古草”与“锅庄”谐音，因而“锅庄”应是土司下属的土百户所派代表在康定的住所。

3. **古曹**（ཀུ་ཙཱ་）说。“古曹”是藏语贵族之意，“古曹”也与“锅庄”谐音，故而有人说“锅庄”即是当时明正土司属下的“贵族”在康定的住所。

4. **姑萨**（གུ་ས་）说。“姑萨”藏语意为院坝，是指每一家锅庄

都踞有一座院坝，因而得名。

5. **锅灶说。**有人认为，康定在没有设置明正土司之前，有名的藏商罗布藏波经常来往打箭炉经商业，他们赶着驮载土特产品的牛群到康定以后，即用三个石头支锅熬茶，故谓锅庄即是“安锅置灶”之意。据说在凉山彝族居住的地区，也有同样的习俗和名称。

6. **旅棧说。**清末，康区实行“改土归流”，有不少藏商经常赶着牲畜，运载着土特产品，来康定交换茶、盐、百货等，他们到康定后，都要住进自己常住的“锅庄”，并在锅庄内堆存货物，饲养牲畜，故而有不少人又把锅庄视同旅棧。

至于未被列入“四十八家锅庄”之内的那些锅庄，据了解，主要是在清末“改土归流”之后，新设的部分旅店、客栈。他们虽然也各有一座院坝，人们也习惯称之为“锅庄”，但在康定群众的心目中，他们是同“四十八家锅庄”有着严格的区别的。

二、康定四十八家锅庄的名称及职责

锅庄名称及其藏语原文	藏文含意	所司职责	通俗称谓	备 考
萨根过 (ས་རྒྱུ་གཙུག་པོ་)	前者意为土台，后者为大地头人	据说是明正土司五大亲信之一	大院坝罗家锅庄	另有传说萨根过曾是原来的明正土司，后来失去土司职位，故被称为“大地头人”。
效白托马 (ཁེ་འབྲུ་ཐོ་མ་)	上效白是明正土司五大亲信之一，又是四大管家之一	据说是明正土司五大亲信之一，又是四大管家之一	明正街铁门坎汪家锅庄	“效白”是西藏噶厦政府对四家大噶伦的称呼。传说噶厦政府曾派一效白到明正土司处任职，住在这家锅庄，后在这里上门，人们遂称之为效白家。后来弟兄分居，成为上下两家。

效白约马 (ཐུགས་པ་ ཐུགས་པ།)	下效白家 或下效白 大臣家		是由上效白家分出
仲衣措 (བྱེད་མིག་ ཅང་།)	秘书之家	担任明正土司 的秘书，负责 管理文案	子耳坡安 家锅庄
郎白莎 (ལང་དཔལ་ ཤ།)	内臣院	负责管理土司 的衙内事务	水轿子包 风英锅庄，或李 海庭锅庄 与明正土司有亲属关 系据说包风英是土司 之女，也有人说是土 司之妾，后嫁与李海 庭，故名。
贡觉娃 (གློ་མཁའ་ ལོ་ལྷ་མོ་ལཱ་ པ།)	住在山谷 里的人家 或来自贡 觉的人家	据说是明正土 司五大亲信之 一，又是四大 管家之一。负 责管理土司家 的土地田亩	白土坎包 家锅庄 锅庄在现甘孜报社附 近，故说是山谷里 的人家。一说前辈来自 贡觉。
曲里巴巴 (ཐུ་ལྷོ་པ་ པ་པ།)	两水之 间的人家	明正土司的 四个管家之一， 负责为土司管 理食品和粮食	将军桥白 家锅庄，后又称邱 家锅庄 锅庄为现在的州检察 院及其对面地址， 位于跑马山脚下。当 时山脚下另有一水 沟，故称两水之间。
杜根过 (རྩ་རྒྱུ་ ཤང་།)或 杜根家 (རྩ་རྒྱུ་ ཤང་།)	有石台阶 的人家， 或有石台 阶的头人 家		北一巷贾 林锅庄 传说萨根过的先人作 土司时，该锅庄曾担 任辅佐。因门前有石 台阶而得名。
打谷叫巴 (ཐུ་གྲུ་ ཐུ་པ།)	城门背后 的人家	负责为土司看 守城门	南门查家 锅庄
育卡娃 (ཡུ་ཀ་ པ།)	城边上 的人家	明正土司的一 般管家	子耳坡包 家锅庄 据说康定过去曾有四 门，这家锅庄位于西 门边缘，以西再无人 家，故有此名。

亦雍娃 (ཡོ་ཡོ་ ཐུགས་པ།)	哈亦雍寺 献金宝顶 的人家	土司的一 般管家	深巷子 雍娃锅庄 据说该锅庄曾建有金屋 顶，大而放光，土司命其 献与亦雍寺，后即以寺名 为其锅庄名。
高日沙 (གཤམ་པ་ ཤ།)	四合院		下桥高日 锅庄 据说该锅庄在高日寺山附 近有亲属和土地。
阿桑托马 (ཨ་ཤང་ ཐུགས་པ།)	上阿桑家		白土坎陈 家锅庄 “阿桑”是木雅乡一个村 名，据说上下阿桑两锅庄 很早以前都在那里有亲属 和土地。
阿桑约马 (ཨ་ཤང་ ཐུགས་པ།)	下阿桑家		白土坎彭 家锅家
贡托托马 (གློ་ཐུག་ ཐུགས་པ།)	上白土坎		白土坎罗 家锅庄 上下白土坎两锅庄都住在 白土坎坡上，故名。
贡托约马 (གློ་ཐུག་ ཐུགས་པ།)	下白土坎		白土坎石 家锅庄
曲卡娃 (ཐུ་ཀ་ པ།)	河边人家		深巷子秦 家锅庄， 又称雍家 锅庄 据说当时康定的折多河面 宽，街道窄，这家锅庄的 地址，在当时已是水边。
桑卡措 (སང་པ་ ཅང་།)	碉楼人家	负责为明 正土司担 任警卫	明正土司的土司衙门后山 有围墙，这家锅庄在围墙 的北边上，设有碉楼。
日日铺托 马(ལྷོ་པ་ ཐུ་ཐུག་པ། 或ལེ་པ་ ཐུ་པ།)	上子耳坡 家或金顶 附近人家		子耳坡王 家锅庄 “日日铺”藏语，汉译为 子耳坡，这家锅庄在亦雍 寺下面，寺的金顶闪闪发 光，故人们又以此指锅庄 所在。

日日铺约下子耳坡 马(ཁྱེ་རེ་ མ།)	家	子耳坡杨 家锅庄	
则然托马 (ཐུལ་ར་ ཐོག་མ།)	上则然锅 庄	梭罗坝张 家锅庄	“则然”意为猴院。传说：藏商罗布藏波经常用绵羊驮货物来打箭炉，羊由猴看管，到打箭炉后，羊入圈，猴住院，故以名其地。藏语“猴院”为“则乌然娃”简称“则然”。
则然约马 (ཐུལ་ར་ ཐོག་མ།)	下则然家	梭罗坝王 家锅庄	
控达娃 (རྒྱུ་ཐ་ པ།)	房后人家	将军桥充 家锅庄	此锅庄前面还有一家锅庄名姓底娃，故称房后人家，“改土归流”后，锅庄无后人，由亲戚大院坝充家锅庄继承产权，故人称为充家锅庄。
(上)瓦斯 坝(དབུ་ པ།)	信奉黑教 的人家	明正土司 的辅佐	据说其先人无后，念黑教经典千万遍后，有了后人。从此代代信奉黑教。后弟兄分家为两个锅庄。
下瓦斯坝		负责为明 正土司管 理色多衙 门的土地 和三座庙 宇	下桥彭家 锅庄
三因措 (གསལ་མེ་ པ།)	“明心” 的人家		贡嘉寺三 元锅庄
			“三因”佛语，意为明心。传说锅庄女主人三因郎卡志玛在挤奶时暴亡，是被西藏萨迦寺的喇嘛收鬼收去了，后又成了神，故名。

甲绒些 (ཁྱེ་རེ་ མ།)	甲绒公子 家	明正土司 的辅佐	北一巷木 老爷锅庄	往昔藏族把木坪(宝兴)、丹巴、大小金都称甲绒，木家是木坪土司之后，所以称“甲绒公子”。打箭炉的人因木家与明正家是兄弟，故称之为“木老爷”。
青绕弄巴 (ཁྱེ་རེ་ པ།)	藏王青绕 旺却故居		大石包杨 马太锅庄	这家锅庄的祖辈青绕旺却曾做过宗喀巴的代理人，又是达赖的经师，做过藏王，死后葬在专为他修的拉萨登宁寺。故名。
充布措 (རྒྱུ་ཐ་ པ།)	裁缝家或 商人或 黑教神家	明正土司 四个管家 之一，传 说是给土 司管理服 装布匹的	大院坝充 家锅庄	对这家锅庄有三种说法，一说是给明正土司管理衣服布匹的，一说是为土司经商的，一说是黑教神之一，这个神为绰斯甲人供奉，充家是来自绰斯甲的。
那密娃 (ཁྱེ་མེ་ པ།)	有权的喇 嘛家	负责监督 行人到三 道桥后， 必须下马 步行进城	三道桥那 密娃锅庄	据说原来跑马山的庙子是南无寺的经房，庙子里经常有平高德喇嘛在那里休息。在折多山的甲登通和三道桥都能看见这个庙子。明正土司规定：凡行人到这两个地方，都要下马、下轿，否则就要被拉下来。这个锅庄就授命执行此事。
昌措 (ཁྱེ་ཐ་ པ།)	管理市场 的人家或 管理犯人 的人家	明正土司 四小管家 之一	子耳坡邱 家锅庄	
贾力托马 (ཁྱེ་ལོ་ པ།)	上贾力家	负责为明 正土司管 理茶叶和 打马伞	明正街贾 力锅庄	原只一家，名贾力措，以后弟兄分家，分为上下两家。

贾力约马 (ར་ལ་ལོ་མ་ ལོ་ལོ་ལོ་)	下贾力家			
布仔娃 (བུ་ཙེ་ལ་)	牧童之家	负责为明正土司放牧的	二道桥杨家锅庄	一说布仔娃藏文是儿子多的意思。一说是该锅庄原名甲那它钦即明正土司的别墅所在地,该锅庄是负责管理土司这所别墅的。
帕楚措 (པ་ཅུ་ཅུ་ ཅུ་ལོ་)	养猪之家	负责为土司管理养猪的	深巷子白家锅庄	
鸡子托马 (རྩ་ཅུ་ལོ་ ལོ་ལོ་ལོ་)	上鸡子家	负责为明正土司管理放牧牲口的	北二巷彭永年锅庄	
鸡子约马 (རྩ་ཅུ་ལོ་ ལོ་ལོ་ལོ་)	下鸡子家	同上	北二巷彭兰田锅庄	彭兰田并非锅庄后人,系买的锅庄产业。
娃底娃 (ལ་ཅུ་ལོ་)	揉狐皮的人家	负责为明正土司管理皮张	将军桥娃底娃锅庄	
吉波娃 (རྩ་ཅུ་ལོ་)	做酸菜的人家	负责为明正土司制作和管理菜蔬	南门外吉波娃锅庄	一说吉波娃是每年五月十三日,四十八家锅庄都要参加赛马活动,该锅庄总是跑在后头,引起大众欢笑,喊“吉波”、“吉波”,因而得名。
牙楚措 (ལ་ཅུ་ལོ་ ལོ་ལོ་)	羊儿家	负责为土司管理饲养羊子	大院坝牙楚措锅庄	
唐马仲科 (ལ་ཅུ་ལོ་ ལོ་ལོ་)	驛站长	负责为土司管理马房拉差役	南门唐马房	土司辖区内的农牧民都要为土司服乌拉差役,凡被派来康定供应乌拉差役者,都由这家锅庄管理。
卡娃陈措 (རྩ་ཅུ་ལོ་ ལོ་ལོ་)		负责为土司管理音乐歌舞的	南门姜家锅庄	明正土司常调锅庄妇女到土司衙门唱歌跳舞,称为跳锅庄。这家锅庄即负责管理此事。

阿娘巴巴			深巷子张保正锅庄	清末“改土归流”后,锅庄主人阿甲拉绒,汉名张正荣,作了康定县中区保正,因而得名。至于该锅庄的原名含意,尚未得知。
官布锅庄			下桥黄记仓房	原锅庄将祖业出卖给黄家作了仓房,原锅庄含意不详。
黄桂锅庄			梭罗坝黄桂锅庄	原锅庄情况不详。
张西太锅庄			大石包张西太锅庄	张西太系邛崃人,在锅庄上开门,以致后人只知张西太锅庄,锅庄原名不详。
甲卡措			南门外甲卡措锅庄	据说此锅庄在唐马仲科锅庄背后,紧靠河边,门外有一柳树,其余不详。
包包任钦锅庄			南门外包任钦锅庄	有说包包任钦即是被尹昌衡杀了的明正土司之弟甲老四,他与原锅庄之女婚后据有此锅庄。

三、四十八家锅庄和明正土司的关系

在明正土司统治时期,康定曾流传着这样三句俚语:

“主人是明正土司(ལང་ལ་པ་ལྷན་པ་ལྷན་པ་);
管理人民的长官是瓦斯碉(ལྷན་པ་ལྷན་པ་ལྷན་པ་);
喇嘛是金刚寺(ལྷན་པ་ལྷན་པ་ལྷན་པ་)。”

从这三句话中可以看出,瓦斯碉锅庄和金喇嘛寺是在明正土司属下负责管理民政和宗教事务的锅庄和寺庙。

同时,康定还流传有“弄密哩”(ནང་མི་ལཱ་,意为土司最亲信的户人家);“捏巴切波亦”(ནེར་པ་ལྷན་པ་ལྷན་པ་,意为四户大管家,和“捏巴穷娃亦”(ནེར་པ་ལྷན་པ་ལྷན་པ་)意为四户小管家);和“捏巴”(ནེར་པ་,意为一般管家)这样一些根据权力大小不同的等级称谓。虽然他们在一定的时间内,要经过金喇嘛寺的喇嘛“打卦”来决定各自的职位,但“弄密哩”一般是指萨根过、效

白措、贡觉娃、瓦斯碉和甲绒些五家锅庄；“捏巴切波亦”则是由效白措、贡觉娃、瓦斯碉和甲绒些四家锅庄的主人担任；“捏巴穷娃亦”又主要由充布措、昌措、曲里巴巴和卡娃降措四家锅庄的主人担任；至于捏巴则有贾力、郎白莎、育卡娃和亦龚娃等锅庄的主人担任。其余锅庄分别为土司承担某项专责。所以康定至今尚有不少老年人认为：瓦斯碉和甲绒些两家锅庄，历来就是明正土司的左右二辅，其中瓦斯碉是专门代表土司同大清皇帝打交道的。

据瓦斯碉最后一代锅庄主人包文光（现任康定县政协委员）说，他家的“包”姓就是大清皇帝赐予的。原因是他的祖先在辅佐明正土司期间，土司犯了杀头之罪，皇帝追问，其祖先即代土司承担罪责，并愿代受极刑。皇帝嘉其忠，特赐姓“包”，意思是包了明正土司所犯的罪过，又包了明正土司永远忠于清室皇帝，并因而封其后人永远辅佐明正土司，必要时甚至可以代行明正土司的职权。清帝还赏赐给四字金匾和一些书画、古玩，特许他回家料理后事，约定三年后再到京伏法。其祖先在康定闲住三年之后，即主动去京受刑。清帝将其首级在京示众，另用纯金雕塑一颗头颅，镶于尸上，运回康定，葬于北郊大地湾包家坟园。包文光小时曾看到他母亲在他家遭受大火焚烧之后还保存的御赐翡翠白菜和一幅画有马，一幅画有麻雀的中堂画。

又据现年八十四岁的下瓦斯碉最后一代锅庄主人彭士顿忆述：他家是负责给明正土司看守色多衙门的三座寺庙和那里的土地房屋的，每天要保证三座寺庙的烧柴和用水的供应。他本人九岁时就被派到明正土司家为之带小孩并负责给土司暖脚，经常挨打受气，不堪其苦，遂逃去德格牛厂当放牛娃，直到三十八岁才又回到康定。

根据调查，明正土司确实经常抽调各锅庄的妇女、儿童到其家服役，供其驱使。据说这就是前面所说的“侍贡”二字中“侍”的意思。当然为土司服役决不只限于儿童和妇女，包括

锅庄主人在内，也要对土司加以“侍”候。贾力锅庄的最后一代女主人贝却就讲，她家的前代人就是负责在土司出行时打马伞的^①。还有部分锅庄分别负责为土司管理养猪、养羊、放牧、揉皮子等工作。虽然实际上这些工作不一定由锅庄主人亲自去做，但他要负责管理操作这些工作的娃子，直接向土司负责。另据了解，四十八家锅庄中的部分锅庄，与明正土司除前述的隶属关系外，还有着直接或间接的血缘关系，这是上司家族借以维护其封建统治的另一种特殊形式和手段。对于他们前几代人的婚姻关系，现在已无从查考，但从就近几代人之间婚姻状况，也可窥其一般。如卡娃降措的锅庄主人阿甲任钦的妻子是明正土司家的大小姐；甲绒些锅庄的女主人木秋云的母亲是明正土司的二小姐；上瓦斯碉锅庄主人包文光的妻子是明正土司家的姑娘，与木秋云是表姊妹；郎白莎锅庄的女主人包凤英是明正土司甲宜斋的女儿，又曾招赘高日锅庄最后一代主人赤称的舅舅格桑。其它如包包仁钦锅庄、充布锅庄、则然托马锅庄、则然约马锅庄、控达娃锅庄、昌措锅庄、曲里巴巴锅庄等，在最近几代，也都和明正土司家族有直接或间接的姻亲关系。至于明正土司同康区其它土司家族，如德格土司、炉霍土司、巴底土司之间的婚姻关系，在历史的记载上，更是屡见不鲜的。

四、四十八家锅庄同清政府的关系

四十八家锅庄同清政府的关系，除前面已谈到的外，据有关史书记载，他们大约都是在清康熙四十年（1701年）前后，次第归附，并得到授职的。清政府还给他们发过印信、号纸，他们也都要分别向清政府缴纳一定的赋税。

还有一种传说是，康定的锅庄，是在清政府平定昌测集烈的叛乱后，将四十八名有功的军士头目，留居康定，各赏赐给院坝一处，并为之成立家室、隶属于明正宣慰使司。他们受命可以直

接向四川巡抚、甚至向皇帝报告土司的忠顺情况，按照这些记载和传说，“侍贡”、“古草”、“姑萨”、“古曹”等说法，都各有一定的根据。

还有一种说法是：清雍正十二年(1734年)，皇帝诏果毅亲王永礼偕章嘉呼图克图赴川，送七世达赖由乾宁返西藏，往来打箭炉，受到明正土司的接待。永礼与明正土司之女儿相爱，后生二子，遵照亲王之命，将“果”字上下分开，长子承袭土司职位，在上姓甲，次子充任辅佐，在下姓木。

另有一种说法：明正土司的祖先阿克旺嘉尔参于明洪武初年随征明玉珍(在今重庆)有功，永乐五年授四川长河西鱼通宁远宣慰使司。清康熙三十九年(1700年)，土司锡拉扎巴克被害，乏嗣，由其妻滚噶袭职，五十六年(1717年)滚噶死，由嫁至(穆平)董卜土司家的女子桑结兼管明正土务。雍正三年(1725年)桑结死，由桑结之子董卜土司坚参达结兼理明正土司印务，十年，坚参达结死，由其子坚参德昌承袭明正土司职位。另查《清史稿》所载明正土司的名字，在明代和清初如阿克旺嘉尔参、丹乍扎巴克、锡拉扎巴克、坚参德昌等都是蒙古人的名字，自乾隆以后，明正土司的名字前面都有一个“甲”字如随征金川的甲木参德侵、随征廓尔喀的甲木参诺尔布、领班到北京给嘉庆皇帝祝寿的甲木参沙加，清末改土归流时缴出印信的甲木琼珀等。如果根据这些记载和传说，以及藏汉历来就有通婚习俗(如不少锅庄后来都有了汉姓)等，则明正土司家族和四十八家锅庄还分别有着藏、蒙、满、汉四个民族的血缘关系。

锅庄对明正土司的态度也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根据和土司家族的关系，土司势力的兴衰，清廷对土司控制的严密程度，而不断有所倾向和变化。如清末改土归流后，阿娘巴巴的锅庄主人阿甲那绒作了康定中区的保正，取汉名张正荣；仲衣措的锅庄主人安随堂，曾任过川滇边务大臣傅嵩林和川边镇守使陈遐龄的翻译；充布措的锅庄主人充宝林担任过民国政府的团总，在成都办

过藏文学校。甚至由于阿娘巴巴锅庄主人张正荣保正的告发，明正土司之弟甲老四竟被民国政府川边经略史尹昌衡正法等等。民国年间，随着土司制度及其封建势力的消亡，除几所和明正土司家族特别亲近的锅庄外，其余锅庄大多是树倒猢猻散，急剧地和土司家族脱离了依附关系。

五、四十八家锅庄与西藏地方政府的关系

康定是藏汉居住的分界点，又是藏汉商品交换的门户。历代西藏政府对康定、乃至对整个康区早已垂涎三尺。康熙三十九年，支持昌测集烈谋杀明正土司锡拉扎巴克，民国初年策动康区的土司、头人进行复辟，都是西藏地方政府一手操纵的。

据了解，西藏地方政府染指康定(康区)有这样三条途径：一、宗教信仰关系；二、商业流通关系；三、选派亲信到土司下属担任辅佐或上门女婿，进而加以控制。

在宗教方面，康区群众和藏、卫群众都共同普遍信仰喇嘛教，在明正土司属下，仅康定境内就有喇嘛寺庙二十五座。其中黄教、红教寺庙各十座，黑教、花教寺庙各两座，白教寺庙一座。明正土司与四十八家锅庄分别信仰上述各种教派。每年夏历四月初八，负责筹办跑马山转山会的卡娃降措锅庄，都要组织全城男女老幼跑马转山，并按照自己的宗教信仰，前往转拜自己认定的寺庙和菩萨。在这些寺庙中，有的就是由西藏地方政府派人直接主持修建的。如黄教的安觉寺，就是由五世达赖洛桑嘉措选址、筹建，并为之命名的。由于这块地皮是由萨根过锅庄捐献，因而五世和七世达赖都对萨根过锅庄有过较多的关照。如允许这家锅庄的经堂和佛像都特别高大，并发给藏文文书号纸，免除了他家对西藏政教双方应支的部分差徭，等等。

西藏宗教界还通过装神弄鬼来加强对康定各界人士的愚弄。如西藏萨迦寺大喇嘛得悉三因措锅庄的女主人三因郎卡玛玛在

挤奶的劳动中猝然死去时，即在萨迦寺附近塑造了一尊左手提桶，右手作挤奶状的泥像，说她是被喇嘛收下的女鬼，还编造了一些神话传说，用以说明西藏的寺庙对康定锅庄人民握有生死予夺之权。

西藏宗教界还在康定的锅庄内培植了部分有一定宗教地位的活佛、堪布等有影响的人物，有的被授予较高的宗教学位（如格西），有的直接得到历届达赖喇嘛的赏识。如贡觉娃锅庄，一家先后出过六个活佛，其中三人受到达赖的特殊知遇，三人中的罗桑泽结还担任过西藏哲蚌寺的堪布；曲里巴巴锅庄的两个活佛，格桑云登任过达赖下属即加扎仓曲本克木的堪布，登僧彭措任过吉卡克木的首席（总办噶厦事务），等等。

锅庄子弟到西藏学经得到照顾。办法是先通过向三大寺上一定数量的布施，即可取得“倾则”学位，并据此得以免除掉一般札巴所必须承担的繁重的体力劳动，进而静心学习，很快取得“格西”学位。

在商业交流方面，康定是藏汉通商的中转和集散枢纽所在。据《康定县志图》记载，还在康定没有设明正土司以前，西藏著名商人罗布藏波即经常来往打箭炉经商。英人古伯斯（Coopers）也曾于1869年（清同治八年）谈及：“四川每年输入西藏的边茶约值六百万英镑，而以金、银、羊毛、皮张、药材作为交换手段。”西藏商人（包括康区各县）到康定后，必然要有住宿和堆存货物的地点，于是就和锅庄发生了主客关系。日久天长，锅庄和康藏等地常来常往的商人，自然会发发生友好往来，甚至有的就在锅庄上门，或认上锅庄的女主人，借以在经营上获得便宜。据群众传说，萨根过、郎伯莎等锅庄，不论在改土归流前或是以后，都和西藏贵族之间保持着友好亲密的往来，而不接待其他商人。

西藏地方政府拉拢明正土司的手段，除前述外，在可能情况下，还给派来“辅佐”，参与地方事务的管理。据说效白措锅

庄的“效白”二字，原是西藏噶厦政府对四大“噶伦”的称呼。效白锅庄之所以称为“效白”，就是西藏地方政府曾派来一个噶伦，长住在这所锅庄里，后来就给这个锅庄上门入赘，并担任了明正土司的辅佐，故而得名。

六、改土归流后的康定锅庄

清末，赵尔丰在康定实行改土归流，使康定的锅庄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随着土司制度在政治上的淹没，依附于土司制度的锅庄在经济上也必然地失去了统治者所享有的特殊权利。于是原有的锅庄，有的随土司制度的垮台而自行消失（如桑卡措、三因措等）；有的成了流官的住宅，如控达娃锅庄长期为二十四军旅长马骥、余松林，师长唐英和西康行政督察专员陈启图所占据；瓦斯碉锅庄也被川边镇守使陈遐龄作过宿舍；原西康省政府代主席、民政厅厅长张为炯长期住在育卡娃锅庄；效白托马锅庄则长期作了康定城防司令部等。有的把房屋租赁给商家住户，如官布锅庄全部出售给黄记商栈专作了仓库；昌措锅庄把一排楼房租给了国民党中央军校康定分校作了学生宿舍。但是，较多的锅庄变成了接待康藏商人的“旅栈”。锅庄主人也利用自己精通藏汉语言，熟悉商业信息等有利条件，在买卖双方起到经纪人、持秤甚至操纵的作用，并故而常常受到买卖双方的拉拢，在双方购销过程中，从中获取百分之四佣金，形成不成文的制度。有的还在原来所管辖的地区出租和经营土地，借以维持生活。

与此同时，随着土司对农牧民统治关系的消失，商品经济的不断增长，康定市场的日益繁荣，到康定经商的农牧民和行商日渐增多，在他们到达康定后，也需作短暂的停留，于是另一批旅店、客棧便应运而生。如在这一时期增设的孙祖贵锅庄、郝玉钊锅庄、孙绍先锅庄、孙绍明锅庄、皮子富锅庄、刘海山锅庄、汪彭措锅庄、范家锅庄、岳家锅庄等等。这些锅庄，虽然经营方

式、收费标准也和原有的锅庄相类似，但在群众心目中却没有把它们列入四十八家锅庄之内。如果包括这些锅庄，截至解放时统计，康定的锅庄实际上已达到六、七十家了。

（本篇承居里、丁真扎巴、古学大吉、彭土登、包文光、包连云、周树清等同志提供一些有关情况，谨此感谢。）

我所知道的康定中央银行 及法币贬值情况

郑世杰

一九四五年五月至一九四九年九月，我曾在康定中央银行，以雇工名义做行员工作。现就记忆所及，对该行内部组织、业务活动、以及币制改革丑剧，分述如下：

一、康定中央银行的组织：直属国民党中央银行的康定分行，是一个三等行。内设经理一人，下有文书、国库、会计、营业、出纳五系。各系设系长一人，另有无线电台领班一人。全行约有行员十四、五人；雇工十六、七人。行员由上海总行人事处派用；雇工则由经理雇用，报总行备查，未犯严重错误，经理不得任意开除。工作比一般政府机关稳定。

二、康定中央银行业务活动：主要是代理国库，每月拨付省属各单位员工薪津、收缴直接税款，代表四行（中央、中国、农民、交通）两局（中央信托局、邮政储金汇业局）发放地方企业贷款。其次是发行新币、注销废币、发行本市定额本票、（限制在康定市区内行使，面额较一般法币面额大六十倍至一百倍的纸币）以及收存本市区内各公私立金融机关缴纳的准备金、（各公私金融机关必须以资金的25%存银行作准备金）每日库存现金之全部（于当日下午交存，次日开门营业又重行开支票领取应付门面）和查核市内各私立银行会计帐目。诚如一般人讽刺说，“中央银行乃是银行之银行”。

另外还有收兑金、银、硬币、与办理外汇之专权利。也办汇兑与储蓄业务，如汇兑公私之调拨款，私人赡养费用，大小数目不限。储蓄业务方面，也分定期、活期。不过当时物价持续上

涨,法币贬值,除公款外,定存的帐户很少,活期存款,除本行职员外,普通市民存款的极少,因其利息不如商业银行利率大。活期存款的支取,都采取支票形式,很少有用存折的。凡在公私银行有存款者,在商店买了东西,都以支票付价,由商店持票到某银行自取,或转帐存于自己户头。连赌场输盈,也以支票结算,加之公私银行滥发本票,可以说,当时的康定市区城镇,是票据飞舞的社会。

三、币制贬值给康定地方带来的灾祸:一九四九年,蒋介石统治的地区,币值猛跌,物价狂涨,金融紊乱,工商凋敝,边区地方,深受其苦,资力薄弱的公司行号纷纷倒闭,很多人家流离失所,回顾当年情景,真叫人不寒而栗。原来法币通行之初,也曾吃香一时,如民国二十四年(1935)曾有用硬洋一元,可换得法币八角正,但不到十年,法币却贬得一文不值,有的用来糊板壁,有的用来折帽子,甚至有的当阴钱(即冥钞)来烧,这是什么原因呢?一般人认为由于抗战八年,军费支出浩大,不惜滥发纸币造成。其实这并非主要原因。我一九四五年五月进入中央银行时,市面上尚有五十元票面流通,记帐尚有角分,缴税款者,亦有交到角分数字。康定中央银行发出之本票,以伍仟、伍万的为普遍,最大面额也不过拾万。行员们买期货(买卖成交付款后约定期限交付货物)黄金的,也只三万五千元一市两。总之,与抗日战争前比较,不过贬值十六、七倍而已。

迨至一九四八年四月,蒋介石不顾中共中央的忠告,不顾全国人民的反对,擅自召开伪国民大会,登上总统宝座,掀起全面内战,大肆印发钞票,以解决财政困难,供应庞大军费开支致使全国物价,形如脱缰之马,不可抑止,加上国库黄金已空虚,人民群众对法币已失去信心。于是蒋介石于同年八月十九日,颁布所谓“财政经济紧急处分令”,宣布废弃已贬值到近于废纸的法币,改发金元券继续收割人民财富,疯狂掠夺。当时以法币三百万元换金元券一元,一个硬大洋换金元券二元,两个五角的镍币,

换金元券一元。结果持有法币者,大受损失,持有镍币者,大发横财,形成所谓“镍潮”。另外黄金一两值金元券二百元。在短时期内,蒋介石就“搜刮了人民群众兑换的黄金一百多万两,美钞三千多万元,以及港币银元等,总计约有两亿美元的赃物。”可是市面上物价仍是突飞狂涨,币值滚滚下落。“从一九四八年八月十九日到一九四九年六月停止使用金元券期间,以成都言黄金由每两二百元涨到九百亿元,涨了四亿五千万倍。银元由每元合金元券二元,涨到十亿元,涨了五亿倍,食米从每双市石十元三角,涨到九十七亿元,涨了约九亿倍”(《四川文史资料选辑》十八)金元券又成了废纸,逃亡广州的伪行政院不得不于一九四九年六月二十二日宣布停止使用,用银元一元折合金元券五亿元的比率,把它收回销毁。

一九四九年七月一日,李宗仁代总统以命令宣布了“银元及银元兑换卷发行办法”实行二次币制改革,企图挽回信用,一面拿点银元出来,一面印发银元券,以一个银元换一元银元券。康定中央银行曾运回五万银元和两箱银元券,除以银元应付门面外,因怕挤兑闹事,银元券始终未发行,直等到十二月中旬销毁了事。

银元券宣告失败后,市面金融更趋紊乱,除行使银元外,各公司行号各自为政,有的铸造自己的硬币,有的发行自己的票据。如成都有所谓“天一福”金洋,西康省银行发出一元布币,铜板恢复流通,仍沿旧例以二十四吊抵银元一元,还用邮票作辅币。这些情况,直到一九五〇年三月解放军进驻康泸地方后才结束。

在金融紊乱和币制贬值的日子里,给人民群众带来极大的灾难:“教师职工,一切靠工资收入过活的人,上月的工资还可买一石米,下月只能买一升一合;背背子和抬滑杆的,上半年挣来的血汗钱,下半年就因物价上涨夺去了八九成;商店货价一天涨几次,价格标签换了又换,左手买来的金元券,右手就已买不回原有的货品,士兵的薪饷不够喝稀饭,要吃碗干饭,就只有抢劫

善良百姓，农民被地主刮得皮包骨，又被金元券夺去他们卖几个鸡蛋买药称盐的活命钱。”（引文同上）康定中央银行发的本票，只能在城区使用，汉源、泸定一带到康定卖粮食蔬菜的，卖得本票后，²必须到银行兑成现钞后才能离境，但因挤兑，有的把本票款花光，还兑不到现钞的。由于现钞奇缺，只好签发本票应付，而且面额越填越大。总行发的本票供不应求了，就请康定石印社搬来两台石印机，在办公室楼下，抽出人马，加班加点的赶印，³市面交易，几乎全是本票支付了。于是有的坏人乘机捣乱，有的将本票留头换尾，从小额变大额的，如将五千元之本票，下面接上个“万”字就变成五千万了；有的甚至以低额本票，冒充高额本票，欺骗不识字的文盲卖主，因而吵嘴打架，不胜其数。卖主卖到本票，要向银行兑换，银行采取种种限制办法，来为难兑换的人，如限制一次只换一定数额，或要某种机关证明等。有次汉源、泸定来康定做生意的到中央银行换现钞，中央银行故意为难，站在后面的，一律不兑换，引起群众愤慨，用石头、泥沙砸进办公室，打烂门窗玻璃，在街上帖出“打倒中央银行”“打倒胡行一方的中央银行”等标语。（胡行是国库系长、任一方是营业系长）。事后，胡行和任一方求救于省府警卫团长王玉岗，王即慨然应允，派武装岗哨在前后门保护，以武力镇压制止闹事，群众反抗被镇压了，但是，从此康定中央银行就控制在王玉岗手里，他可以任意提换现钞，大做其鸦片烟和枪弹生意，垄断了整个市场。这时柜台上全以本票代替，连行员们买点生活用品的现钞，都换不出来了。

四、银行在运钞中的贩毒活动：康定中央银行的现钞都是从成都领运，每年一至二次，每次都要请二十四军护卫连保运，从成都车运雅安，护卫武装不过几个人，从雅安运康定要雇滑杆抬运，少是十几抬，多时二十几抬，护送军队总得一连人，护卫连除享受合法的护送费外，乘机大做其非法生意，进康时，他们把大量吗啡、枪弹随滑杆运销康定；交差后，又把丹巴和康定的云

南鸦片烟，转销雅安和成都，当时这种非法勾当，成了公开的秘密。许多有枪杆子的人物，发了横财，穷苦老百姓，只得敢怒而不敢言，痛苦莫可言喻。

总之，国民党的中央银行，虽有代理公库的职责，可是并没有为国计民生做一点有利的事情。相反，它利用公库之名大肆搜刮民财，以供内战军费，并为四大家族积累财富。滥发钞票，法币贬值，沉重的灾难，为害人民真是太惨重了。

“小天都”摩崖石刻

杨嘉铭

康定东郊头道水地方有一瀑布，是康定十景中胜景之一。瀑布断崖绝壁上镌刻着“小天都”斗大三个字，虽经二百年风吹雨打，日晒雨淋，却与山水共存，百米之外看去，依然苍劲醒目，而且给瀑布添彩增辉。瀑布本无名，盖因石刻出而得其雅号——“小天都”瀑布。

一、民间传说中的“小天都”

石刻原书究竟出于谁手？康定民间众说纷纭，归纳起来，大致有以下两种说法。第一种说法是，雍正年间，世宗皇帝遣其弟果亲王赴泰宁（即乾宁）看望七世达赖返回康定，留居明正土司官邸。情丝萌动，与明正土司公主相恋成亲，生二子，拆其果字，长子姓甲，次子姓木。由于钦命在身，不得不择日起程，果亲王与公主离别之时，难舍难分。果亲王便背着明正土司携公主离开康定，行至头道水地，被明正土司派人赶上，再三劝其留下，果亲王答应就地留下，于是明正土司在头道水破土为他们夫妇修筑宫殿，并在瀑布右侧岩壁上刻了“小天都”三个字，以资纪念。第二种说法与第一种说法不同的是果亲王身负皇命，从北京起程，一路上翻山越岭，风尘仆仆，行程近万里，来到头道水，随行将士已疲劳不堪，果亲王见此地风景如画，便决定休息数日。面对龙腾虎跃、雪浪滔滔的折多河，面对喷喷吐雾、玉浆天倾的幽谷匹练，仿佛置身于天上妙寓，于是神情焕发，感慨万分，旋即挥

毫颺头道水为“小天都”，并派工匠摩于岩上，石刻便在铮铮铁钻声中落成。……

二、考查疑点

出于对书法的爱好，我曾去实地反复描摸过石刻，该书肃穆端庄、气势磅礴、笔力苍劲、丰满，承袭颜体风貌、实出自高人之手；果亲王，字允礼，为请圣主玄烨第十七子，雅娴翰墨并精于绘事，乃清贵中风雅之士，虽能书，但其书风舒和流畅、温润闲雅，含赵字韵味。笔者摄有果亲王去泰宁途中，拜谒成都杜甫草堂时，所书“少陵草堂”碑，以及返回途中去灌县二王庙游览时，所书“功垂不朽”匾额，与“小天都”相较，迥然各异。从书法判析，“小天都”非果亲王书。《西康纪要》（杨仲华著）一书书首摄影插图有一幅一九三六年瀑布照，附说明：“头道水瀑布（果亲王题为小天都）。其它并无史料记载。

据《川藏游踪》（中央民族学院图书馆编）果亲王日记记述，果亲王一行于雍正十二年（公元一七三四年）十二月朔日从锦州出发，十八日至头道水，十九日宿康定，二十日从康定出发，二十三日抵泰宁；在泰宁驻了近四十天，于雍正十三年（公元一七三五年）二月初三发泰宁，初五宿康定，初六宿头道水，初七即起程……。可见果亲王无论在康定还是在头道水，都没有逗留过，只是往返途中各投宿过二夜。日记中只对泸定桥、康定及泰宁作了较详细的描述，并为泸定桥赋过诗；而对头道水只写了寥寥几笔：“峡中稍平处曰头道水，在南山最高之处，瀑布涌起，皎若练光……”。由此看来，前述两种说法也仅是无证可考的传说罢了，杨仲华摄影说明也纯系以讹传讹。那么就究竟此字出自谁手？

三、“小天都”为孙士毅所书

“小天都”并非果亲王留墨，亦非明正土司撰写，而实为孙士毅所书。那么依据是什么呢？摩崖石刻上与三个大字并存了一百九十一年（公元一七九三——一九八四）的十八个小字就是千真万确之据。在一个风和日丽的日子里，笔者相约好友持疑又专程去头道水，仔细端详石刻，冒着危险塔人梯攀缘而上，伏壁拍下“小天都”，并认真搜寻，终于发现大字两旁均有石刻小字，这个发现使我精神大为振奋，几乎呼喊出声。当即断定，只要能够把小字辨认出来，一定会得到圆满解答。由于年代久远，崖壁长满了苔藓，加之藤蔓参差如蛛丝，给辨字带来极大困难，经过反复辨识，终于如愿以偿。大字字左有八个小字：“乾隆五十七年仲冬”；大字字右有十个小字“文华殿大学士孙士毅书。”时间、书者交待得一清二楚。遗憾的是照片未能把小字显现出来，有怀疑此说者，不防步笔者后尘去实地考察一番。

四、孙士毅其人

据《清史稿》列传一百十七列撰，孙士毅，字智治，一字补山，浙江仁和人。少颖异，力学。乾隆二十六年举进士，以知县补班待铨。二十七年乾隆南巡，召试，授内阁中书，充军机章京，后来又被任命为皇帝侍读。以后历任户部郎中，大理寺少卿，广西布政使，云南巡抚，因总督李侍尧贪赃罪发，士毅有身为巡抚不先举劾之罪，被撤职充军伊犁，抄家时，不名一钱。皇帝嘉其廉，赦命其纂校《四库全书》授翰林院编修。书成，擢为太常寺少卿。以后又出京，任过山东布政使、广西巡抚、广东巡抚、两广总督。在两广总督任期间，曾平息过台湾林爽文变乱、安南（今越南）阮惠变乱。五十四年召回京，授兵部尚书，充军机大

臣，同年冬又出任四川总督，不久又改任两江总督，他整顿江南吏治、兴水利、赈灾民，俱称旨。五十六年召回授吏部尚书，协办大学士……。列传中没有涉及到孙士毅的书艺，总归起来，他知事善任，文武双全，以文见长，有相当高深的文化素养则是无可非议的。

五、孙士毅来川事由

乾隆五十六年（公元一七九二年）秋七月，因廓尔喀（今尼泊尔）侵藏，（历史上廓尔喀曾多次抗藏）清廷命福康安为大将军，海兰察和惠龄为参赞大臣由青海入藏抗击廓军，战于聂木拉、济陇等地。由于大军深入，粮饷不济，恐貽误战机，帝命孙士毅和琳为督理粮饷大臣，孙士毅驻扎打箭炉（今康定），负责由四川至藏东一带粮饷、军械督办趲运；和琳负责藏西一带此项任务。五十七年四月，因打箭炉至前藏道路坎坷、气候高寒，军储运输等项困难，未能克期办理，孙士毅便亲自带领千员，从打箭炉起身赴察木多（今昌都）督理，所办甚好。五月，又因察木多至前后藏站远道，人烟更为稀少，和琳在彼督催，鞭长莫及，难以兼顾，孙士毅又从察木多至前藏一带往来查察，帮同和琳督率催趲，运送甚为迅速。在此期间，川（四川）、康（西康）、滇（云南）、藏（西藏）各族人民都从人力、物力上给予大力支持，康定人民也加入了这个行列。据孙士毅给皇上奏折称：“明正土司甲勒参布尔感激皇上恩德，不但应发乌拉脚价，并未丝毫克扣，竟又自出己资，将运米番民，每名给以棉袄一件，牛毛布褂一条，为现在冰雪御寒之具，邀请地方文武官员同赏给，以见其急公报效。臣已面加优奖，许以酬奏。是以旬日以来，乌拉更加踊跃，每日或三四百石，或五六百担，间日运出口。……”

廓军在清军强大攻势之下，节节退败；大将军福康安以军直捣廓尔喀境内。八月，因福康安剿伐廓军功勋卓著，劳苦功高，孙

士毅督理粮饷及时认真，甚为出力；皇上恩授福康安武英殿大学士，授孙士毅文华殿大学士衔。廓军屡战屡败，乞降，福康安不准，廓王再遣大头人送还俘虏复乞降，乾隆皇帝遂准并令廓王拉特纳巴都尔亲自来营、带同进京，否则仍原势进攻。廓尔喀四次乞降，遣使入贡，方才准降。福康安整师回藏，恢复廓王封号。五年一贡。曾以所贡之象五匹赐达赖、班禅。从此藏地再无廓患。十月，孙士毅起程返康回川，到达康定时，已值“千里冰封，万里雪飘”的隆冬之季。从康定出发回成都第一站宿头道水，便书写了“小天都”三个摩崖石刻大字。此外还与惠宁、和琳分别为“小天都”瀑布赋诗数首。（笔者已在《“小天都”诗画录》中选摘，故不在此引列）作者当时为什么要书写“小天都”这三个字呢？我认为：1，头道水风景奇幽，瀑布奔泻、迭嶂环抱，令人神爽，不得不使作者命笔。2，排除外患、收复边陲失地，维护国家领土完整，虽一路辛劳，心情激奋，见此故命笔。3，有祖国处处皆乐土之爱国情怀，故抒发为书。

六、楔子

在我国历史上，曾发生过许许多多反抗外来侵略的伟大斗争，出现过许许多多戍边英雄；我国各族人民不仅共同创造了光辉灿烂的文化，而且共同用鲜血和生命维护了祖国的主权和领土完整。西藏拉萨色拉寺山门外廊下东壁上“征廓尔喀记功碑”将为人再现这一史实。头道水瀑布孙士毅所书“小天都”难道又不是这个史实的一个侧面吗？应该让藏、汉各族人民子孙孙流传下去。……

解放前后理塘县卫生状况概述

李德普

理塘县在甘孜州西南部，地处海拔3600公尺以上，素有“世界高城”之称。全县总面积15,337平方公里，其中草原面积占总面积的58.94%，耕地面积则占总面积的0.32%，森林面积占8.87%，灌木林面积占18.43%，河流、道路、矿山、沙地和沼泽占13.44%。

县属辖区有8个行政区，26个乡，（其中纯牧业乡8个，半农半牧乡18个）118个生产队。总人口为41,530人（83年底统计）其中农牧人口为37,919人，城镇人口为3611人，总人口中藏族为39,378人，汉族2114人，其它少数民族38人。在康南地区理塘是川藏公路的主动脉，占有重要的地理位置。

解放前，由于封建农奴制度的残酷统治，广大藏族群众饱受缺医少药之苦，农村牧区疫病蔓延得不到防治，严重地影响了人们的身体健康，危害了群众的生命，使人口发展缓慢。解放后，在党和政府的关怀下，理塘地区的民族医疗卫生有了很大发展，防治结合、城乡结合，医疗卫生网已经基本形成，从而改变了旧社会那种缺医少药的状况。各种传染、流行疾病得到了较好的防治和根除，保证了人民的正常生活和生产的正常发展。本文就解放前后理塘县的卫生事业状况作一概述，以供参考。

一、解放前的卫生状况

解放前，反动统治阶级，根本不关心人民的死活，推行愚民政策，治病渗入迷信，每有“疾病则必卜，卜曰服药则服之，卜

曰诵经则诵之，或借寺宇，或用空地，或在自宅，经之种类、诵之久、暂，一决于卜。如病已无生理，则诵经祈早死，使病者少受苦楚，病者屋前洒白土，关门不见客。传染病隔离别置，室中凿一孔以给饮食，死则推掩之。否则厚资雇人奔荒野。”（《理化县志稿》）下册201）。就是说广大藏民靠求神、拜佛、念经、打卦治病，根本得不到治疗，遇到传染病就只有坐以待毙了。就是有少数藏医，也因“医生药品不精，种类又无多，每有误人之事”（《襄塘志略》）。到了伪西康省政府统治时期，理塘全县仅有一所三人凑合的联诊所，既缺医术，又乏药品，遇有疫病生，则趁机敲诈勒索，打一针“九一四”（治花柳传染病），其费用就要一头牦牛，买一片盘尼西林就要八块藏洋，打一针盘尼西林要四、五百块藏洋。在这种高昂的敲诈下，藏民那敢看病，只有小病拖重，重病拖死。遇到瘟疫流行，生死只能听天由命了。例如一九四八年理塘县发生天花、霍乱疫，五百多人死亡，为躲避病疫，无数人流离他乡，弄得家破人亡。而国民党政府不仅不闻不问，反而借机大肆造谣大肆勒索，藏民长年忍受着剥削压榨和疾病摧残的双重痛苦，在这种状况下，理塘县人口锐减，解放前，全县总人口仅14,721人。

二、解放后医药卫生事业迅速发展

一九五〇年十月十五日，理塘县得到了解放。党和政府十分关心少数民族的疾苦，号召帮助少数民族发展经济文化，“以医疗卫生工作开路，开展民族地区的工作，动员和组织大批卫生人员到少数民族地区工作。”内地援藏医务工作者，响应党中央的号召，携带药品，陆续来到高寒城市——理塘，为群众防病治病，使这个缺医少药地区，开始有了较具规模的医卫设施，为卫生事业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随解放军解放康南的军医王世锦，护士马玉林，还有投诚的

国民党医生载从，于五〇年建立了理塘第一个为人民服务的卫生院。这以后内地的医务工作者陆续来卫生院参加工作，同时又选送一批藏族到内地学医，卫生院的规模逐渐扩大。

一九五二年起，理塘县卫生院开始建立病床，接收重、危病人住院治疗。一九五三年，中央派来了“中央民族卫生防疫大队”免费为群众防病、治病，并协助地方培训医务人员，建立健全医卫机构。以后在各级党委的不断关注下，理塘县医疗、卫生事业有了迅速发展，到目前为止，全县医疗卫生机构由一个扩大到二十九个（其中县属机构四个——县医院、藏医院、防疫站、妇幼保健站。区卫生院八个，乡卫生院十七个）。病床位由五张扩大到九十张，比一九五二年增加了十七倍。全县医疗卫生技术人员也由一九五二年的六人增加到一百四十三人，增长了二十二倍。在卫生技术人员中，本藏族的人员经过党的培养从无到有已增至七十二人，占全县医疗、卫生技术人员的百分之五十点四。同时还为农、牧区培训了一大批不脱产的乡村医务人员，并建立了一批合作医疗站，使农牧区的医疗卫生状况不断得到改善，防病治病得到了进一步解决。全县医疗卫生机构为农、牧民治病就诊尽量提供方便，扩大医疗面。据一九八三年统计，全县完成门诊67,330人次，比一九八二年多诊17,113人次，住院治疗976人，比八二年多接收311人，抢救重危病136人，比八二年多41人，治疗好转率占百分之九十九点二。由于防治病工作不断加强，城乡发病率均有所降低，大大提高了群众的健康水平。死亡率下降，人口上升，全县人口由五一年的14,721人，增长到八三年的41,530人，三十二年中平均每年增加人口百分之五点六人。在各级党委的领导下，医疗卫生事业将继续有更大的发展。

三、在党的关怀下。藏医重见天日

藏医的历史悠久，它是藏族人民在与疾病作斗争的长期实践

过程中创造出来的具有本民族特点的医学，它丰富了祖国的文化宝库。但在反动农奴主阶级的统治下，藏医镀上了宗教外衣，为上层僧侣所掌握，不能为广大劳动群众服务。在国民党统治时期，藏医又被视为歪门邪道，加以歧视和打击，使藏医、藏药几乎濒临绝境。解放后，党和政府十分重视藏医事业的发展，⁹从物质到人力进行抢救扶持，培养了一大批藏医技术人员，已成为活跃在广大农、牧民中的卫生队伍。但在十年动乱中，藏医被视为封建迷信，许多藏医人员受到迫害，藏医书籍被烧毁，使藏医事业一度中断。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拨乱反正，党的方针政策又给藏医事业带来了春天。在理塘县委、县政府的重视和领导下，一九八〇年七月，理塘有史以来第一个藏医联合诊所¹⁰在县城诞生。随着藏医事业的不断扩大，一九八二年又将藏医联合诊所扩建为“理塘县藏医院”，在州卫生局指导扶持下，藏医院的房屋扩建和技术设备都不断得到了充实和完善，已拥有新建业务、生活用房六百四十四平方米，医务人员八名，设置带有民族特色的病床十张，还采集各种藏草药，自制成品藏药四十六种。为方便群众，医院除设有内、外、儿、妇、五官科外并开设针灸、火罐、放血、烧穴等医疗项目。由于藏医条件的改善和防治能力增强，一些主要传染病已经得到有效的控制。

补充·订正·质疑

关于《文史资料选辑》第二辑的几点订正

《为西藏和平解放献身的甘孜格达活佛》一文，第11页倒10行法名格桑登真·扎巴他耶应为法名洛桑登真·扎巴他耶。

《甘孜孔萨土司家族的由来、世系及其兴衰经过》一文，第21页倒9行被选为十二世达赖成烈嘉错的转世灵童，应为十世达赖楚臣嘉错的转世灵童。22页倒9行据《打箭炉厅记》应为《打箭炉厅志》22页第14行1915~）应为1915~1951）

甘孜藏族自治州
文史资料选辑

第三辑

政协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委员会编
甘孜报社印刷厂 印刷

1985年3月第一版

印数：1——2000册